

黄埔人生

- 58 萍水相逢结良缘 相濡以沫伴一生
—— 江苏黄埔老兵朱学明的爱情故事 / 徐跃

我的黄埔前辈

- 62 一生黄埔三结缘
—— 老兵寸品德的故事 / 胡家兴

历史

口述历史

- 66 修桥 驾车 建大楼
—— 一位黄埔老兵的抗美援朝往事
/ 赖德武口述 赖怀恩记录 丁晔整理

黄埔往事

- 69 我与文强先生的难忘往事 / 李石

黄埔研究

- 71 抗日战争期间的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下) / 杨守礼 黄胜利

黄埔收藏

- 79 黄埔军校军乐队拾零 / 单补生

黄埔日历

- 86 1926年4月6日,马伯援到黄埔军校参观 / 贾晓明

黄埔连载

- 90 你不知道的台湾:两岸应知道的台湾历史故事(一) / 熊子杰



双月刊 单月1日出版
2021年 第3期 总第198期



2 英魂壮山河
——纪念上高会战胜利八十周年



47 王锡爵伯伯和我的二三事



62 一生黄埔三结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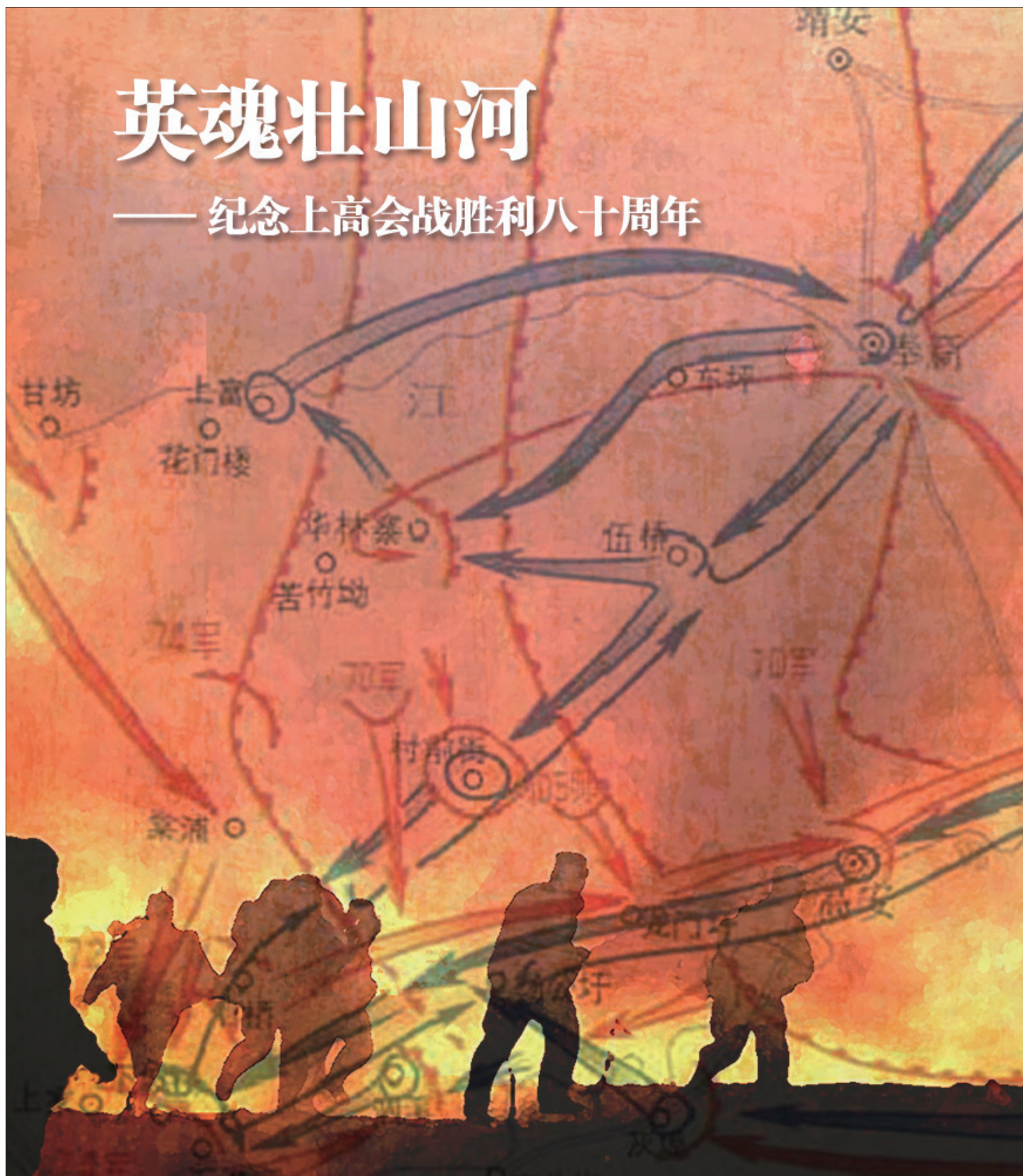
扫码下载
《黄埔》杂志 AP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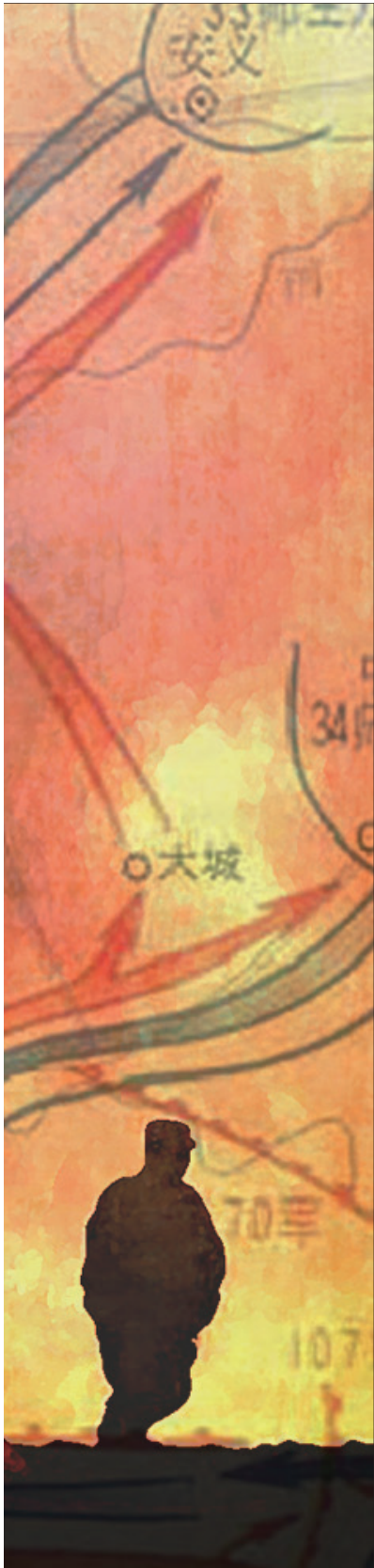


Android



ios






1941年2月中旬,日军独立混成第20旅团从上海调防江西南昌。驻扎在南昌的日军第34师团长贺茂向第11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提出,趁第33师团尚未调出江西之际,与独立混成20旅团一起进犯上高,消灭在赣西北一带活动的近10万中国军队和摧毁驻扎在上高的中国第19集团军司令部,以巩固其对南昌等占领区的统治。1941年3月15日,日军集结第33师团、第34师团、独立混成第20旅团等向江西高安、上高地区进犯,由此拉开了战斗序幕,战斗持续到4月9日,以日军扎进中国军队的包围圈战败而结束,是役为上高会战。上高会战毙伤日军15700多名,是抗日战争中中方取得全面胜利的一场战役,被何应钦称为“抗战以来最精彩之战”。

上高会战之所以能取得胜利,最根本的原因是将士浴血奋战和民众全力协同。阵地前线,上至集团军总司令,下至普通士兵,无一不抱定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张雅韵、宋文华增援上高战斗中英勇牺牲;曾天耸刺死8名日军后血洒疆场;周阳多次负伤仍坚守华阳峰直到生命最

后一刻;赵全才带领全排战士在源山庙一带与日军激战,最后仅剩传令兵1人幸存……阵地后方,民众积极支援,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动员和组织下,涌现出一个个英雄人物:有以身作则,带领民众履行“三保”承诺的“战地县长”黄贤度;有用生命换取日军重要作战文件的熊先移;有为部队当向导而遇难长眠在故土的王全昌……上高战场上,没有党派之分、没有官兵之别、更没有民与兵之区分,前方将士和后方民众同仇敌忾、众志成城,为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而前赴后继、流血牺牲。这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抗战精神的真实写照,是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原因。

为了纪念80年前的那场战役,缅怀在战役中牺牲的英烈,致敬所有参与那场战役的军民,本刊推出特别策划:英魂壮山河——纪念上高会战胜利八十周年,以激励后人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彼岸奋勇前进。

本期特别策划得到了江西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的大力支持与帮助,特此鸣谢! 

上高会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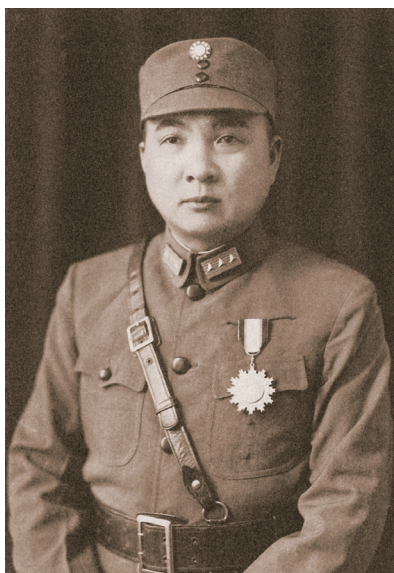
□ 咎鸿祥

发生在1941年3月至4月的上高会战，当年被誉为“抗战以来最精彩之战”而载入史册。

为什么称“上高会战”。上高会战开战初期、中期，中方称“赣北战役”。后将名称定为“上高会战”，主要之一，日军对赣西北的扫荡，三路分进合击，压迫包围中国第19集团军主力于上高地区，扫荡的最终目的地是上高。原因之二，中国军队根据日军扫荡的意图，诱敌深入，在上高预设主战场，从而达到在上高境内将日军围而歼之的目的。原因之三，中国军队最终是在上高境内彻底打败日军，粉碎其扫荡目的，并将日军赶回南



/ 上高会战要图。



/ 罗卓英。

昌的。鉴于以上三个原因，当第19集团军总指挥罗卓英在上高会战即将结束时，拍电报请示国民政府“赣北之役是否称为‘上高会战’”，国民政府委员长蒋介石回电：“赣北战役定名为上高会战。”

1941年1月，日本参谋本部调整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场上的作战方针，制订了《大东亚长期战争指导纲要》和《对华长期作

战指导计划》两个文件，在大本营会议上获得批准后，并在御前会议上得到日本天皇裁决。《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指出，“作战以维护治安及占据地区肃正为主要目的，不再进行大规模进攻作战，如果需要，可以进行短时间内的，以切断为目的的奇袭作战，但以不扩大占领区和返回原驻地为原则”。

2月14日，日军“中国派遣军”

总司令部召开各方面军和各军司令部联席会议，确定以“灵活、短距离的截断作战”为1941年度的作战方针。驻扎在武汉的日军第11军据此向其所辖各师团、旅团提出的任务是“要积极不断地依靠灵活、短距离截断进攻作战，消耗之战斗力量和确保压倒敌人的地位”。

同日，驻扎在江西安义一带的日军第33师团接到命令，4月份将调往华北战场。

2月中旬，日军独立混成第20旅团从上海调防江西南昌。

2月20日，日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田中新一少将来到南昌，驻扎在南昌的日军第34师团向其提出，趁第33师团尚未调出江西之际，与独立混成20旅团一起，共同组织一次先发制人的“灵活、短距离的截断作战”进犯上高，消灭在赣西北一带活动的近10万中国军队和摧毁驻扎在上高的中国第19集团军司令部，以巩固南昌等占领区的统治。在获得第11军司令部批准后，日军第34师团等部队开始紧急装备和大量征用民伕对赣西北进行扫荡，为作战作准备，日军第11军定此次作战为“锦江作战”和“鄱阳湖扫荡战”。上高会战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上高会战发生在1941年3月15日至4月9日，历时26天。

中国参战部队：第19集团军



74军军官商讨作战计划。

(总指挥罗卓英)所辖第49军(军长刘多荃)、第70军(军长李觉)、第72军(军长韩全朴)、第74军(军长王耀武)，江西保安纵队(司令熊滨)，第19集团军第2挺进纵队(司令康景濂)，总兵力95000余人，参战兵力75000余人。

日军参战部队：第11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所辖第33师团(师团长樱井省三)、第34师团(师团长大贺茂)，独立混成第20旅团(旅团长池田直三)，飞行第3团(团长远藤三郎)等。

上高会战中，日军主要战术是三路突击，分进合击。扫荡区域为新建、高安、清江(樟树)、丰城、安义、靖安、奉新、上高、宜丰等10个县域。扫荡的最终目的地为上高。三路具体

为：北路第33师团，3月15日从安义出发，途经靖安、奉新、高安，进犯上高；中路第34师团，3月16日从新建出发，途径高安，进犯上高；南路为独立混成第20旅团，3月15日东渡赣江，途经丰城、樟树、高安进犯上高。

中国军队根据日军战术，利用战前的三道防线，采取诱敌深入，在上高境内预设主战场，从而围歼日军的方针。战事26天，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1年3月15日至19日(5天)，诱敌深入。北路、中路阻击部队是中国第70军及第74军一部。3月15日，北路日军第33师团从安义出发，与中国第70军预9师、第19师在奉新开战，打响了上高会战第一枪。3月19日中午12时，中路日军第34师团在飞

机掩护下，先期孤军窜入上高县境内，中国第74军第58师第172团与其接火，拉开了上高会战核心战场包围日军的序幕。南路阻击部队为中国第49军及74军一部，在清江、高安一带与日军激战。

第二阶段3月20日至30日（11天），围歼决战。参加围歼决战的部队，中路为中国第74军和70军一部。日军第33师团在北路、中路突进中遭到重创后，于3月20日撤离战场，窜回安义出发地。南路为中国第49军、第74军一部，阻击日军独立混成20旅团。3月22日，中国第30集团军的72军所辖新编14师、新编15师奉命从修水等地抵达上高，归属第19集团军，参加上高会战。日军

第34师团孤军深入到上高县泗溪、官桥一带，被中国军队团团包围，在官桥一带开展拉锯式激战。3月25日，日军第11军命令第33师团重返战场增援，又从九江调来增援部队3000余人投入战斗，并派出军参谋长木下勇等人在南昌督战。3月27日，日军在官桥作战地区投入大量毒气弹，中国军队74军58师173团3营营长孙一鸣等官兵中毒。3月28日，遭到重创的日军第34师团，在日军增援部队和飞机掩护下，从上高县野市、官桥突围败退。

第三阶段3月31日至4月9日（10天），追歼。败退的日军第34师团、第33师团、独立混成20旅团从北路、中路、南路撤出战

斗，逃窜回南昌。中国第70军、第72军、第49军、江西保安纵队、第2挺进纵队参与追击日军的战斗。

经过中国军队的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上高会战的胜利。战后，中国军队公布日军伤亡15700余人。日军没有公布具体伤亡情况。上高会战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战的士气，《中央日报》、中共中央机关的《新华日报》等报刊及时进行了宣传报道，媒体和官方称颂上高会战为“空前战捷”“媲美台儿庄胜利的赣北大捷”“抗战以来最精彩之战”“开胜利之年胜利之先河”。

战后，罗卓英总指挥赋诗《赣北大捷四首》：



/ 1992年6月26日，官桥发现日军遗弃的毒气弹。

其一

又报军前战鼓催，寇气直犯上高来，
休夸扫荡侵三路，且看包围奋一锤。
诸葛阵图终有价，临淮壁垒不容开；
应知方马埋轮日，莫使虾夷片甲回。

其二

一夜春雷起怒波，健儿十万剑横磨，
铁枪在手吾无敌，神箭当风尔奈何。
不再转移新阵地，还须收复旧山河，
捷书期共花争发，伫听欢声奏凯歌。

其三

清江无恙石头雄，拔险支危见尽忠，
忍吃当前十日苦，须争最后十分功。
敖峰大树遵时绿，锦水长波落照红，
信我明朝终取胜，遥闻鼓角振天风。

其四

新年勛勉幸无忘，事业军人在战场，
保土用能瞻赫赫，歼倭欣看阵堂堂。
捷闻全会传褒语，泪洒三桥吊国殇，
且莫骄矜诸将士，扬威横览太平洋。

被誉为“抗战以来最精彩之战”的上高会战中几个亮点：

第一个亮点：运筹帷幄，指挥有方。针对3月16日日军兵分三路实施扫荡计划，3月17日，罗卓英总指挥从吉安赶回上高第19集团军指挥部，召开参谋人员联席会议，部署作战计划。据当年第19集团军总指挥部任少校参谋的蓝介愚回忆：参谋联席会议中，对敌情判断时，部分人员认为这是日军扫荡战，主



/ 《新华日报》报道上高会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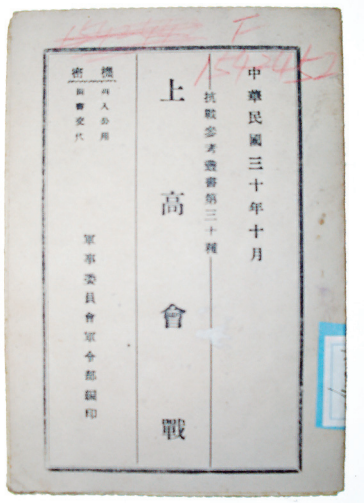


/ 《中央日报》报道上高会战。

张中国军队主力放弃上高，待敌人撤退时再出击。日军对赣西北的扫荡战，主要有三个目的。首先，军事上的目的，打击驻扎在赣西北的中国军队主要军事力量，摧毁在上高的第

19集团军总指挥部。其次，经济上的目的，通过扫荡，掠夺和破坏沿途经济，实行战区“烧、杀、抢”三光政策。战后，仅上高统计，日军烧、炸毁房屋4927栋，无辜枪杀、奸淫致死民众827名，数千民众无家可归。损失共计2.6亿元。再次，政治上的目的，通过军事上的打击，经济上的掠夺和破坏，政治上动摇中国军民抗战的士气。

联席会议上，罗卓英力排他议，主张“上高以西，无阵地可守”“军人事业在战场”，最后决定采取坚守上高，诱敌深入，在上高预设主战场，围而歼之的作战方针。作战方针敲定后，向各部队下达作战命令时，有的军参谋长仍坚持放



/ 《上高会战》教材。

弃上高立场，遭到罗卓英的呵斥。罗卓英在整个上高会战期间，自始至终坚决贯彻既定作战方针，并且牢牢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在各个战场发生紧急情况时，处置及时妥当。他还派总部高级将领到各部队督战，调总部特务营参战，并协调其他战区增援部队参战等。时任第19集团军总指挥部特务营2连连长周郁谋在文章中回忆，3月19日，他接受罗卓英总指挥的命令，率一个加强连开赴前线，一方面传达总指挥的命令，即各前线部队要与阵地共存亡，除伤兵外，一律不准擅自撤退，否则军法严惩，就地处决；另一方面增援74军，并在阵地督战。战后，上高会战作为我军精典战例，被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当局编成《上高会战》一书作为教材，下发部队指导作战。一场战役，能编成教材，这

在当时也属罕见。

第二个亮点：浴血奋战，将士英勇。在26天的激战中，中国参战将士，均能坚决执行命令，服从指挥，能攻能守，各部队的指挥机关均能前移。整个会战中，没有发生消极抵抗命令的现象，没有军人临阵脱逃的情况。特别是决战主力部队第74军，在日军兵临上高县城的危急时刻，抱定死守县城的决心，军部坚持设在县城河北指挥作战，稳定了军心，全军3个师在上高境内参加著名的“三桥战役”。即第51师在师长李天霞的率领下，坚守在石洪桥一带阻击日军，日军眼睁睁看到上高县城近在咫尺，但就是寸步难行，望城莫及。战后罗卓英作诗《赣北大捷四首》中，称74军“铁枪在手吾无敌”，称51师“神箭当风尔奈何”。第57师在师长余程万率领下，在下陂桥核心战场与日军激战时，双方伤亡达4000多人。余程万师长亲率士兵夺回被日军占领的阵地，少将步兵指挥官李翰卿率预备队夺取下陂桥对面的李家山的一个数十平方米的小山头后，日军投下160多颗大小炸弹，均未能让阵地易手。第58师在副师长张灵甫指挥下（师长外出集训），在官桥一带与日军激战六七天，反复展开拉锯战，阵地多次失而复得，为主力部队赢得了包围日军的战机。58

师在官桥包围战中首战告捷，击毙日军少佐大队长。战后，仅第57师、58师就有82名军官和士兵受到通报嘉奖。各部队参战将士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如：从修水赶来增援的新编第15师45团团团长张雅韵、副团长宋文华在上高野市水口圩一带投入战斗后，3月27日双双牺牲在前沿阵地。战后，张雅韵被国民政府追授少将军衔（2015年8月，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第49军某部排长曾天耸系马来西亚华侨，富豪子弟，回国投军，3月19日与日军在经楼遭遇，与日军肉搏，刺死日军少尉队长等8名日军，最后中弹牺牲，年仅22岁。74军51师野补团3营中尉排长周阳，黄埔军校16期毕业，带领全排坚守华阳某高地，多次负伤仍坚守阵地，最后壮烈牺牲，年仅20岁。战后，经国民政府军委会批准，将军用地图上被他坚守的阵地华阳峰命名为“周阳峰”。74军58师174团第3营连长黄廷璋，带领少尉排长毕鸿慈等官兵，于3月29日掩护小港村数十名村妇撤退，在墓田、官桥一带与敌激战负伤后不下火线，直至解救这些妇女全部脱险。57师某排排长赵全才带领全排在源山庙一带攻击日军一个中队，最终寡不敌众，全排战至仅剩传令兵1人，其余全



/ 石洪桥阻击战遗址。



/ 下陂桥核心战场遗址。

部壮烈牺牲。49军某连连长何益鸣率全连三战虎形山，100多名官兵战至仅剩30余人。70军107师320团在会战中伤亡500多名官兵，约占全团总兵力一半。

战后统计，中国军队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共伤亡20533人，其中阵亡9682人（包括军官252人，其中团职5人），另外，失踪2800余人，平均每天阵亡372人。

正是这些舍生忘死的抗日将士，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与日寇顽强战斗，确保了上高会战的最后胜利。

第三个亮点：积极支前，保障有力。上高会战期间，战区民众在中共地下党积极指导及政府的领导下，支前保障工作突出，成效显著。第19集团军总指挥罗卓英等高级将领总结会战支前工作时，多次称颂“民众效命”。上高会战前至会战中，中国军队近10万将士云集在上高周边地区。中共上高地下党及周边地区党组织，坚决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为发动民众支前做了大量工作。时任上高县县长的黄贤度是中共特别党员，他利用县长的公开身份告诉第19集团军，会战期间，上高人民做到“三保”：保证运送物资、弹药和伤员及时不误；保证破坏交通和维护我方电话畅通无阻；保证后方不出现汉奸破坏活动。县长黄贤度说到做到，在县城战事最紧急的阶段，他不顾枪林弹雨，带领政府工作人员和地下党成员组织民众，多次赴前线阵地运送弹药、伤员，慰问参战官兵，被参战将士称为“战地县长”。会战中，上高电报局、电信修线队在黄贤度的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及时抢修线路，保证了通讯畅通无阻，战后受到表彰。

上高会战时，上高共设三个区，其中一个半区沦为战区。全



/ 2005年,作者曾鸿祥(右一)采访喻大也(右二)。

县共有12万人,其中3万多民众参加了筹集粮草,挖路毁桥,运送弹药、伤员、修复通讯线路等支前工作。据第19集团军当年统计,除安义、新建、高安3个县外,日军所扫荡之处的县级政府均按日按月供应中国军队粮食,宜丰县因不是主战场,征粮每日高达8000多公斤。上高县是主战场的核心战场,中共地下党协助政府仍然每日供粮约3400公斤。

官桥街的喻大也老人,2005年接受笔者采访时说,会前战,他家几兄弟都被政府征集上路,自配口粮去破坏道路桥梁,以阻止日军机械化部队的进攻。在官桥包围战期间,从修水调来增援的72军的两个师到达宜丰与上高交界的凌江口时,因桥梁被日军炸毁受阻,中共上高地下党成员及政府人员组织当地民众,拆下自家门板,撑来大小

竹排,仅用1天时间架起一座浮桥,使大军顺利过江。

墓田峨坑村的王全昌是当地甲长,率领村民撤退到山上后,自告奋勇为中国军队作向导,翻山越岭、穿林涉水,参与偷袭日寇占领的土地岭,最后中弹长眠在生他养他的土地上。

墓田乡第12保的蒲城村,有位有文化的青年叫熊先移,被日军强征为民夫。他假装服从,晚上则乘日军不备,偷出日军军用地图和重要作战文件逃往中国军队阵地。日军发现后,对其进行追踪,次日清晨,无法突围的熊先移先将文件地图包好在一起放入泗溪河中漂向对岸中国军队阵地,自己再吸引日军渡河,最后中弹牺牲。


在中共地下党宣传和政府鼓动下,不少民众自告奋勇争当中国军队的情报员,如礮村的左圣

自、泗溪杜家的杜早兴、上樟塘的冷树立、界埠乡洲上村60多岁的晏自成等都为中国军队搜集过情报。

上高会战结束后,国内媒体对支前工作作了大量报道,这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也是绝无仅有的。因此,上高会战也是中共地下党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典范。

上高会战的胜利,打破了中日相持阶段的僵局,挫败了日军的锐气,极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士气。受这次作战影响,日军第33师团推迟了向华北的转进,从而减轻了华北战场中国军的压力。日军第11军司令官、第34师师团长均因上高会战的失利,遭到撤职处分。

上高会战的胜利,粉碎了日军企图击溃中国第19集团军,使赣西北丧失抵抗力量,达到巩固其对统治区的占领,形成威胁中国西南大方后的格局,以及配合其大本营加快结束侵华战争的目的。

上高会战的胜利,提升了中国政府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在国际上表明了中国政府在抗战最困难时期,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推动了国际上对华抗日战争的援助。

(曾鸿祥,上高县革命史、地方史研究者,上高会战遗址特约讲解员)

上高会战中营级以上的黄埔师生

□ 咎鸿祥

创建于1924年的黄埔军校，以孙中山的“创造革命军队，来挽救中国的危亡”为宗旨，以“亲爱精诚”为校训，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军事政治人才，为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抗日战争中，黄埔师生浴血奋战，参与了绝大多数会战和战役，被誉为“抗战以来最精彩之战”的上高会战中亦有黄埔师生的身影。

上高会战结束后，第19集团军编写了会战总结。其中有1份中国军队参战部队营级以上指挥官名单，该表列出军级以上职务6人、师职指挥官37名、正团职45名、正营职126名，合计214名。经核查，该表名单中有37人系黄埔军校毕业生。除此之外，还有部分参加过上高会战的黄埔军校毕业生出现在相关史料及个人回忆录中。

会战总结名录中的37名黄埔军校毕业生：

余程万，第1期毕业生，广东台州人，74军57师师长。在上高会战中指挥该师坚守镜山阵地，主要战斗在主战场。1941年3月22日，上高城北下陂桥核心战场一阵地曾一度失守，余程万

亲率军士大队与日军反复争夺，确保阵地牢牢掌握在中国军队手中，终使日军无法向上高县城推进。战后，57师获得国民政府颁发的“陆海空军武功奖状”。

邓子超，第1期毕业生，江西石城人，江西保安纵队第3团团团长。上高会战中率部队在新建等地及锦江南岸一带骚扰日军。

刘安泰，第2期毕业生，山东莱阳县人，74军57师169团团长，率部在高安、上高等主战场与日军激战。战后被通报列表表彰并存档。

王耀武，第3期毕业生，山东泰安县人，74军军长。上高会战中，74军是中国主力军队，全军多次与日军激战趋于白热化。74军驻扎在上高外围阵地，在合围日军中赢得时间，为上高会战的全胜奠定了坚实基础。战后，74军被誉为“抗日铁军”，被国民政府授予最高荣誉“飞虎旗”，王耀武本人获青天白日勋章。

李天霞，第3期毕业生，江苏常熟市人，74军51师师长。上高会战中，率部在高安及上高外围地区一带，与日军多次激战。在上高石洪桥阻击战中战果显赫，战后获“陆海空军武功状”。

其师被第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在上高会战诗中称为“神箭”。

张国猷，第3期毕业生，江西星子县人，74军51师152团团团长。上高会战期间，率部在高安狮子岭、羊角岭、五公岭一带激战。

周鑫，第3期毕业生，江西鄱阳县人，江西保安纵队第1团第2营营长。上高会战期间，率部在南昌外围、新建、安义协助主力部队抗击日军。

孟继薰，第3期毕业生，河南杞县人，70军预9师27团团长。3月15日晨，率部与北路日军第33师团交战。

胡行方，第4期毕业生，湖北汉川人，70军第19预备师副师长。上高会战期间，协助师长张言传指挥部队在奉新、高安与北路日军激战。

周志道，第4期毕业生，江西永新人，74军51师副师长。上高会战期间，协助师长李天霞指挥部队参战。

王俊儒，第4期毕业生，陕西渭南人，74军51师野补团第2营营长，率部在高安、上高一带作战。

张灵甫，第4期毕业生，陕

西长安人，74军58师副师长。因师长廖龄奇外出集训，由其代理师长职务，指挥部队在上高官桥主战场和下陂桥核心战场紧紧咬住日军血战，确保了上高会战的胜利。

王一球，第4期毕业生，湖南祁阳人，74军58师野补团2营营长。率部在上高主战场与日军激战。

伍昌续，第4期毕业生，湖北广济人，70军预9师25团团长。25团是该军最早与日军交战的部队。上高会战期间，在主战场官桥、东港、石洪桥一带配合74军主力与日军交战。

陈传钧，第5期毕业生，山东滕县人，74军51师151团团长。率部在高安、独城、天子岗、上高主战场一带与日军激战。战后，151团被74军评为优秀团之一。

程有秋，第5期毕业生，四川隆昌人，74军57师参谋长。辅佐师长余程万参加上高会战。

杜鼎，第6期毕业生，湖北枣阳人，74军57师171团团长。率部在上高主战场与日军激战，战后被誉为“忠勇官兵”并列表通报表彰。171团被该军评为优秀团之一。

陈鳌，第5期毕业生，湖南祁阳人，74军58师172团3营营长。率部在主战场官桥、墓田圩一带与日军激战。

蔡仁杰，第5期毕业生，湖

南常德人，74军58师173团团长。率部在主战场官桥水口圩一带与日军激战，是血战白茅山的主力团。战后，其被誉为“忠勇官兵”，被列表通报表彰，被评价为“勇敢参战，会意跃盛，又能贯彻命令”。该团被军部评为优秀团之一。

邓竹修，第5期毕业生，湖南常宁人，74军58师174团团长。率部在上高主战场官桥、墓田圩、水口圩一带与日军激战。

唐肇谟，第6期毕业生，74军58师参谋长。辅佐张灵甫副师长指挥全师与日军在上高主战场决战。战后被誉为“特殊功勋官长”，被评价为“加紧业务，顾虑周详，始终不懈”。

唐郁伯，第6期毕业生，四川南充人，72军新编15师副师长。3月23日，从修水协助师长傅翼增援上高会战。在上高水口圩一带与日军交战，其部属第45团团长张雅韵、副团长宋文华在水口圩牺牲。

吴剑吟，第6期毕业生，四川井研人，72军新编14师参谋长。协助师长陈良基增援上高会战，在宜丰堂浦、上高官桥一带与日军交战。

左大凌（原名华虞），第6期毕业生，湖南衡阳人，第2挺进纵队副司令。协助司令康景廉在高安、靖安一带与日军激战。

胡景瑗，洛阳分校毕业，陕

西富平人，74军51师野补团团长。率部在高安丁公桥、上高石洪桥一带与日军激战。

于冠英，第7期毕业生，湖南祁阳人，74军58师172团第2营营长。率部在官桥、墓田圩一带与日军激战。

何澜，第7期毕业生，湖南道县人，74军58师野补团团长。率部在官桥、水口圩一带与日军激战。战后被誉为“特殊功勋官长”，列表事迹为“亲率所部增援，使敌不得深入，又协攻官桥极为努力”。

李灵运，第7期毕业生，河北定县人，74军51师152团第2营营长。率部在高安、上高一带与日军交战。

谢中枢，第8期毕业生，湖南资兴人，74军51师153团第2营营长。率部在高安、上高一带与日军激战。

谢恺棠，第8期毕业生，江西龙南人，74军51师153团第3营营长。率部在高安、上高一带与日军激战。

黄宽，第8期毕业生，江苏丹阳人，74军58师173团第1营营长。率部在上高泗溪、水口圩一带与日军激战。

谭三畏，第8期毕业生，湖南茶陵人，74军58师174团第3营营长。率部在官桥、水口圩一带与日军激战。

罗英，第8期毕业生，湖南

人，74军58师野补团1营营长。率部在官桥一带与日军激战。战后被誉为“特殊功勋官长”，列表事迹为“增援官桥及以后，肃清罗坑以北高地，均能达到任务”。

林万生，高教班2期，辽宁新民人，49军26师参谋长。协助师长王克俊在丰城、高安一带与日军激战。

王克俊，高教班6期，四川岳池人，49军第26师师长。率部在丰城、樟树、高安一带与日军激战。

钟雄飞，高教班第3期，湖南新邵人，70军19师57团团长。率部在安义、奉新、高安一带诱敌深入，与日军激战。

明灿，高教班6期，湖北浠水人，74军58师174团副团长兼第2营营长。率部在高安、上高主战场官桥、墓田圩一带与日军激战。战后被誉为“特殊功勋官长”，列表事迹为“攻击墓田圩时勇敢前进，歼敌甚多”。

有关上高会战史料及个人回忆录中，涉及参战的黄埔军校师生18人：

张襄，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福建闽侯人。任第19集团军中将总参议，受命前往74军军部督战，确保军令畅通。

陈瑜，黄埔军校分校教官，江苏江阴人，74军参谋长。协助

王耀武军长指挥全军参加上高会战。

邱维达，第4期毕业生，湖南平江人，74军51师少将步兵指挥官。协助师长李天霞指挥部队参战。

杨生，第5期毕业生，江西南昌人，第2挺进纵队支队司令。率部在靖安、奉新、高安一带阻击日军。

李嵩，第6期毕业生，湖南益阳人，74军58师上校步兵指挥官。协助张灵甫副师长在上高主战场与日军激战，战后被誉为“特殊功勋官长”，事迹评价为“指挥得法，克尽厥职”。

杨晶，第6期毕业生，湖南新化人，74军野补团团长。率部参加上高主战场战斗。

魏杰，第12期毕业生，江西南昌人，74军58师172团第3营副营长。在上高会战中参加龙形山等地战斗。

刘金山，第12期毕业生，辽宁沈阳人，上高会战时，任第19集团军参谋少校。

秦然轩，第14期毕业生，上海人，49军105师政治处政工队长。在清江（樟树）、高安一带参加上高会战。

朱光第，第15期毕业生，江苏宝山人，49军26师78团1营2连连长。在清江（樟树）、高安一带参加作战。

方荷珠，女，第15期毕业

生，第九战区长官司令部参谋处作战科谍报队员。在高安、棠浦一带参加上高会战。

陈怀彪，第16期毕业生，浙江诸暨人，74军57师某部3连排长。在上高泗溪与日军作战中牺牲。

周阳，第16期毕业生，湖南道县人，74军51师野补团3营机枪3连中尉排长，在高安华阳一带作战牺牲。战后，其牺牲所在山峰，被军委会测绘局命名为：“周阳峰”。


李定信，第16期毕业生，江西赣州人，江西保安纵队司令部参谋。

吴尚志，第16期毕业生，浙江人，第三战区直属独立营少校指导员。受命增援上高会战，在高安一带参加作战。

施中诚，高教班4期毕业生，安徽桐城人，74军副军长。协助军长王耀武指挥全军参加上高会战。

黄华国，潮州分校毕业生。上高会战时，任第19集团军参谋处长。

周郁谋，学员总队毕业生，广西人，第19集团军特务营第2连连长。随特务营参加上高会战，增援58师。

因历史资料不全，少部分在集团军总部、军、师、团、营任职的黄埔军校师生没有统计在内。

上高会战的过程

□ 杜青

1941年初，日军为发动中条山战役、消灭中国华北驻军而调兵遣将。其中，1939年以来长驻南昌的日军第33师团即将调往华北，而日军在上海由第5师团改编成的独立混成第20旅团（后简称第20旅）已调驻南昌。日军第11军决定在第33师团尚未调走，第20旅团刚好调来的时机，以驻扎南昌的第34师团为主力，纠集第33师团、第34师团、第20旅两个半师团，以及独立山炮兵第2联队第2大队、独立山炮兵第51大队、独立工兵第2联队，以及第3飞行团之第44战队、第75战队等部，合3个师团，对当面中国军队“给予一击”。其主要目标为重创驻守南昌周边的第70军主力，以确保在赣州的守军没有后顾之忧，由此发动了上高会战。

中国军队第19集团军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罗卓英（兼第19集团军总司令）带领74军和70军两个主力军驻扎上高。上高会战前，在罗卓英的争取下，第三战区辖下的第49军连同其驻守区域均划归第九战区第19集团军。

日军作战计划制定后，在南昌第34师团总部召开了战前会议。其中，专门负责收集情报，

并热衷于利用中国人“以华制华”的34师团参谋长樱井德太郎对此战比较忧心。而师团长大贺茂刚刚由第7师团骑兵联队联队长任上而来，干劲十足。他不仅打算对当面中国军队“给予一击”，还决定将第11军作战计划略作修改，以深入我19集团军腹地，上高并歼灭我主力第74军，彻底解决第11军的心腹之患。

作战之前，日军34师团声东击西，调集主力朝我第三战区位置佯动，直到3月15日，才将主力全部调往我第九战区方向，发动上高会战。日军第20混成旅团则早在3月13日就调兵遣将，往我三、九两战区交叉位置——自厚田街往市街方向进发。此时，中国驻守当地的部队仅70军107师321团第3营。第20旅以一个整旅团的兵力，悄无声息地打了一个渡河战。他们的对手仅为我3营9连。

3月15日，日军第33师团对我奉新守军发动炮袭，兵分三路向我进攻。战斗之初，他们一路高唱凯歌，没有遇到多少抵抗。但据史料记载，日军除缴获大量物资外，没有对我70军造成其他损失。

日军第214联队一路南进，最远到达我第74军58师173团蔡仁杰部第2营驻地村前、口西一带，途中几乎没有作战。但到了村前，第214联队认为“遇到了真正的抵抗”。他们用尽各种方式，好不容易攻下村前，却再也无法突破数里外的口西防线。

日军第215联队则运气更不佳了，在到达苦竹坳（日军称花门楼）一带后，遇到我19师56团副团长张业勋率领部队伏击，吃尽了苦头。最后勉强跳出伏击圈，回到了驻地。

这就是日军第33师团所称的“第一次锦江作战”的过程。他们是辅助第34师团，贯彻第11军对当面中国军队“给予一击”的指示，实际上没有什么大的作战任务。

3月16日，日军主力第34师团出动，一路西进，驻守高安的我第70军107师只是象征性抵抗了一下，便跑得无影无踪。大贺茂更加狂妄，加上不想以后受到中国军队的骚扰，于是决定改变作战计划，“以下而上调动第11军”向上高的我74军主力腹地进发。一路上，第34师团参谋长樱井德太郎见中国军队“狼狈逃

跑”，也以为自己情报工作出现了失误，就默认了师团长的主张。

3月19日，日军第34师团的前锋216联队第2大队大队长木下重四郎到达我58师驻守的防区官桥一带。木下重四郎带领副官等人侦察敌情时，被58师神枪手一枪贯穿心脏，子弹穿透后再次飞入后面副官的胸部。第2大队尚未交战，大队长和候补大队长便被打死（按日军习惯，大队长战死，副官指挥作战），顿时陷入混乱。

为此，3月19日开始，大贺茂指挥日军对上高进行报复性作战。34师团猛攻我58师防线，在官桥不成，又往东到达塘坎一线，以“锥形攻击”的方式攻击一点，还施放大量毒气。58师172团坚守泗溪河，后来又以野补团加强，坚守了一日，在塘坎被突破后，继续后撤坚守云头山一带。半夜，172团接到军长王耀武的命令：第19集团军准备收缩防区，将重点集中于县城周围。第58师主力乘夜转移到凌江口修整，并以主力173团、174团驻守白茅山一带。172团和野补团最后撤出阵地，一夜之间完成阵地转换。

我57师野补团（团附扈国珍代理团长）在村前一带，与日军第218联队第2大队遭遇，给日军以极大杀伤，也于19日夜接到74军撤退命令。日军第218联队第



第51师在锦江右岸地区战斗经过要图。

2大队尾随，却在占领我57师师部杜家后，遭遇57师迫击炮营射击。大队长浅野重伤被连夜运回南昌。日军第218联队刚刚进入上高便遭遇重创。

当晚，我74军57、58两师完成阵地转换，放弃多余防线，以坚守上高为主。南路日军第20旅赣江支队在寻找渡口过程中，因赣江涨水认错路，耽误了一天。此时，罗卓英总司令命令第49军26师急调清江（樟树）一带。日军第20旅尚未渡河，便遭遇我26师76团的堵击，加上后来我军野补团赶到，前后夹击，日军赣江支队遭遇重大损失。尤其是黄土岭一带（日军称蜀家陵），第4中队长佐久间正俊和第2中队长岩桥富五郎战死。两个主力中队计46人战死，47人负伤，死伤约



第74军荣获的飞虎旗。

占参加战斗300人中的三分之一，该队基本丧失战斗力。

此战中，我26师76团某部排长华侨曾天耸，因击毙日军小队队长宫内通明名留史册，被26师师长王克俊誉为“两个可歌可泣”的事件之一。

日军第20旅主力在大岭、鸡公岭以及石头街一带与我74军51师激烈战斗。作战过程中，我军



57师部分官兵战时休息。

涌现出一批民族英雄。尤其是20日早晨，51师151团第3营9连连长樊逢春在红石岭阵地与敌作战，反复肉搏，最后壮烈牺牲。当日夜，151团派加强步兵1连在少校团附代理第1营营长李贵吉的带领下，袭击狮子岭之敌，最后也壮烈牺牲。在鸡公岭阵地，153团第1营与敌反复争夺阵地，营附杨柳初率领伙夫杂兵增援，俘虏包括下野松明等多名日军，取得了较大战果。

在石头街，日军第104大队第2中队中队长古贺正已战死。第2中队以复仇的心态向我军猛攻。石头街即将失守，进而威胁华阳，51师野补团火速赶往华阳峰。驻守该峰的排长周阳带领全排死守，周阳最后壮烈牺牲。

日军进展最快的森重第105大队到达横游一带时，以第1、

第2两个中队对当面中国军队发动攻击。第2中队中队长松本纪元比较奸猾，他没有像第1中队一样猛打猛冲，而是率队绕到中国军队后面，让化学兵先放毒气。不巧的是，当时没风，等了半天，终于来了一点风，没想到火柴潮湿打不着，他见状便收兵返回。此时，第1中队已经尸横遍野，战死68人，除一个出去传信的士官外，该中队士官以上全部被歼。横游一战是日军第20旅主力上高会战的最后一战，尚未到达上高界埠，便打道回府。

日军第34师团主力到了上高后，其行踪便成了谜。当年，日本防卫厅编撰系列战史，由于缺少上高会战史料，据说整套书的成书日期都因此耽搁很久，原因是当时第34师团强制性销毁了包括战斗详报和日志在内的几乎所有史料，他们认为这是一场非常不雅的败战，是他们的“污点”。以致目前能找到的日军方面相关史料，全部来源于老兵回忆、报纸、杂志或其他部队的讲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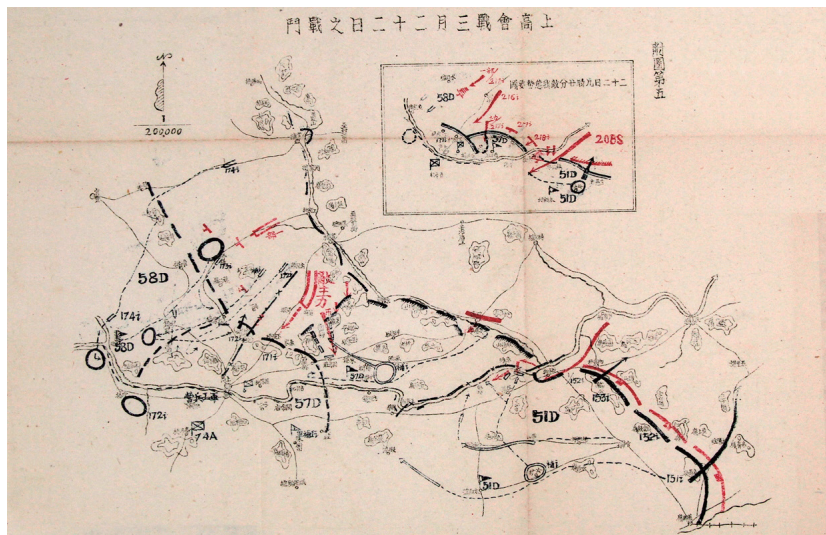
据中国战史记载，21日以来，上高北城一带陷于血战。尤其是22日，敌我双方单日死伤在4000人以上。171团团长沙鼎坚守的下陂桥，以及第170团周义重坚守的石洪桥一带，战斗最为激烈。杜鼎战前换将，将阳奉阴违

的171团第1营营长张作圣撤职，令副营长吴鸿宾代理营长职务，坚定了守卫下陂桥的决心。第57师野补团中校团附张泽霖，协助第170团防守石洪桥身负重伤。170团少校团附张劲梅率部逆袭，壮烈牺牲。敌我双方在下陂桥和石洪桥反复争夺、日夜战斗，日军始终未能前进一步。日军还先后派出便衣深入我敌后，意图乱我军心并加以破坏，皆被粉碎。57师师长余程万，令部属行进时经过师指挥部，以示师长与他们在一起。军长王耀武更是“誓不过锦江”，始终坚守在镜山口。

19集团军兼总司令罗卓英先后下达“战时胜利保障十则”“奋勇队激励办法”等，激励前线将士杀敌，并将自己身边最后一支队伍即第19集团军特务营派往上高，归第74军指挥。

大贺茂在听从步兵团长岩永汪建议后，决定再次修改作战计划，把“覆灭第19集团军根据地高”改为炮击上高城，将所有炮弹倾泻进上高县城后准备撤退。但这时他才发现，似乎走不了了。

罗卓英总司令调兵遣将：第19师已至泗溪一带，正过泗溪河；预备第9师朝官桥一带进发，已经占领官桥并继续前进；第51师及第26师在击溃第20旅后也即将调来。而由修水过来的第72军



3月22日, 上高会战要图。



中国军队工兵清理被炸的街道。

日夜兼程, 最快的新15师已经到达水口。这样, 日军第34师团已经陷入包围圈内。

大贺茂为拯救3000部属, 决定在最后时刻“牺牲个人名誉”, 向武汉的第11军发出救援

电。第11军紧急派遣参谋长木下勇携部下飞往南昌部署守城, 同时命令刚刚返回的第33师团马上赶回救援第34师团。

第33师团返回驻地的当天接到命令, 有的甚至还在返回路

上。长途奔涉几天已是极度疲乏, 但军令如山倒, 第33师团只得在作战军用地图、粮食等都尚未准备齐全的情况下, 参加救援34师团的作战。33师团将该次作战称为“第二次锦江作战”。

由于上高周围的中国军队几乎全部调往上高围剿第34师团, 33师团一路未遇抵抗, 到达棠浦一带, 在此兵分三路, 分别向第34师团驻地南茶罗和官桥进发。

此时, 中国方面由70军副军长兼师长张言传指挥的预备第9师, 以南茶罗、毕家为中心, 将第34师团围住, 反复发动进攻。但以一师之力无法吃掉第34师团, 由于修水距离上高路途太远, 从修水赶来增援的新15师还未赶到。此时, 村前一带传来日军数千兵力来援的情报, 张言传决定撤退。不仅如此, 他还命令在泗水以北, 即将和自己会合的第19师也一起撤退。当时, 第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不知道此事, 张言传后来解释, 说是没有信号联系不上。但无论如何, 张言传两个师的撤退, 使得日军第33师团轻易与第34师团会合了。

更糟糕的是, 27日, 刚刚到达上高水口的我新15师, 便遭遇日军213联队和215联队两个联队的攻击, 天上更有日机狂轰滥炸, 一时间伤亡不小。第45团上校团长张雅韵在方头脑一带, 紧



/ 上高会战牺牲官兵的追悼会。

急部署部队堵截两个联队日军时，指挥部被敌机发现，张雅韵和团附宋文华等人均被炸死。

日军第33师团与第34师团会合后，因死伤人员太多，无法马上撤退，耽搁了一天，28日开始正式撤离上高。罗卓英总司部署了第二轮合围，以预备第9师赴村前，第19师赶往杨公圩，第105师赶往龙团圩，26师也连夜赶来，在泗溪、杨公圩、龙团圩一带摆成一字长蛇三处作战。

日军在通过泗水以北虎形山等地后，遭遇我26师及57师夹击，死伤颇多，于是安排伤患队及第34师团先行，第33师团殿后。第34师团跑得较快，但是殿后的野炮第34联队第8中队在

鲁家山对面，被我26师一个团包围，在向第34师团步兵团团长岩永汪求援未果后，全部被歼。在龙团圩一带，前往接应第34师团的第20旅104大队与我105师进行了激烈战斗，拼死将第34师团接应到高安，后返回南昌。

殿后的第33师团在中家山和村前一带，遭遇了我19师和预备第9师的顽强阻击。第214联队联队长滨田十之助甚至和33师师团长樱井省三通话，表示要烧掉军旗，以免落入中国军队手里。联队第2大队大队长横田战死。第33师团包括师团长最后都是“落汤鸡”一般，经历了“地獄遇见佛祖”的苦难，才回到驻地。当时第11军甚至决定，刚刚

返回的第34师团重新返回救援第33师团，并派出飞机轰炸，使第33师团安全返回才作罢。

我19师在中家山与敌反复激战。第55团作战英勇，中校代理团长蔡冠生不幸于3月31日，在中家山对日作战中，阵亡于飞机轰炸之下。预备第9师以及第107师则在村前一带对敌堵截，取得了较大战果。

本次作战后，第74军被授予飞虎旗，罗卓英称该军为“抗日铁军”；第51师被授予陆海空军武功状第一号；第57师被授予陆海空军武功状第二号，更荣膺“上高长城”称号。^[5]

（杜青，江西上高人，长期致力于上高会战研究）

尹同道：像野人一样战斗

□ 杜青

尹同道，1938年考入黄埔军校16期炮科，毕业后分配到74军57师。上高会战中，在57师师属炮兵营1连任排长。

尹同道出生于湘南一户农家，在宗族的资助下，初中毕业后进入湘桂铁路运输人员训练班学习。1938年，尹同道考取黄埔军校16期炮兵科，在桂林受训。1940年10月，尹同道毕业后前往江西前线报到，第一站就是江西上高泗溪杜家村。

3个月的见习期满后，尹同道被分配至驻杜家村的74军57师参谋部当见习参谋。每天天未亮，号兵们就吹响集合号，士兵集合出操，有时还到街头拉练。当地墙上到处都是文艺兵写的抗战标语。部队士气高昂，老百姓很受鼓舞，对日军也没那么怕了。后来在上高会战中，老百姓还纷纷帮助军队。

尹同道回忆，当地老百姓对部队的最大贡献是组织年轻人做部队的向导，还有帮助承担运输、通讯等工作。尹同道所在的57师炮1连就有四五个老百姓提供帮助。当地老百姓为上高会战的胜利作出了特殊贡献。

部队驻扎在泗溪时，经常



尹同道。

搞卫生，马路边、泗溪河边的茅草和垃圾都要清理。部队还经常组织人员帮老百姓抢收粮食。上高会战前，只要水稻成熟，部队就赶紧组织人员帮老百姓抢收，防止被日本人抢走。

尹同道在57师参谋部3个月的见习参谋期满后，先下到营部。营长孔先荷对他特别关照。

不久，他到了连队，在57师师属炮兵营1连戴梅生连长的手下当排长。那时，凡黄埔军校毕业的同学，每周都聚餐一次。由此，尹同道又认识了同为黄埔毕业的孔宣荣等人。

1941年春，上高会战打响了。尹同道说，上高会战是他打的第一仗，也是引以为傲的一仗。这场战役是总司令罗卓英将军精心设计的杰作。开战前10多天，中国军队就有意将日本人引进圈套，且战且退，后面则关门打狗痛揍日军。战斗在村庄、城镇、山头、河边到处打响。“白天日本人占领了我军阵地，晚上日军飞机来不了，我军就连夜夺回。打到后来，战况越来越有利于我军。同时，友军从后面包抄，我军（74军）正面突破，日本人兵败如山倒，我们乘胜追击。最后我们打胜了这场战役，但损失也很大。在部队渡江的时候，日本飞机如蝗一样密，很多弟兄就那么被炸死了。”

在尹同道的记忆中，参加上高会战的20多天，大部分时间都在跑步转移，和日军的飞机捉迷藏。当时，日军飞机多达150多架，中国军队一架也没有。我军

炮兵一有动作，日本人的飞机就赶来轰炸。我军除了不停地跑、转移阵地，没有任何办法。

在这样的装备条件下，尹同道他们还是取得了不俗的战绩，上高会战中阻止敌人渡过锦江的战斗就打得很有过瘾。黎明时分，下着小雨，57师炮兵营1连接到阻击敌人渡江的任务后，马不停蹄地朝锦江边挺进。由于下雨，日军飞机来不了，这对于丧失制空权的中国军队来说，是个大利好。日军似乎没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正扎堆渡江。他们坐着一二十个橡皮筏子已划到江心，其动静之大，隔了很远，都能听到水的响声。尹同道说，日本人如此明目张胆，丝毫不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必须给他们教训。这是炮兵发挥的最佳时机。当时全连共带来4门迫击炮。尹同道命令调整距离方位，指挥4门迫击炮群发射击。

“这一突如其来的炮轰，打得日本人鬼哭狼嚎。”打完几炮后，尹同道命令炮兵赶紧撤，“左右前后换地点，离开原地。”果然，炮兵刚一撤退，日军的炮弹就如雨点般打过来，但全都落了空。在新的射击地点，炮1连继续朝江心的日军轰击，没过多久就将江心几十个日军筏子全部轰翻。岸边的日军见势不妙，纷纷撤退。“从望远镜中可以看到，日军基本溃败了。”这场战



作者(右)与尹同道合影。

斗仅持续了十几分钟。

一个月后，57师师部的《阵中战报》报道，57师炮营1连击毙了日军少将旅团长，提出要对参加该次战斗的部队进行表彰和奖励（注，报道消息有误，上高会战中日军唯一的旅团长、第20混成旅旅团长池田直三并未阵亡）。一时间好几个炮连前往报名。原来在那次战斗中，除了57师炮1连，同时还有几个炮连也在附近，但最后奖励给了炮1连。“大家都说是自己打的，但又都没有证据。我们这时也不知道是不是我们打的了，是不是夺了别人的功劳呢？”不管怎么说，受到表彰后，炮1连的官兵都非常高兴，大受鼓舞。这也是尹同道最成功、最得意的一次战斗。

尹同道戏称炮兵是“苦兵”。他回忆起当时炮兵的苦和累。炮兵都是从步兵连队挑选体格较

壮、思想较为沉稳、特别能吃苦的士兵组建。早春的上高，天寒地冻，炮兵穿的是一身单衣，睡觉就在民房的地上铺些稻草，盖床薄棉絮。全班十几个人挤成一团互相取暖，以此熬过寒春的每个夜晚。那时人人身上长满虱子和疥疮，唯一的应对办法就是洒硫磺粉消毒。“上高会战那阵，下了几天雨。衣服、鞋子、帽子全湿了，头发又脏又乱，像野人一样，帽子戴不进头上只好扔掉。”尹同道说到这里哽咽起来。除了穿的，吃的也很勉强。抗战物资消耗大，前线官兵吃不到蔬菜和肉类，每天就是干菜：干笋、黄豆、辣椒、豆豉等，缺少营养。但就连这样的食物也无法完全保障。炮营的饭菜，开始是炊事班送，先由通讯兵找到炮营所在地，然后带着炊事班将饭菜送来。开始几天，炮营距离不算远，三里五里地，后来就变成八里十里……等通讯兵找到炮营，炊事班再将饭菜送来时，饭菜都已经冰凉了。后来干脆不送饭，每人自带一袋子炒米，也就是白米泡盐水炒熟，饿了就抓一把吃。渴的时候，口干得不得了，混着泥巴的臭脏水也能一口吞下，战士们戏称这是“野餐”或“吹泥饭”。中国军人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进行了“抗战以来最精彩的一战”，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

刘保罗：三挺机枪封锁官桥

□ 杜青

刘保罗，1939年毕业于黄埔军校14期。上高会战中，在49军26师76团2营机枪连担任连长。

1939年，刘保罗从黄埔军校毕业，分配到第三战区49军26师76团。在这里，刘保罗从排长干起，一直升到马克西姆重机枪连连长，最后当了营长。

刘保罗所在部队参加了反攻南昌战役，反攻失败后，随部队抽调到上高，增强上高的防卫能力。刘保罗回忆：“日本人倾巢而出攻打上高，南昌老巢只留了一个军的兵力守卫。我们也一样，附近的兵力都抽来参加上高会战。”

上高会战总指挥是罗卓英，时任49军军长是刘多荃，26师师长是王克俊。刘保罗对王克俊印象很深。“他在大会上讲话时，负责保护的通常是我们机枪连。王克俊个子很高，讲话声音洪亮，作战勇敢，指挥能力也很强，经常亲自指挥3个团猛打猛冲。”上高会战后，王克俊升为49军军长。对于军长刘多荃，刘保罗也有些印象：“很魁梧，讲话通常很短。‘抗战下定决心，有战斗意志，才能打胜仗’是刘



/ 官桥旧景。



/ 官桥新景。

多荃在上高会战前对大家的训导。”

上高会战中，刘保罗是26师

76团2营机枪连连长。76团有3个营，另有团属迫击炮连、机枪连、输送连。其中2营有3个连，



/ 缴获的日军战马。

加上营属机枪连、迫击炮排。刘保罗所在的机枪连有3个排，其中1、2排各有两挺马克西姆重机枪，3排则属弹药排，士兵主要负责供应弹药。刘保罗说：“3排全是挑弹药的。机枪连的弹药排和团里的输送连有区别。弹药排的士兵是正儿八经的士兵，但输送连有时并不一定是士兵。团里的输送连，说通俗点其实都是挑夫。”

部队部署在泗溪河下游，团长李佛杰将刘保罗的重机枪连调了过来。“调我们连加强火力有两个目的，一个是有利于部队向官桥推进，另一个是阻止敌人通过官桥。但实际上日本人很难堵，他们的火力太强了。”刘保罗命令部队死守官桥口。刘保罗说：“4挺马克西姆重机枪对准将要官桥过来的敌人，见

人就开枪。即使侥幸逃出几个，也不打紧。后面还有第二道防线，也是4挺马克西姆重机枪把守。”当时中国军队主要有两种机枪，马克西姆和捷克式，但马克西姆更好。在它的支架上加个支撑杆，就变成了高射机枪，可以打飞机。有了这种机枪，日本人的飞机就不敢低飞，对我军的威胁少了好多。

重机枪是连队的宝贝。刘保罗说：“每挺重机枪，至少有4名枪法好的步兵保护。重机枪开火，主要是点发和连发两种方式。日军飞机低飞时，要连发射击。日军冲锋时，很多时候以点发为主。”

“日军打机枪就比中国士兵有经验多了。他们平时最多打三发‘啪啪啪’（怕不怕）。但中国士兵，很多一上来就‘啪啪啪

啪……’没完没了。这样不仅浪费子弹，还有不少坏处，如命中率低、暴露位置。重机枪阵地也是敌人关注的重要目标。一旦发现你的位置，日本人一发炮弹过来，就将你报销了。”

刘保罗为此没少给机枪射手们上课：减小目标关注度，减少弹药消耗量，提高子弹命中率。后来他们连队的射手在点发时基本是打两发“啪啪”（不怕），用这个来回应日本人的“啪啪啪”（怕不怕）。

刘保罗回忆，上高会战时，部队的通讯联络设备很好。部队间联络，开始用电话，后来电话线断了无法接上时，就用“发动机”（注，可能是对讲机）直接讲话。师对师、团对团，这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以前打仗都是土办法，没有电话就只能靠通

上高会战亲历记

□ 魏杰

魏杰，黄埔军校12期毕业。上高会战中，担任74军58师172团第3营副营长。

上高会战是在武汉失守后，抗战形势异常艰苦条件下进行

的，是继台儿庄、长沙会战后又一场血战。我是黄埔12期毕业生，时任74军58师172团第3营副营长，为此战幸存者、历史见证人。

战前形势

敌人强据武汉后，企图进一步扩张战果，贯穿粤汉线，并企图割绝我华东与西南联系，孤立重庆，以战逼和。长沙为阻敌南进要隘，由于长沙四面皆



/作者(右)与刘保罗(中)合影。

少。但不等于没有牺牲，半个月下来，我们连也牺牲了10多个弟兄。牺牲的官兵多半都是被日军的炸弹炸死。日本人的炮火太猛烈了。”

刘保罗对官桥之战记忆深刻的还有关于骡马的牺牲。当时，一匹骡马可以驮1挺机枪或4箱子弹，担负很多人力做不到的工作，在机枪连是非常珍贵的。平时，刘保罗要经常监督马夫，怕喂马的干粮被马夫贪污或马夫偷懒没喂好马。骡马若有失踪或者死亡，必须向上级报告。报告中写上马的名称，并剪一段马尾附上。若有一个环节漏了，就要挨处分。官桥之战，连队里的骡马牺牲了。团长李佛态就叮嘱刘保罗剪段马尾，按程序上报。会战结束后，76团2营重机枪连竟然分到了俘获的4匹马。这样，骡马牺牲的悲伤很快就被快乐代替了。📖

讯兵穿越火线步行去通知各作战单位。”

上高会战取胜很不容易，打得很惨。刘保罗说：“敌我双方都一样。我几个排长腿都炸断了。”刘保罗的机枪连里死于

日军枪口下的不少，2排长林士彦是浙江人，毕业于黄埔17期，上高会战时在官桥被日军的炮弹炸死。刘保罗说：“步兵要和敌人近距离拼杀，伤亡多。重机枪兵以射击为主，所以牺牲

水，难以施展大兵团作战。日军汲取第一次长沙会战惨败教训，希图取道赣西、湘东夺取衡山，以收夹击长沙之效。我第九战区洞悉敌人阴谋，特派副长官罗卓英坐镇前线，统率74军、58军、新3军、赣西北挺进纵队，阻敌于松湖、石岗、大城、奉新、靖安等地，谋求与敌决战于上高地区。上高右依锦江，左恃华林寨、花桥之险，凭山而守，易守难攻，天赐歼敌之地也。

1941年3月初，敌人为了实现西进企图，纠集驻安义与南昌守备兵力数万之众，在强大炮兵空军配合下，由大城、祥符之线，向高安进犯。我军按预定作战方案，诱敌深入，令原防守大城、高安部队后撤至华林寨、花桥，以巩固上高左翼。3月18日，高安陷落。整训待命之74军奉命死守上高，以58师为左翼，57师为右翼，51师为机动预备队，于灰埠、泗溪、棠浦之线，严阵以待。74军善打硬仗，自把守赣西北门户一年有余，除支援第一次长沙会战外，一直养精蓄锐，经过长期整顿，兵员充足，士气旺盛。营以上干部多为黄埔生，下级干部大多来自山东、河南，大部分士兵故乡沦陷，对日军怀有家仇国恨，有些在荣誉军医院养伤的官兵，都自动带伤带病归队参战。

临危受命

3月中旬的一天，忽然接到师部送达紧急作战命令，我们立即赶到战场，划定防区，区分任务到营。刹那间，敌侦察机临空盘旋，战云笼罩，群众惊惶万分。在我所处防区前约2500米，有一前沿阵地，乃敌人进攻时必抢占之立足要点。师部命令派一加强连死守。我是本营副营长，随即带本营第9连附一重机枪排赶赴战场，重机枪排有两挺德造马克沁重机枪。经过详细侦察分析，此阵地名为龙形山，远望确似一条龙，横宽约1000米，纵深不到500米，由几座小山联结而成。山上除了一些小松树外，别无其他。阵地前有一片望不到边际的平地，为防守者创造了特别有利的条件。

我立即派出敌前搜索班，并召集班长以上干部开会分析敌情。会后立即采取行动，把如何对付敌机轰炸与炮击列为首要任务，制定了方案：（一）为了减少伤亡，竭力采取不规则疏散布置。（二）以排为单位编组战斗，排内各班为战斗群，按地形布置，越疏越好。（三）山正面由两挺重机枪封锁。（四）在预备队中抽出两挺对空射击轻机枪。（五）在比较暴露之山腰构筑一些伪工事、草人，并加以伪装，以吸引敌弹。因为敌人熟悉掌握我们一字长蛇阵布阵规律，

这样可以欺骗敌人。

阵前救难民

夜朦胧，一阵阵大雨淋得我们像一群水鸭。那时，我们除了斗笠，什么防雨的东西也没有，连后方送来的加餐饭也变成汤饭（尔后一个月都是咸菜饭，当地老表们这样支援，实在是感激不尽。）吃过晚饭，我们即进行准备工作，时间就是生命，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流血。据报告，高安逃出大批难民，要求到后方去避难。未经上级许可，不能私自放人进入防区，尤其在战斗一触即发的紧急关头，如果有敌人混入，其危害更不堪设想。按军规我们本可以置之不理，免担风险，但按情理我决不能睁眼不管。供养我们的乡亲正在水火中，哪有见死不救的道理。我立即派9连连长据实面陈团长，一面对难民进行严密搜查盘问，一面不断告诫搜查的士兵，不准拿难民一针一线，违者就地法办。经过两小时的工作，终于把难民护送到后方脱险，我内心有说不出的喜悦。官兵们对做过这样一件行善的好事，也非常高兴。

敌机轰炸

经过整天整夜施工，我们真假阵地的构筑、伪装等工作基本就绪，但需要继续加强。吃过

中饭，天朗气清，红日高悬，忽听得隆隆巨响从高安方向传来。我们立即进行掩蔽，各就各位做好战斗准备。敌人5架一批重型轰炸机，成批接踵而来，像一群白鹤，连太阳都遮得看不见。敌机先投弹后扫射，每当那凶恶的飞行员低空扫射或俯冲投弹时，那副鬼脸都被我们看得一清二楚。如果想用平射武器打中它，那比登天还难，反而暴露自己位置，我们只能忍住满腹仇恨，任其肆虐。

由于敌机被草人及伪工事迷惑，大部分炸弹落在伪工地上。我们那两挺对空射击轻机枪却大显神通，像变魔术一样，打完一夹子弹，就变换另一阵地。敌机紧跟不舍，又射击又投弹，我们6名机枪射手殉国2名。经过这一场狂风暴雨般的轰炸，龙形山到处是弹坑，山上那些小松树都被气流掀倒了。如果我们规规矩矩布防在山顶，也许我们的命运会跟龙形山上的松树一样。直到天黑，敌机弹尽才归。经过战场清理，我们死伤30余人，算是不幸中之大幸。

生死机遇

敌人陆空配合作战，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先轰炸，为地面部队进攻铺平道路；另一种是陆空并举，轰炸跟随着进攻，以及轰炸与进攻同时进行。所以



157师缴获的部分日军文件。

一个有战场经验的指挥官，就是炸弹落在身边，也不会忘记反攻。否则你就会像缩头乌龟躲在掩体里，被人摸上来活捉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身负前哨战任务，对大会战胜败关系重大，时常利用轰炸间断片刻，检查战斗组备战情况，并探望伤员。由于我时起时伏，精神特别紧张，加上敌人投弹过多，小山上高温，我浑身是汗，又闻到身上棉花烟味，总觉得自己流血了。事后脱下衣服检查，倒也平安无事，原来是卧倒时衣服被落下的弹片烧灼散发出的味道。

激战龙形山

敌人轰炸之后，我们判定，

敌人可能利用夜间或拂晓向我阵地进攻。我们为死伤人员做完善后工作，立即集结兵力，准备进行夜战。

果然，敌人在照明弹探照下，经过一阵炮击，在那穿呢子军大衣、长马靴，手挥军刀的指挥官带领下，如狼似虎潮水般地涌来。我们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待日军到了步枪有效射程内，一声令下，两挺重机枪、9挺轻机枪、100余支步枪如暴雨般开火，打得敌人像热锅上的蚂蚁乱窜乱爬。第二批敌人在重炮火力掩护下，仓促把那些死尸抬走了，可怜那些被抓来抬担架的难民像待杀羔羊，吓得路也不会走。我们对敌人掩护部队进行了一段

火力追击，终于送走了瘟神。事后，我们在敌人被歼现场检查，满地鲜血，滑得连路都不好走。我们收缴了一些枪支、一把长指挥刀，其他子弹等都没有捡。从此，我们阵地风平浪静。只听得远方的机枪声好像初春田野青蛙嘶叫，打破了战场沉寂。

由于敌人放弃了抢占龙形山前哨阵地的企图，改变主攻方向，由村前、棠浦迂回上高。前哨阵地失去价值，我们奉命由泗溪撤回。当时，战地记者作了采访，大家为我们首战告捷而欢呼，官兵们大受鼓舞。

开过庆功会后，我们立即归还建制。我回营部协助作战，我们营由于伤亡惨重，3个步兵连凑不足两连。全营勤杂人员也被挂上阵，为营后备队。我们营奉调后方为团后备队，给予暂时休息。我们找到一间放了许多稻草的小茅棚，当做营指挥所，这真是战地“安乐窝”。可刚架好线路，准备听取师部战报，由于看地图不小心露出了火光，被敌人发现。敌人连续几炮，那间小安乐窝立即倒塌燃烧，电话机也被炸成废铁。好在我们一听到炮弹的呼呼声，立即在空地卧倒，安然无恙。

夜幕下的出击

在阵地上，我们从没有见到自己飞机的影子，连支援的炮声

都没有听说过。白天总是掩蔽挨打，野战掩体加强又加强，除此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夜间就是我们大显身手、讨还血债的好机会。我们士兵常常自言自语地说：“白天奈你不何，夜里再打。”这样的夜战有大小打之分。一般情况，自己失的阵地，自己夺回，依赖别人是可耻的。由团、营组织的夜袭反击，那就没有官兵之分。团、营部除留人守电话外，个个都要冲锋陷阵，团长和营长只不过有几个警卫跟随。有时，警卫被打死了或打散不见了，就只剩下一个光杆司令。

于冠英营长，总是腰里插一把绑了红绸的小刀，手提快慢机手枪，十次有九次冲在士兵前面，像杀神下界，非常勇敢。陈团长打起冲锋，更是一壶白酒不离身。如果夜战成果不大，则由军、师两级组织反击，往往通宵达旦，杀得血流成河，尸骨堆山。乡亲们都说，鬼子来了狗都不敢吠。但在我们面前，日军是外强中干。他们每具死尸身上都有小菩萨或千针帕作为护身符，高级军官则有金菩萨。每当敌人被包围躲进掩体时，好像藏在洞穴里的老鼠。日军是训练有素的，但我们就是不怕死，敌人常说我们是一群“支那蛮子兵”。

总司令鼓气 老乡支前

在兵力与装备绝对劣势的

条件下，我们苦撑了20余天，伤亡惨重，已是筋疲力尽。正在这紧急关头，第九战区前敌总司令罗卓英亲率特务营赶来前线，坚定了部队死守上高、血战到底的决心。哪里战况紧急，他就在哪里，听取第一线部队反击计划的报告。部队从此士气振奋，满怀胜利信心。老乡们也不顾生死，炮火下的支前工作做得前所未有的出色。战地服务团穿梭在第一线送茶送饭，问长问短，护理伤员，真是军民一家人，为的是抗战胜利，为的是民族生存。

转守为攻追穷寇

由于第三战区友军由清江渡赣江策应，其前锋已达张家山、新街之线，敌后路有被切断之危险，怕遭全军覆没，于是仓皇撤退。我军奉命全线出击。我团分三支轻装追击队，向杨公圩、龙潭跟踪追击，在杨公圩附近与敌后卫部队激战一场。我军如猛虎驱群羊，敌人溃不成军，争先恐后奔逃。在龙潭敌人指挥部炊事房，仓皇逃跑的日军留下一大锅热气腾腾的红烧牛肉，成为我军的一顿美味早餐。沿途尽是敌人遗弃的军需品，高安附近举目废墟、鸡犬绝迹，一片荒凉。我们追到祥符待命，保护乡亲重振家园。■

上高会战中掳获的日军文件和供词

□ 吴鸾

吴鸾毕业于中央军校驻豫军官团第1期(据单补生先生查证,核列中央军校军官训练班第2期第3总队学籍)。本文是1941年4月15日,吴鸾用戾天的笔名刊登在《前线日报》(江西)第三版的一篇报道。

“希望”幻灭

当3月23日,敌机狂轰上高的时候,一架九四式双发动单翼战斗机正在低飞回翔的当儿,被我xx军(此处保留原文)神枪手用二公分的机关炮击落了!残骸留在锦江北岸一七二四高地。事后清获文件,始知系驻南昌之敌空军少将藤爱派来飞送紧要文件给身临前线指挥之大贺茂中将的。那牛皮纸的大信封,虽然烧焦了一角,但那“大贺中将阁下”几个大字依然无恙。信封下角还写上“紧急重要”四个字,并用红铅笔加上小圈,这该是何等珍贵的收获啊!

信封里第一张是敌空军侦察我军阵地要图,钳形的箭头,指向上高,在锦江南岸沿江西进,北岸是用很粗的线条,指向上高城,写上“希望”两个字,

无疑这是重点和目的表示。此外在界埠、石头街、下陂桥、白茅山等处,画上炸弹的符号,并注明“盼与空军切实协同”。

在另一张纸上写着:

连日连夜的战斗,想辛苦极了。得报知气压和天候恶劣,是则更有赖于不可思议之坚持及受上天保佑以占领上高矣!切望贯彻最后五分钟之战斗,以收赫赫有名之战果,本队亦誓为后盾。

池田支队已与取得联络,并已投下接济品和弹药,情势缓和,请勿介怀!总之,机力所能及当尽力以赴,故必协同心,以占领上高……

请示知总攻上高之时机,我方已准备以全力协助,时刻一定,一举突入如何?

不幸,这文件和要图做了我们的战利品,“希望”是幻灭了,大贺也许成了大祸!

伤心一首诗

我部队掳获品中有本很精致的日记,第一页是首汉文诗:

秋风寂寂粤南天,凉逊城头残垒边。

遥拼故国伤心血,樱花续梦在何年?

文义虽然有点牵强,可是厌战思家的情愫,跃然纸上。第二页为旅团长以下各官长的姓名,作者许是中小队长。

其个人行踪如下:

昭和十四年(民二十八年)4月9日拜别东京靖国神社,13日出发,25日到青岛,26日到济南,29日编队。此后在鲁、豫、冀间参加(对八路军的)“讨伐”,7月24日负伤赴大连。10月初伤愈,14日在旅顺见学,27日复回大连。28日乘xx丸南行,11月9日到海南岛,15日东京湾敌前登陆。29日到南宁。

那薄底页还有一张折了许多皱纹的少妇照片,那便是樱花续梦中的人物吧?

动荡的倭国

池田少将的叔父池田义三,在1941年2月25日给少将的信大意如下:

皇纪2601年(1941年)春天,祝你途中平安。国内恶劣天气继续着(恐系指政治和环境),工

厂无法开工，农村不能着手耕作……感受无限苦恼，去年（1940年）稻之收成比往年减了一半。地主和佃户都受到极大打击。如果今年麦作又属不良，将无以为食。

各处已不复再见壮丁，报纸上和播音机都是鼓吹新体制，眼睛里、耳朵里都是这些字句和音调。民众们的利益，都在新体制的名义下剥夺完了……

另外，从九州寄给中尾秀夫的信件中，同样把罢工、暗杀等动荡的情形，说得很详尽，里面还附了反战大同盟的传单，可是封皮上“军事郵便”字下却堂堂皇皇地盖上“陆军省检查迄”的戳记。

补充无尽期

在上高东北下陂桥附近，我部队掳获日军山根军曹（中士）日记，其中（1941年）3月22日第1小队负伤记录如下：

伍长（下士）松井俊夫，肩头部、侧腹部贯通銃伤；上等兵尾须守臀部盲管銃伤；一等兵高野雄人、吉冈太郎头部受伤；小手一三左前膊贯通銃伤；森管太郎腰部銃伤；冲本二郎右手贯通銃伤……死者尚不计入。

在24日，这位军曹也无言地“凯旋”在下陂桥头了。

同时，在敌大西濂藏中尉的



/ 1941年4月15日的《前线日报》。

日记本上，所贴之中队编成表，计步兵3小队、机枪1小队、官兵全员约200名，其患病者达22名。自昭和十五年（1940年）春季起已补充4次。第一次在吕县25名，第二次南宁58名，第三次龙州17名，第四次吴淞93名。在末尾，中尉似乎很感慨地写上：“补充兵的标准，一天天降低。许多未及役龄及已逾役龄以及五官不全的人们都征来了，这些人哪能宣扬‘皇风’？……”

这次战役又能补充多少呢？又再降低标准多少呢？谁再给中尉记下去？


生活的呐喊

上高会战被俘的日军独立混成第20旅团上等兵中原维夫情况如下：

1940年5月入伍，6月24日在广岛受师团长检阅，30日乘香樵

丸号运输船抵钦县龙门港，7月4日至大董，9日到南宁，16日到龙州住那柴村（译音）。一个月內受我军袭击三次，死伤颇多。8月3日，军司令官久纳诚一中将训话，准备进攻越南。5日动员，夜间又奉令停止，直到21日进攻。初到泽平（音译），24日向兰村（音译）攻击前进。26日（日法越）停战协议签订，11月7日开抵上海，驻大场镇。12月17日改编为独立混成第20旅团。1941年2月19日在九江登陆，21日出发往南昌（驻望城岗今陆军学院），3月11日由往南昌出发，夜行军至生米街，此后地名不详。

据供，一等兵月饷5元5角，另发战时津贴3元3角，月扣储金2元，每月实发6元8角。但发的都是军用手票，寄回国可不成（日本国内不用军用手票）！家有老母和幼妹，全靠他维持生活。现在可不知道怎样生活了？军装是一年不如一年，而今衬衣、裤、袜子都没有穿着，只好去掠夺点。最好是当宪兵，可以包庇走私……

从这些事实里面，反映给我们的是日本部队军心离贰，士兵疲惫，伤亡惨重，兵员枯竭。日本国内政治动荡不安，天灾人祸，这些都是“罪孽深重，应自殒灭”的征兆！

（本文由吴鸾的女儿吴仪东提供）

上高会战遗址

上高会战遗址位于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2013年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上高会战遗址分布于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敖阳街道办、泗溪镇、翰堂镇、新界埠乡、芦洲乡及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等地，主要包括19处旧址，分别为中国军队第19集团军总指挥部旧址、第74军第58师战时指挥部旧址、第19集团军妇女战地服务团旧址等地于2020年完成复原式展览，展览面积共约1700平方米。通过复原式陈展，再现了当年抗战历史，展示了中华儿女不甘奴役、不畏强敌的英雄气概和爱国精神。

中国军队第19集团军总指挥部旧址

上高会战期间，第19集团军隶属第9战区，总司令罗卓英，下辖第49军、第70军、第72军、第

74军、第2挺进纵队、江西保安纵队等，约10万余人。总部自1939年至1941年，一直驻扎在上高县汗堂镇汗堂村道坡自然村，直至会战取得完全胜利。指挥部旧址为民居大宅院。民宅长54米，宽18米，占地面积972平方米，二进三开间，大门为门斗式，前沿有八字墙。前堂两边有厢房，后堂在上高会战期间被日本飞机炸毁，一直没有修复。该旧址设有警卫室、电报房、浴室、厨房等，大门墙面书标语两条：“军令重于山”“纪律重于山”。第19集团军总部是整个上高会战中国军队的指挥枢纽，旧址有很高的历史价值，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理想

行维修，一期（9处工程）已经完成，二期（10处工程）目前正在修缮中。中国军队第19集团军总指挥部旧址、第74军第58师战时指挥部旧址、第19集团军妇女战地服务团旧址等地于2020年完成复原式展览，展览面积共约1700平方米。通过复原式陈展，再现了当年抗战历史，展示了中华儿女不甘奴役、不畏强敌的英雄气概和爱国精神。

中国军队第19集团军总指挥部旧址

上高会战期间，第19集团军隶属第9战区，总司令罗卓英，下辖第49军、第70军、第72军、第



/ 第19集团军总指挥部旧址。

上高会战遗址总体上保留完整，现有建筑和战场遗址基本保持了上高会战时期的历史格局和风貌，留存了文物及所在地的历史信息，真实性、完整性较好。上高会战遗址文物本体维修争取到国家专项补助经费，分两期进

基地。

中国军队第 74 军第 58 师战时指挥部旧址

第19集团军所辖第74军第58师，师长廖龄奇，副师长张灵甫。上高会战期间，该师由张灵甫代指挥。1941年上高会战爆发，第58师就布防在上高官桥、宜丰棠浦一线，与第57师共同筑起抵抗日军进攻上高的最后一道防线。第58师师部设立在官桥村村民喻元然旧宅。该旧宅位于官桥自然村正中，为民国早期建筑，坐北朝南，砖木结构，长38米，宽19米，面积为722平方米。旧宅正面为外八字门，大门两侧至今保存有当年书写的标语，内容为“抗战必胜、建国必成”。

中国军队第 19 集团军妇女战地服务团旧址

1939年，第19集团军司令部进驻上高汗堂镇汗堂村后，大批进步女青年从上海、南京等大城市来到上高汗堂，组成妇女战地服务团。她们的主要任务是活跃部队文化生活，定期组织演出，鼓舞士气，业余时间教当地小孩识字。上高会战爆发后，这些女兵又充当战地救护员。上高会战胜利后，因国民党追查进步青年，妇女战地服务团没有随第19集团军转移，后来自行解散。

妇女战地服务团女青年们在




/ 第 74 军第 58 师战时指挥部旧址。



/ 第 19 集团军妇女战地服务团旧址。

抗日救亡期间，深入前线，为鼓动宣传、救死扶伤、融洽军民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妇女战地服务团旧址为汗堂村祠堂，现为汗堂镇汗堂村村落社区志愿者协会所在地。祠堂为清代建筑，坐北朝南，砖木结构，长36米，宽21米，面积为756平方米。祠堂为三

进，前厅左右两侧各有4个厢房，后面有一戏台，为演出台，演出台左右两侧有两小耳房，为厨房及更衣室。19集团军妇女战地服务团旧址见证了上高会战期间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合作打日军的历史。

（上高县博物馆供稿）

抗日阵亡将士陵园

1941年，为了纪念上高会战抗日阵亡将士，中国军队第19集团军在会战结束后，即在县城北敖岭南麓马帽山修建了抗日烈士墓。墓为圆顶，3座并立，墓前立墓碑，正面是罗卓英书写的“上高会战阵亡烈士墓”碑文，上高会战阵亡烈士墓在“文革”期间，因建三线工厂而被毁。

1991年，为了纪念上高会战胜利50周年，上高县人民政府在县城东郊的镜山重建“抗日阵亡将士陵园”。陵园正大门刻有“抗日阵亡将士陵园”8个大字，是由原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张爱萍题写。陵园依山而建，共分5个层次，每层留有供前来祭奠的人们休息的平地。上高会战毙伤日军15700余人，陵园设计了157级台阶直通陵园顶部，取将入侵的日寇永远踩踏于地下之意。台阶两旁苍松耸立、翠柏夹道、绿草环绕，显得极为庄严肃穆。

陵园前部的两座浮雕墙再现了上高会战的场景，左边浮雕墙再现了上高民众在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下积极配合支前，破坏敌人交通，运送伤员、弹药的情景。右边浮雕再现了19集团军高级将领在战场视察的场景以及国家一



/ 抗日阵亡将士陵园。



/ 上高会战阵亡将士墓。

级文物“个个还要爱国”墨盒。陵园中部有座“会战亭”。亭内矗立一块青石碑，刻有《上高会战

抗日阵亡将士陵园重修记》。东侧墙上嵌有多块石板，上面刻着上高会战总指挥罗卓英的《赣北大



/ 浮雕墙。



/ 会战亭。



/ 中国第60军第184师在上高留下的标语墙。

捷》四首诗。西侧有一堵上高会战时留下的抗日标语墙，墙上写着“军爱民，民助军，军民合作打日本”。落款是“184D政”，即国民革命军184师政治部的简称。

陵园顶部3个墓冢是阵亡将士墓，墓前矗立着一块长条形花岗岩石碑，石碑上刻有“上高会战抗日阵亡将士墓”11个隶书大字，苍劲有力。后面3个墓冢代表了上高会战期间阵亡的9500多名

战士，一个大的代表官佐，两个小的代表士兵。两侧及其后刻有阵亡烈士名单，共计4000有余，上高会战多数牺牲的官兵名字被记录在此。

2013年以来，东侧石墙后面陆续增添了3座曾参加上高会战的抗战老兵墓，他们是：李云清、陈世华和秦然轩。2013年5月，李云清墓和陈世华墓由原江西专用设备厂附近搬迁而来。2011年4月2日，黄埔军校第14期步科毕业的

秦然轩以参加上高会战老兵的身份出席纪念上高会战胜利70周年公祭。其间，他向家人和上高有关部门提出，希望逝世后能将部分骨灰安葬在阵亡将士陵园，以永远陪伴他的战友。2014年9月，秦然轩逝世。根据他的遗愿，家人征得上高县有关部门同意，将其部分骨灰安葬于抗日阵亡将士陵园。秦然轩墓碑长73公分、宽49公分。“73”代表2014年是上高会战73周年，“49”代表秦然轩所在部队第49军。

1995年，上高会战抗日阵亡将士陵园被颁布为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9年，被颁布为江西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2年，上高会战遗址被列入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2013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抗日阵亡将士陵园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

(上高县博物馆供稿)

立足国家重大规划 推进两岸经济融合发展

——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下推进两岸经济融合发展的思考

□ 曹小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经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和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擘画了宏伟蓝图，引发两岸各界广泛的关注与讨论。国家重大规划始终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式和重要力量，同时这一新的规划也为新时代两岸经济融合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值得高度关注。

国家重大规划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式

编制和实施五年规划，始终是国家推动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式，也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举措。从1953年开始至今，国家已经编制、实施了13个五年规划（计划），其中，改革开放以来就编制实施了8个，将这些规划（计划）连接起来，就是中国70年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宏伟路线图。

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提出“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即到建党100周年时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和到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017年10月，中共在十九大上进一步提出“新两步走”的战略目标，即“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然后向新中国成立100周年的目标迈进，“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为落实“新两步走”的战略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举措。换言之，《纲要》是今后5年乃至更长时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行动指南。《纲要》有以下几个亮点值得特别关注：

一是《纲要》明确强调了科技创新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纲要》提出“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把科技创新作为国家

建设的重中之重，体现出中国在“十四五”乃至更长时间将以科技创新为抓手，在解决“卡脖子”科技问题上向前大步推进的决心。与此同时，在具体操作层面上正在形成一系列重大举措，如，在国际层面，将采取新的方式进一步强化科技的国际合作；在国内层面，将形成新的举国体制，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在区域层面，将进一步巩固以京津冀、长三角、华中西南地区、东北及西北以及粤港澳大湾区为代表的科创中心；在企业层面，将强化创新主体地位，提升创新成果的应用性和转化率等等。

二是《纲要》建议强调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实体经济上。“十四五”期间，中国将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并推动金融、房地产同实体经济均衡发展。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是构筑未来发展战略优势的重要支撑，因此，中国会坚定推进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具体来看，产业链供应链更加现代化，制造业发展将继续得到重点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会持续壮大，

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现代服务业会持续向专业化、多样化、高品质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服务业品牌认知将持续增强；基础设施体系将持续完善；数字经济将与实体经济进一步深度融合，数据共享和开放平台建设将加快，共同推动实体经济由量大转向量大质强。

三是《纲要》明确提出加强两岸产业合作，打造两岸共同市场，壮大中华民族经济。面对新形势，两岸需要在经济上深化合作、产业合作上转型升级，企业互利共生上也要进一步探讨共同努力的方向和目标，打造适应新形势的合作新模式。祖国大陆已提出完善保障台湾同胞福祉和在祖国大陆享受同等待遇的制度和政策，支持台商台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和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支持符合条件的台资企业在祖国大陆上市，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支持更多台胞台企在参与“十四五”时期建设中实现更大更好发展，在高质量发展中提质增效，在新发展格局中再上新台阶。使之进一步融入祖国大陆经济，并与祖国大陆共同融入国际经济，为台胞台企在这一轮祖国大陆市场结构调整中创造新的机会，也使两岸企业有更多机会携手跨越深化两岸经济合作各种障碍，找到新的、更大的

合作空间。

推进两岸经济融合发展需聚焦国家重大规划

回顾40余年两岸经济合作，成功的经验有千条万条，归根结底，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两岸经济融合发展需始终聚焦于国家重大规划，正如汪洋主席所言“经济合作是两岸关系发展的基础，符合两岸同胞共同利益”。（2020两岸企业家峰会贺词）当前，祖国大陆经济转型升级、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常态已成定局，面对新形势，两岸经济合作需要“再出发”，共同探讨新的努力方向和目标，打造适应新形势的两岸合作新模式，使台商台企在这一轮祖国大陆市场结构调整中不错过新的机遇，也使两岸企业找到新的、更大的合作空间。

具体而言，推进两岸经济融合发展聚焦于国家重大规划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其一，融合发展需聚焦两岸科技创新合作。如上所述，《纲要》把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并从国家层面、企业层面、人才层面和体制机制层面明确了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具体路径，可以肯定，科技创新将持续成为未来5年乃至长远的国家推动

经济发展的关键词。

在世界经济论坛（WEF）公布的全球竞争力排名中，台湾自2005年起，已经连续18年跻身世界前20名以内，在《全球竞争力报告》中设计的12大类指标中，台湾创新能力位列前茅，2018年总体创新能力位居全球第四，一些产业具备世界先进水平，且多年来台湾百万人均有效专利数排名均在世界前列。

当前，祖国大陆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两岸科技合作需求显著增长，同时，祖国大陆内需市场快速扩张，对高新科技产品也有旺盛的需求，这些构成了两岸深化科技合作的新机遇。尽管两岸科技与产业合作面临美国保护主义和岛内非经济因素的不利影响，但相信两岸业界合作最终还是服从于市场的逻辑。面对新的挑战与机遇，两岸有必要携手制订新的两岸科技产业合作战略，建立新的架构流程、瞄准新的课题、开拓新客户、进入新市场，推动两岸科技创新合作有突破性成果。

其二，融合发展需聚焦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纲要》提出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重点阐述了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并强调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可以肯定，“十四五”期间，需

求端的投资、消费和进出口“三驾马车”都将有新的发展，其中，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将进一步提升，消费环境将持续优化；投资将合理增长，通过对“两新一重”领域的持续投资，进一步补齐短板、维护经济安全、优化结构；对外开放的质量将持续提高，在保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基础上，内需和外需、进口和出口、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将进一步协调发展。

长久以来，两岸经济合作的主导样式是“两头在外”，即产业链上游主要依赖美国、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产品的市场也主要在美、日等西方国家，只是生产工厂落脚于中国大陆。随着中国大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特别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两岸的经济合作方式也必然会在合作的内容、模式、路径有新的范式。祖国大陆将会积极引导台商台企参与“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一带一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人民币国际化、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通过扩大台商台企参与内需市场投资、建设和提升产品在祖国大陆内需市场的占有率，实质性地融入祖国大陆经济的进程中，与祖国大陆企业共同参与国际竞争。

其三，融合发展需聚焦深

化两岸产业链合作。《纲要》对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特别强调了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构筑互利共赢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体系，深化国际产能合作；提出了优化产业链供应链发展环境、全产业链优化升级、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补齐产业链供应链短板，以及优化区域产业链布局等等，体现了祖国大陆对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高度重视。

一段时间以来，两岸相当一部分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呈现低地位、高参与度的状况，使两岸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被支配的地位，仅能获取较低的产品附加值，其影响力、发言权和安全发展都受到全球价值链主导者及不合理经济秩序的约束与控制，这对两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极为不利，有极大的低端锁定和易于被替代的隐忧。为突破上述困境，两岸有必要在全方位参与现有全球价值链的基础上，通过完善制度环境、打造资源整合和要素聚集新平台，保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有效率的对接。

“十四五”规划及2035年远景目标为两岸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有效对接指明了方向：一是两岸产业要转入更高层次的制度性合作，推进两岸核心经济群合作，如：基础设施、能源、交通和应用研究等方面的合作，构

建有自我核心竞争力的产业链供应链；二是两岸业界要携手参与国际竞争市场，共同开辟第三方市场，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增强同新兴发展中国家的交流合作，提升两岸企业在标准领域的话语权。

国家重大规划背景下推进两岸经济融合的挑战与机遇

2016年5月，民进党全面接管台湾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立法、司法、经济、军事、外事大权，出现了台湾和两岸关系史上所未有之局面，岛内政治生态日趋复杂充满变数，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不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破坏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使两岸关系发展前景堪忧。

但40年一直在风雨中前行的两岸经济关系已具备特有的运行规律、积蓄了抵御风险的能量，仍将会向前推进。同时由于祖国大陆、国际和两岸形势的变化，尤其是在“十四五”规划及2035年远景目标下，如何推进两岸经济融合发展行稳致远，值得高度关注。为此笔者有以下几点判断：

一、中国大陆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大市场有利于促进两岸经济融合。根据世界银行最新预测，尽管美国经济总量仍

中国、美国和世界的预期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及增量绝对额
(单位: %, 亿美元)

	2018		2019		2020		2021	
	增长率	增量绝对额	增长率	增量绝对额	增长率	增量绝对额	增长率	增量绝对额
中国	6.6	6706	6.2	6716	6.1	7017	6	7322
美国	2.9	5031	2.5	4463	1.7	3111	1.6	2977
世界平均	3	24075	2.6	21491	2.7	22898	2.8	24387

居世界第一,但其增长的绝对量已经被中国大陆超过,而且这一数字还在逐年拉大。按2010年不变价格计算,2018年中国大陆经济增量的绝对额6706亿美元,美国为5031亿美元;2019年中国大陆为6716亿美元,美国为4463亿美元;2020年中国大陆为7017亿美元,美国为3111亿美元;2021年中国大陆为7322亿美元,美国为2977亿美元。数据来源:2019年世界银行。其中,地区生产总值(GDP)增长率来源于全球经济展望数据库,GDP增长额根据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进行计算得出。以2010年不变价为基期。

二、中国大陆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有利于促进两岸经济融合。在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中国大陆经济面临着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新课题。在这一大背景下,两岸的经济合作方式也必然在合作的内容、模式、路径上追求创新、符合高质量发展的范式,尤其将会加强

在高端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人才创新创业、更高层次的产业链等方面的合作。过去20余年,两岸经济合作快速增长基础是祖国大陆经济旧的发展模式,而旧的发展模式所依赖的是祖国大陆经济快速、持续的增长;人口红利与环境对出口超长增长的支撑;经济、金融和地方财政对房地产业的依赖过重以及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不合理等。新形势下,上述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祖国大陆将会积极引导台资企业融入中华民族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根据发展需要不断创新合作模式,使两岸经济合作在祖国大陆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和国际经济规则重构的进程中找到新的发展空间。

三、两岸企业基于市场规则的自发合作将成为两岸经济融合的主导。两岸经济合作已40年,有了较深的相互了解和较好的合作基础,会最大限度地排除来自岛内政治势力的挑战。同时,在祖国大陆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台商台企将有机会在基于市场规则的基础上进一步以更为平等的经济主体参与国家的经济发展。具体而言,台商台企在未来若干年,两岸经济合作在以下三方面将有更大的合作空间:在区域层面,参与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打造台商投资区、平潭综合实验区、福州新区、昆山深化两岸产业合作试验区等对台合作平台;在产业层面,在强化制造业合作的同时两岸金融、两岸资本市场将有机会开展多层次合作;在企业合作层面,两岸企业将有机会进一步优势互补、融合发展,企业间相互持股、合作创新、共创品牌、共拓市场,催生一批新的具有国际一流竞争力中华企业。

习近平总书记自2010年4月以来多次提出海峡两岸经济关系的本质首先是“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纲要》中也提出两岸要“打造两岸共同市场,壮大中华民族经济”,推进两岸经济融合发展。过去40年两岸各界共同打造两岸经济合作基础的动能强、潜力大、韧性足,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同体,相信只要我们抓住“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重大机遇期,与台商台企共同努力,一定能推动两岸经济融合发展再上层楼。■

海峡两岸大事记

2021年2—3月

□ 吴亚明

2月

台湾学者新书《谢南光》弘扬台胞爱国精神

台湾史研究会理事长戚嘉林所著《谢南光》新书发表会日前在台北举行。戚嘉林表示，希望借此书让更多台湾民众了解谢南光事迹，共同弘扬谢南光爱国爱乡精神。

闽台深化金融合作，拓展银团贷款业务

福建海峡银行牵头与台湾彰银商业银行、台湾合作金库银行、台湾华南商业银行三家台资银行合作，将开通为台资企业办理银团贷款业务。

外交部：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建交国与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交往

据报道，圭亚那政府当地时间4日宣布终止台湾在圭设立“台湾办公室”协议，表示将继续遵循一个中国原则。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5日表示，圭方及时纠正错误，有利于双边关系大局。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建交国与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交往。

台湾1月对大陆出口创历史新高，同比大增近六成

台湾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8日公布，台湾2021年1月对大陆（含香港）出口额达148.5亿美元，创历年新高，同比大增57.0%，占台湾总出口额的43.3%。大陆（含香港）持续位列台湾地

区最大出口市场和最大顺差来源地。

国台办评台湾地区领导人春节谈话：歪曲事实、混淆视听

针对台湾地区领导人在春节谈话中声称两岸和平关键在大陆手上，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9日应询表示，民进党当局企图挟洋自重、散布“两国论”，以歪曲事实、混淆视听来蒙骗、麻醉岛内民众，其本性再次暴露无遗。

台湾2020年结婚登记数10年新低，大陆籍新婚配偶持续减少

台湾地区内部事务主管部门发布的最新统计显示，2020年台湾结婚对数共计121702对，比2019年减少12822对，为近10年来新低。其中，登记结婚的大陆籍配偶延续10年呈下降趋势，为2363人。

古 DNA 研究证实台湾古代人群与大陆壮侗语人群有紧密遗传关系

北京时间23日，一项由中外科学家共同完成的古代 DNA 分析研究成果由国际期刊《自然》在线发表。论文通讯作者、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王传超介绍，研究发现，台湾2000至3000年前的古代人群与大陆壮侗语人群有紧密遗传关系，为台湾南岛语族来源于大陆提供了直接证据。

国台办：“新南向政策”只会对台湾经济和台企台商造成损害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24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表示，民进党当局所谓“新南向政策”意在为政治目的服务，违反经济规律，只会对台湾经济和台企台商造成损害。

国台办：民进党当局编造理由拒绝大陆疫苗完全是政治心魔作祟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24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表示，民进党当局某些人弃台湾民众健

康福祉于不顾，编造各种荒诞理由拒绝大陆疫苗，完全是政治心魔作祟。

国台办：各地台办积极帮助台胞台商度过欢乐祥和的春节假期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24日介绍说，受新冠肺炎疫情特别是民进党当局防疫政策影响，今年留在大陆过年台胞较往年大幅增多。春节前，国台办向全国台企联、各地台协发出慰问信，向台胞台商致以诚挚慰问和节日祝福；同时要求各地台办积极帮助台胞台商度过欢乐祥和的春节假期。各地践行“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入社区、工厂、学校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走访慰问活动，送祝福、话亲情、听心声、问冷暖，协调解决台胞关心的问题。

国台办：一如既往为台生来大陆学习深造提供便利和服务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24日应询表示，当前两岸关系虽面临一些障碍，但无论两岸关系形势如何变化，大陆有关方面都将一如既往为台湾学生来大陆学习深造提供便利和服务。真诚希望广大台湾学子克服困难，坚定信心，把握机遇，赢得未来。

两岸民众“云上连线”共度元宵佳节

“2021年高雄·北京特色周”暨“2021年京台社区云聚首·元宵节”活动25日下午借助视频连线，在北京东城区和台湾高雄香蕉码头、冈山区三个会场同步举行，吸引了两岸约600位民众参与。

国台办：大陆暂停进口台湾菠萝是正常生物安全防范举措

针对海关总署26日在其网站上发布关于暂停进口台湾菠萝的通知，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应询表示，2020年以来，大陆海关多次从台湾地区输入大陆的菠萝中截获检疫性有害生物。这些有害生物一旦传入，将对大陆农业生产和生态安

全造成严重威胁。为从源头上防范植物疫情风险，海关总署决定自2021年3月1日起暂停台湾地区菠萝输入大陆。这是正常的生物安全防范举措，科学合理，符合大陆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

3月

唐代墓室壁画在台湾启动新一轮巡展

近50幅以高质量数字技术复制的唐代墓室壁画作品5日在台北科技大学展出，这是这批唐代壁画作品2021年在台湾巡展的第一站。

台湾中考人数写下历年新低

少子化给台湾教育带来持续冲击。台湾当局教育主管部门14日公布，2021年初中教育会考总报名人数共202547人，比2020年减少近6500人，写下历年中考人数新低。

台湾苏花公路发生交通事故致6死39伤

据台湾当地消防部门消息，16日下午台湾东部苏花公路发生一起游览车撞路边山崖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

国务院台办、农业农村部、国家林草局等部门出台《关于支持台湾同胞台资企业在大陆农业林业领域发展的若干措施》

国务院台办、农业农村部、国家林草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供销总社17日联合出台《关于支持台湾同胞台资企业在大陆农业林业领域发展的若干措施》（简称“农林22条措施”），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农林22条措施”与“31条措施”“26条措施”一脉相承，进一步为台胞台企参与大陆农业林业高质量发展及乡村振兴提供同等待遇。这些措施立足新发展阶段，鼓励台胞台企抓住机遇、升级发展，贴近基层台胞需求，聚焦台胞台企关心的普遍性问题，涵盖面广、支持力度大。

农业农村部：台胞台企土地经营权一直受保护

农业农村部对台农业事务办公室副主任蒋建平17日应询表示，台胞台企作为经营主体，其土地经营权和其他主体一样，一直受到保护。新修订的《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3月1日起正式实施，进一步强调在依法保护集体所有权和农户承包权前提下，平等保护经营主体依流转合同取得的土地经营权，保障其有稳定的经营预期。这里的经营主体自然包括台胞台企。

农业农村部：继续支持台湾农民创业园申报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农业农村部对台农业事务办公室副主任蒋建平17日在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17年以来，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大力推进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已累计安排中央财政奖补资金90多亿元人民币，支持创建了151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浙江慈溪、山东栖霞、江苏锡山和安徽和县4个台湾农民创业园成功入选创建名单，我们将继续支持台创园申报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台胞台企可依法获得集体林地经营权及林地上林木所有权使用权

针对“农林22条措施”涉及林地经营权的内容，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国家林草局港澳台办公室副主任胡元辉在17日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作了解读。朱凤莲表示，台胞台企能够依法获得集体林地经营权以及林地上的林木所有权、使用权，可依据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开展林地经营权登记，也可依规再次流转。

国台办：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将粉碎民进党乱港谋“独”妄想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7日应询表示，全国人大作出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民进党及其当局对此感到恐慌并一再跳出来歪曲事实、妄加指责，是因为这将斩断“台独”“港独”勾连乱港分裂的黑手，粉碎他们乱港谋“独”

的痴心妄想。

国台办：美舰穿航台湾海峡的行为向“台独”传递错误信号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7日应询表示，美舰穿航台湾海峡的行为向“台独”分裂势力传递错误信号，蓄意干扰破坏地区形势，破坏危害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坚决反对。我们要求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慎重处理涉台问题。解放军将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国台办：正研究制定重点人群外在大陆台胞疫苗接种政策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7日应询表示，2020年12月下旬以来，按照疫苗紧急使用统一部署，各地台办在当地政府统筹下对从事进口冷链、口岸检疫等九类重点人群台胞一视同仁，按属地管理、自愿申请、知情同意的原则，纳入当地免费接种安排。有关部门正研究制定重点人群外在大陆台胞疫苗接种政策，妥善安排有关事宜。

厦门出台政策支持台青赴厦就业、创业

厦门市政府日前发布关于进一步鼓励和支持台湾青年来厦实习就业创业的若干措施的通知，拟通过建设台湾青年就业基地、提供创业启动资金、便利台湾青年子女就学等多个途径鼓励和支持台湾青年赴厦就业、创业。

知名台企纬创昆山工厂跻身全球“灯塔工厂”

世界经济论坛宣布，全球灯塔网络新增15个“灯塔工厂”成员，纬创集团昆山工厂位列其中。“灯塔工厂”项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麦肯锡合作开展，旨在遴选出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尖端技术应用整合工作方面卓有成效、堪为全球表率的领先企业。

两岸专家“云”座谈共享防疫策略与经验

由海峡两岸民间团体共同举办的两岸防疫政

策与经验交流座谈会18日通过北京—台北视频连线方式举行。两岸专家围绕“两岸防疫政策检视与前瞻”“科技应用与社区防疫”“后疫情时代两岸交流与融合”三项议题展开交流研讨。

两岸“云端”话清明，冀携手传统文化传承创新

“第八届海峡两岸清明文化论坛”20日举行，围绕“清明文化的生命关怀”“清明文化与民族认同”“清明文化永续传承”等议题，两岸近百位嘉宾学者在“云端”展开热议。

台湾2月销往大陆订单同比上涨48.6%

台湾当局经济事务主管部门22日发布统计数据显示，2月台湾企业销往大陆（含香港）的订单达109.1亿美元，比上年同月增长48.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和“看台海”新媒体平台开播上线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对台湾广播台海之声和“看台海”新媒体平台24日开播上线。据介绍，台海之声覆盖祖国大陆东南沿海、台湾地区，使用汉语普通话播音，全天播音20小时。

持续干旱！台湾部分县市将实行“供5停2”分区供水

台湾旱情持续，中部地区尤其严重。台湾地区灾害应变中心24日宣布，4月6日起苗栗、台中及彰化县部分区域实行每周“供5停2”民生限水。这是台湾近20年来第3次大规模分区供水，将有逾百万用水户受影响。

国台办：坚决反对台美之间签署任何具有主权意涵的协议

针对“美国在台协会”和台湾驻美国“经济文化代表处”26日签署所谓“设立海巡工作小组备忘录”，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当日应询表示，我们坚决反对台美之间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或签署任何具有主权意涵的协议。

外交部回应美大使访台：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美台官方往来

针对美国驻帕劳大使随帕劳总统访问台湾，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9日表示，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中方敦促美方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停止美台官方往来，以免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

国台办：积极推动海峡两岸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31日应询表示，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的重要讲话精神，积极推动海峡两岸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不断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

国台办：希望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日前在网上发起“火星船票”活动，其官网将“台湾”单列为“国家”，引起大陆网友抵制。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应询表示，希望NASA作为美联邦政府的机构，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尽快改正相关错误。

国台办：民进党当局谋“独”乱港必遭严惩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31日应询表示，民进党当局出于“台独”险恶用心，在涉港问题上一贯颠倒黑白，恶意抹黑，目的是攻击“一国两制”，企图谋“独”乱港。我们正告民进党当局立即停止对香港事务的政治操弄，收回黑手，谋“独”乱港必遭严惩。

国台办：福建向金门累计供水逾1219万吨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31日应询介绍，从2018年8月5日至2021年3月28日，福建向金门持续、稳定、优质供水累计达1219.12万吨。

走近新一代海上“巨无霸” 美军“福特”号航空母舰

□ 石稼

“福特”号航空母舰是美国海军新一代核动力航空母舰，为福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的首舰，也是美国海军在役的第11艘航母，是21世纪美军海上打击的中坚力量。

“福特”号航空母舰于2005年开始建造，2017年7月22日正式进入美国海军服役，舷号 CVN-78，造价约130亿美元，是美国海军有史以来最昂贵的一艘作战舰船。该舰采用了大量高新技术成果，包括新型核动力技术、电磁弹射技术、新型拦阻技术、双波段雷达技术、雷达红外隐身技术、新型高强度钢材等。“福特”级航母计划在2058年之前建造10艘，以取代目前的“尼米兹”级成为美国海军新的舰队核心，其后续的2号舰“肯尼迪”号和3号舰“企业”号已分别于2011年和2017年开工建造。



/ 美国“福特”号航空母舰。



/ 正在组装舰艏部件的“福特”号航空母舰。

一、舰船结构

(一) 整体结构设计

“福特”号航空母舰是在“尼米兹”级基础上设计的全新版本，两型航母在船体外形、

整体结构和载机数量上都相差不多。该舰舰体长332.8米，宽40.8米，标准排水量10.2万吨，满载排水量11.2万吨，全舰使用了全新开发的HSLA-115高强度

钢和HSLA-65高强度低合金钢等材料，相比“尼米兹”级的钢材更硬、更轻、更坚韧。该舰舰艏依然采用球鼻艏设计，以减少航行阻力，增加舰艏浮力，降低

纵摇幅度。舰岛在保证航行指挥和飞行控制视野、雷达通信设备安装以及减少降落区乱流的情况下，采用了更加轻量化的复合材料桅杆，进一步缩小了舰岛外形尺寸，并且布置在右舷更靠近舰艏位置，从而为舰岛前方的停机区和保障区留出了更大的作业空间。“福特”号航空母舰采用隐身化设计理念，舰船整体线条更加简洁平整，各部位均敷设了雷达吸波材料和隔热材料，排气管顶部装有红外抑制设备，通过降低全舰的电磁波反射和红外辐射特征，进一步凸显电子对抗设备和各型诱饵弹的使用效果，从而有效降低本舰被敌方各类反舰导弹末制导头锁定的概率。该舰采用开放式体系结构设计理念，具备强大的升级改造空间，有利于下一步安装电磁炮、高能激光、高能射线、新体制雷达等新型武器装备和先进信息系统。

（二）飞行甲板设计

“福特”号航空母舰采用了全新设计的封闭式斜角飞行甲板，长332.8米，宽78米，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大小，飞行甲板的有效使用面积比“尼米兹”级略大，舰艏和斜角飞行甲板各设有2个弹射起飞点，分别安装了2套电磁弹射器和偏流板。该舰的典型搭载方案同“尼米兹”级相同，主要包括5架 E-2D 空

中预警机，6架 MH-60R/S 多用途直升机，60架 F-18E/F 舰载战斗机和5架 EA-18G 电子战飞机等。下一步，第四代 F-35C 舰载机将替代部分 F-18E/F 舰载机。该舰在执行非战争军事行动等多样化作战任务时，还可以停靠 MV-22B“鱼鹰”倾转翼飞机等多种机型。

“福特”号飞行甲板设计的最大特点是吸取了“尼米兹”级航母甲板作业经验，在划分降落区、起飞区、停机区和保障区时，引入了“一站式”保障概念，在右舷舰岛前方区域和左舷升降机附近区域集中设置了18个保障区，每个保障区均可独立进行舰载机加油、挂弹、充电、维修和检测等工作，进一步优化了舰载机调度路线、提升了甲板作业效率、简化了舰载机保障流程，舰载机整備时间能够由“尼米兹”级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左右，从而极大提升舰载机出动率。

（三）机库区域设计

“福特”号航空母舰的机库目前尚未公布具体的尺寸，但从设计上看，整个机库共分为3个区，总面积应在6900—7000平方米左右，略大于“尼米兹”级航母或基本相当。“福特”号的舰载机升降机从“尼米兹”级的4台减为3台，左舷1台保留不变，右舷由于舰岛后移，只在

舰岛前部设置了2台。由于总结了“尼米兹”级航母的甲板调度经验，因此“福特”号的3台舰载机升降机不仅没有降低舰载机的调运速度，反而提升了油料与弹药补给的作业效率，并且扩大了飞行甲板的停机区和保障区面积。舰载机升降机平台的基本性能指标同“尼米兹”级相当，长25.9米，宽15.9米，最大载荷58.5吨，可同时运输两架舰载机。该舰装备了11台新型弹药升降机，采用全新的电磁驱动方式，设计指标为最大载重10吨，运行速度45米/分钟。

为确保安全，“福特”级与“尼米兹”级采用相同的弹药分段运输策略，仅3台弹药升降机可通向飞行甲板，其余则通往机库或其他甲板，每层甲板之间的分段运输仍需要人工进行。由于弹药升降机的位置均按照新的弹药运输动线和流程进行了设计调整，因此能够有效提升弹药运输效率，并有利于减少全舰武器保障人员的编制数量。另外，本舰还采用了人工智能、自动遥感、自动化弹药库等新兴技术，装备了无人搬运车和自动挂弹机器人等设备，进一步提升了弹药保障能力。

（四）配套区域设计

“福特”号航空母舰的舰岛由于占地面积大为减少，因此将美国航母传统的双层舰桥设



“福特”号航空母舰弹药升降机的飞行甲板出口。

设计改为了单独一层的主舰桥设计，用于本舰航海指挥和舰载机群的作战指挥，全舰的作战指挥中心（CIC）则同“尼米兹”级一样位于甲板下层。在主舰桥靠飞行甲板一侧的上下两层还各设有一个小型舰桥，用于指挥舰载机起降和飞行甲板调度管理，同时，这种紧凑的舰岛结构也更加有利于提升全舰的隐身效果。该舰由于大量采用数字化系统和自动化设备，舰员编制数量比“尼米兹”级减少了约1200人，因此生活居住环境显著改善，取消了“尼米兹”级航母可以容纳上百人的大型士兵居住舱，改为若干个40人以下的小型士兵居住舱。士官居住舱由“尼米兹”级的8人间改为6人间，并且每个士官居住舱都配有卫生间和淋浴设备。

舰上居住区与餐厅、休闲

室、储藏室以及其他配套公共设施之间的布局更加科学，体现了动静分离的设计理念。餐厅设计更加开放，有多个不同方向的出入口，餐厅内部改进设计的食品传送带和厨房升降机等自动化设备也进一步减轻了后勤人员的工作强度。舰内的其他配套公共设施主要包括商店、教堂、理发室和医院等，能够确保满足官兵的基本生活需求。

二、动力系统

“福特”号航空母舰采用了同“尼米兹”级一样的“四轴四桨两舵”方案，整个底层动力舱室的布局略向后移动，使得4根传动主轴的长度有所缩短。该舰采用了2台新型大功率一体化A1B压水式反应堆和4台新型蒸汽轮机，推进功率达到28万马力（约104兆瓦），比“尼米兹”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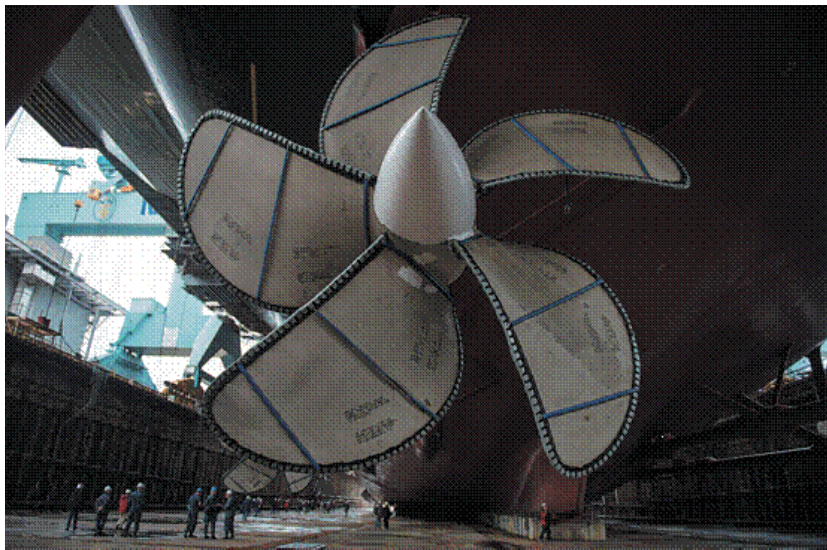
略高，与“企业”级相当，最大航速大于30节。其中，A1B压水式反应堆的功率比“尼米兹”级的A4W反应堆增加了25%，发电量则3倍于“尼米兹”级，达到了20万千瓦水平，并且在“福特”号50年的设计使用寿命内均不用更换反应堆的燃料棒，真正具备了理论上的无限续航能力。

同时，A1B压水式反应堆还具备结构更加简单、重量更轻、稳定性更好的优点。得益于A1B压水式反应堆的强大性能，“福特”号采用了先进的数字化电网系统和13800伏的“带状”配电系统，能够为全舰所有武器系统、电磁弹射器、舰载机回收系统、自动化设备、生活用电设备等提供充足的电力供应和统一的用电管理，使得该舰成为世界上第一种所有舱室都有空调系统的航母。“带状”配电系统相比“尼米兹”级的“辐射状”配电系统，能够有效减少舰内铺设电缆的总长度，更加有利于未来搭载各类新型高能武器系统所需进行的电源重新配置和设备升级改造。

三、船电装备

（一）指控系统

“福特”号航空母舰安装了先进的新一代综合作战指挥系统（IWS），并对“尼米兹”级的协



/"福特"号航空母舰的五叶螺旋桨。



/"福特"号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指挥调度中心。

同作战系统(CEC)进行了全面升级。综合作战指挥系统能够满足美国海军最新的 IT-21网络接入标准,能够将全舰所有指挥系统、管理系统、雷达系统、情报系统、通信系统、武器系统、电子战系统等相关数据进行实时融合处理,将航母战斗群内所有水面舰艇、舰载预警机、

舰载战斗机等作战平台进行动态自动组网和数据交互共享,从而形成统一的实时或低延时战场态势,有效增强对目标的跟踪精度和识别能力,实现快速高效的联合作战能力,从而极大提升航母战斗群的综合作战效能。综合作战指挥系统在高速通信链路的支撑下,使得作战指挥层

级更加扁平化,获取的情报信息更加可靠,“探测—识别—决策—交战—评估”过程更加迅速,更能够适应瞬息万变的信息化条件下体系作战需求。

除此之外,“福特”号航母的各类信息系统也采用开放式架构和模块化设计,许多软硬件设备大量采用民用商品,从而有利于航母长期服役过程中的维护保养和更新换代。

(二) 雷达系统

“福特”号航空母舰采用了美国雷声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共同开发的双波段雷达系统(DBR),该系统已在 DDG-1000“朱姆沃尔特”级隐身驱逐舰上得到了有效检验,从而一举解决了舰岛和桅杆上雷达型号繁多、硬件设备庞大、系统关联复杂、故障排查困难等问题,为舰岛占地面积缩小、人员编制缩减和全舰隐身化设计等奠定了基础。双波段雷达系统主要由 X 波段的 AN/SPY-3 多功能雷达和 S 波段的 AN/SPY-4 广域搜索雷达组成,每个波段各有 3 个采用数位波形控制的矩形有源相控阵天线,分布在舰岛的正前方、左后方和右后方等 3 个方向,两型雷达共用一套信号处理系统和显控设备。其中, AN/SPY-4 广域搜索雷达的天线阵列拥有 2688 个 T/R 模块,矩形阵面的面积较大,主要用于远程

对空预警探测和目标跟踪。AN/SPY-3多功能雷达的天线阵列由625个8通道的T/R模块组成，矩形阵面的面积较小，主要用于对中低空和海面的探测和目标跟踪，并且为本舰的防空导弹和“密集阵”防御系统提供火控目标指示。相比“尼米兹”级的传统雷达体制，双波段雷达系统的跟踪目标数量更多、灵敏度更高、反应速度更快、抗饱和和攻击能力更强，并且该雷达系统对从太空再入大气层的反舰弹道导弹也具备一定的探测效果，为航母采取有效的末端防御措施创造了基本条件。除双波段雷达系统外，舰上还装备了少量AN/SPS-73V(18)导航雷达和用于RIM-162防空导弹的Mk-95火控雷达等传统体制的雷达系统。

(三) 武器系统

“福特”号航空母舰除了可以搭载最新的第四代F-35C隐身舰载机和第一款MQ-25舰载无人加油机外，其余舰载武器系统与“尼米兹”级的“布什”号(CVN-77)基本相同，主要包括2座八联装的改进型RIM-162防空导弹发射系统，2座RIM-116防空导弹发射系统，3座MK-15型20毫米6管“密集阵”近防系统，以及若干挺12.7毫米重机枪等，分别安装于舰体两舷侧和舰艏外侧，为本舰提供全方位的近程防护。其中，



/ “福特”号航空母舰的舰岛右侧特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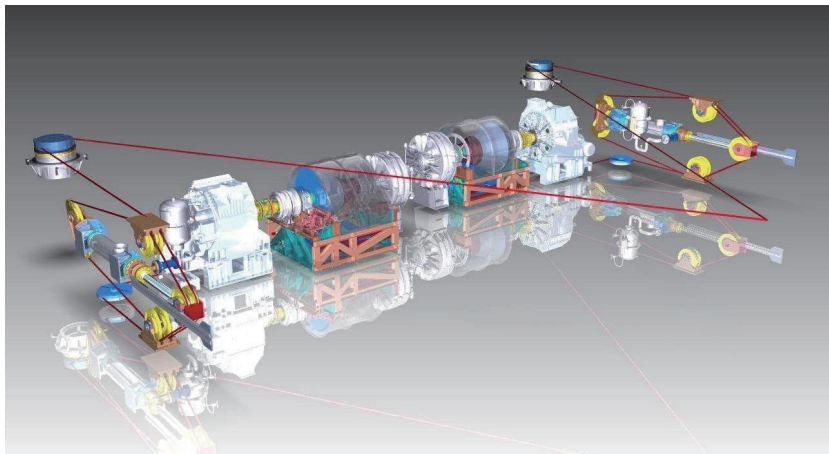
/ RIM-162 防空导弹系统。

改进型RIM-162防空导弹发射系统采用了新的数据链，自动化程度更高，反应速度更快，对抗来袭反舰导弹饱和攻击的能力得到了一定增强。另外，本舰还装有AL/SLQ-25C鱼雷反制系

统、电子对抗设备和诱饵弹发射装置等自卫装备。

(四) 配套系统

“福特”号航空母舰相比“尼米兹”级还装备了多套全新设计的系统，主要包括电磁弹射



/ 先进飞机回收系统(AARS)1根拦阻索的结构示意图。

系统(EMALS)、先进飞机回收系统(AARS)、联合精确进场降落系统、反渗透海水淡化系统和等离子体垃圾处理系统等。

其中,电磁弹射系统是最具革命性的技术成果之一,“福特”级航母拥有4部电磁弹射系统。该系统能够克服蒸汽弹射器弹射重量限制、淡水消耗限制和弹射充能限制,有效缩短弹射准备时间,提升各型舰载机和无人机出动率,减少弹射器操作人员数量,提升飞行员在弹射时的舒适性。所谓电磁弹射器,简单说就是利用电磁感应力进行弹射的装置。它分为两种:电磁线圈弹射器及电磁轨道弹射器,分别采用交流直线电机和直流直线电机。电磁弹射器包括强迫储能装置、大功率电力控制设备、中央微机工控控制及直线感应电机等。其中最核心的是强迫储能装置,可将发电机在一个周期

(约45秒)内发出的能量积蓄起来用于一次猛烈的弹射。

先进飞机回收系统同样是一款创新技术成果,该系统由3根拦阻索、数字控制设备、电磁拦阻器和各型滑轮等部件组成,能够克服传统液压缓冲设备的拦阻吨位限制,有效减少不同重量舰载机和无人机降落前的拦阻索调试准备时间,解决了舰载机降落的先后顺序问题和带弹降落问题,从而变向提升舰载机出动效率。

联合精确进场降落系统采用的舰载机GPS定位技术,相比以往的光学辅助和雷达引导降落等技术更加精确,提升了舰载机着舰安全性和落点准确性,这也是促使拦阻索数量由“尼米兹”级的4根减少为3根的原因之一。

反渗透海水淡化系统能够克服传统淡化设备需要消耗大

量蒸汽的问题,每日海水淡化能力有了数倍增长,足够保障全舰各种用水需求。等离子体垃圾处理系统能够将大量塑料和餐厨垃圾瞬间高温气化,从而节省舰上垃圾存储空间,也减少了垃圾上岸处理费用。

总体看,“福特”号航空母舰作为美国最新一代的核动力航母,集诸多先进技术成果于一身,体现了美国海军对重型航空母舰在未来海上作战行动中的定位和期望,同时也进一步拉开了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在航空母舰研发制造方面的巨大差距。“福特”级航母的问世,标志着美国全球海上霸权的延续,注定将成为未来若干年内新的“海上霸主”。

需要指出的是,“福特”号航母大量采用先进技术而导致的问题也非常突出,电磁弹射器、先进飞机回收系统、弹药升降机和雷达电子设备等均暴露出故障率高、稳定性差、关联性过高、性能指标达不到设计要求等问题。2017年,该舰成为美国史上唯一没有进行“全舰防爆冲击测试”就仓促服役的航母。2020年,该舰才勉强通过飞行甲板资质认证和空管中心资质认证,至今仍作为美国海军在东海岸唯一的训练航母使用,距离排除各类技术问题,完全形成远洋作战能力可能还需要很长时间。■

王锡爵伯伯和我的二三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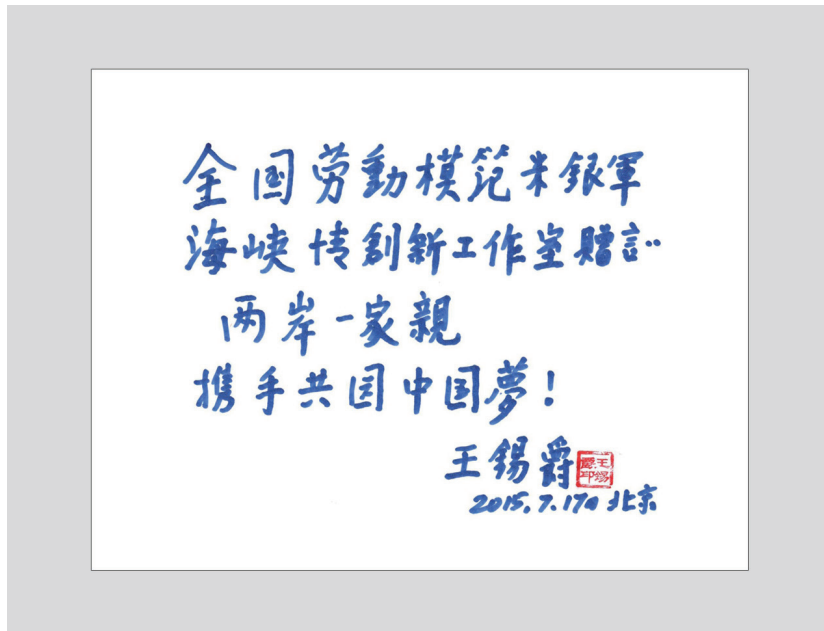
□ 米银军

“两岸一家亲，携手共圆（圆）中国梦！”从王锡爵伯伯把这幅题字送给我的那一刻起，这句话就一直刻在我的心底。伯伯说，他把“圆”字写成“园”是想提醒所有中国人：海峡两岸是一个家园。

多年来，王锡爵伯伯的这句话时时在我耳边萦绕，提醒我祖国还没有完全统一，鼓励我为促进祖国统一而奋斗。作为中国人，我是他的同胞；作为遂宁人，我是他的同乡；作为60后，我是他的晚辈；作为爱国者，我是他的队友。我时常提醒自己，传承他的爱国精神，加强和在台亲友的联络，大力宣传党的对台方针政策，作出我的点滴贡献。

王锡爵这个名字很多人并不知晓，但提起震惊世界的华航事件却很少有人没听说过。1986年5月3日，王锡爵以大智大勇尽大忠大孝，驾驶中华航空公司波音747货机降落广州，成了打破海峡两岸坚冰的第一人。

少年提剑江湖远，为国征战梦蓝天。少年时的王锡爵正赶上抗战，他满怀一腔热血，在空军学校刻苦学习，立志保卫华



/ 王锡爵给作者的题字。

夏的领空平安。由于历史原因，他在青年时代去了台湾，从此便与亲人天涯相隔。“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几十年见不到双亲的王锡爵，内心充满伤痛和愧疚，精神饱受折磨。终于，他一飞冲天，架机回到祖国大陆。团圆了自己小家的同时，也拉开了两岸人民骨肉团圆的历史大幕。

众多身在台湾的大陆籍老兵，受到王锡爵“华航事件”的影响，开始了潮水一般的抗争，终于在次年迫使台湾当局宣布开

放探亲。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面对两岸同胞的迫切要求和强大压力，台湾方面后来不得不逐步开放了两岸“三通（通邮、通商、通航）”。追根溯源，“华航事件”带动了两岸交流的连锁反应，王锡爵也成就了在促进两岸统一进程中的历史功绩，被人们称为“打破两岸坚冰第一人”。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李白的诗句，就是王锡爵心灵的写照。一个浮云般的游子思恋着家乡，有着落日一样的故土情怀。他的根在遂宁，他的心



/ 作者登门看望王锡爵(左)时合影。

记着遂宁，遂宁是他的来处，也将是他的归处。回到大陆后，王锡爵多次回到家乡遂宁市探亲。这期间，我有幸陪同这位同乡前辈，亲耳聆听他的教诲，令我受益良多。

2007年3月28日，王锡爵回乡探亲。我和爱人心怀敬意，热心接待了他和部分亲友。午饭时，王锡爵提到小时候在遂宁看川剧的感受，于是我们邀请他晚上到遂宁川剧团看剧。“还是小时候的味道！”看完川剧，王锡爵感慨万千。他表示，自己从小就爱看川剧，小时候能看一回川剧是特别奢侈的享受。离开四川后，很难再看到正宗的川剧，再看川剧成了他深藏内心的一个情结。这回终于在老家又看到川剧演出，算是解了心里几十年的“文化渴”。

他说，川剧是中华文化的一朵花，希望能发扬光大普及推广。让省外的四川人尤其是那些四川籍台胞，更多地感受四川文化的魅力、更深地增强四川文化的认同，凝聚更多四川籍台胞的力量促进祖国统一。他还建议，川剧团应该到台湾去演出，唤起四川籍台湾人的故乡情，从文化上促进两岸的联结。

“王伯伯，我来给您汇报工作了！”2015年7月18日，我因获评全国先进工作者去北京开会，挤出时间登门看望了王锡爵。我知道他很关心家乡发展和两岸关系形势，就先汇报了遂宁近几年经济社会的巨大成就和变化，以及遂宁和台湾经济文化交流的情况，他听后很欣慰。

听说我因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工作成绩突出而

被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荣誉时，他连声祝贺。我告诉他，这次进京劳模都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亲切接见，并聆听了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还受到了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张志军和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会长汪毅夫等领导的接见，感觉非常振奋。他勉励我再接再厉做好对台工作，促进两岸的统一。

我向他汇报，我想要倡议建设“两岸一家亲，共圆中国梦”海峡情全国劳模创新工作室，以搭建展示两岸劳动人民交流交往成果的平台。他表示非常赞成，还叮嘱我要利用好“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荣誉称号和“一家五黄埔”的特殊身份，做好统战工作，让更多的台湾同胞心向统一、支持统一，为祖国统一而不懈奋斗。他说，这些荣誉称号是与台湾人民交流交往的一张好名片；与一些台湾知名人士建立的人脉资源，对促进两岸人民携手努力奋斗、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积极作用。“实现祖国统一、与岛内亲友早日团聚，是我一生最大的心愿！”他动情地说。这句话，他多年来说过了多次，从这一次的语调中，我还是听得出他深厚的感情和坚定的信心。

临行，我依依不舍地拉着



/ 作者(左六)陪同王锡爵(左九)回乡祭祖时与乡亲合影。

他的手说：“王伯伯，您是咱们遂宁人的骄傲，要多回家看看啊！‘家门儿’们可都在等着您呢！”“家门儿”是一个四川话里的词，本是同姓同宗的意思，我当时用这个词是告诉他，遂宁人不管姓什么，都是和他“同姓同宗”的一家人——大家都姓中，中国的中。他懂得这个意思，高兴地说：“要得！”

2016年4月10日，在儿子王扶摇的陪同下，王锡爵再次回到了家乡遂宁。这一次，我陪着王伯伯一行祭拜了长辈、走访了亲人、查看了祖屋，走遍了他日夜思念的家乡山水。

他说，中国人讲“叶落归根”，年纪越大就越是思念故土亲人，就越是盼望一家团圆，就越是盼望国家统一。希望自己在台湾的亲友也能回到家乡来，看


看祖辈们生活过的地方，更希望他们能做些有益的工作来促进祖国统一。

“你在台湾有很好的人脉资源，希望你继续多做促进祖国统一的工作，让台湾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王锡爵对我提出了殷切的期望，这既是长者的教导，也是老师的勉励，督促我在促进祖国统一的工作中不懈努力。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王锡爵打破了隔绝两岸的坚冰，我们这一代人要努力把两岸人民融为一体。就像王锡爵所说的，两岸是一家人。一家人不能分开太久，破镜重圆既是天命所归，也是民心所在。促进祖国统一、结束台海分离，这既是王锡爵伯伯交给我们的任务，更是祖国人民交给我们的任务。



/ 作者与妻子刘枫邀请王锡爵(中)观看川剧后合影。

祖国尚未统一，我辈仍需努力。我的伯父和舅舅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我的父亲曾是新中国一名海军战士，为守卫祖国海疆奉献了自己的青春，我的同乡王锡爵伯伯从台湾驾机起义，他们用不同的方式保家卫国。我在精忠报国的家风中成长，在忠孝两全的乡风里熏陶，在忠孝仁义的国风中奋斗，我会忠诚地履行使命，不忘初心为人民、砥砺奋进促统一！

巍巍黄埔 郁郁葱葱

□ 钟武宏(台湾)

怀理想 展抱负

1967年8月28日早上6点，一列烧着煤炭的火车由台北沿途各站，载着140多位我这样的青少年，驶往高雄左营，当晚7时许列队踏入海军官校预备班，那年我刚满16岁。

其实，对我来说，海军是个模糊的概念，空军才是我的念想。电影《笕桥英烈传》中直上云霄、万里长空任遨游的生活令我满怀憧憬。而父亲却极力诱导我去海军，说海军是科学的兵种，要专业的学识、流利的外语能力，还有亮眼的军服，你考得上吗？我不服气，就进了海校。

预备班前几期是招考普通高中三年级学生，培训一年后直接升入官校正期班，我们这一班是完整3年培训的第三届，正式冠名海军官校六十三年班。基本上，海官预备班的课程和高中没有差别，只是多了军事管理，由正科四年级的实习干部磨了我们这群毛孩子整整一年，俨然觉得自己接受革命的洗礼，穿起军服像那么回事。

1970年9月2日，我们这一班加上联招进来的新生合计200员，在凤山陆军官校大门口踏着整齐有力的步伐，唱着海军军歌，迈

进校园，接受12周的入伍训练，那一刻起，我正式成为黄埔的一员。一同入伍的还有陆官、空官、政战学校等三军四校1500余名学生，统称黄埔43期。

进黄埔 效先贤

踏进校门，马上感受到一股庄严、肃穆、威武、神圣的气氛，笔直的马路，苍劲的老榕，一整排棋格式的安澜楼、灵甫楼、志贤楼……英灵的庇佑，映照出忠烈的节义，走着走着，心中蹦出一句话：黄埔，我来了！

我出生于缅甸，父亲为我取名为缅先，有两重意义：一是莫忘颠沛流离、艰苦患难；一是缅怀先烈、复我中华。刚性的名字使然，我从小就不服输，好打抱不平，对玩具枪、飞机爱不释手。父亲常说：“他天生是当兵的料。”

黄埔军校3个月的入伍训练对我们来说，除了体能的考验，更有意志的磨练和精神的洗礼。从学生部队指挥官到教育班长的身上，我都能嗅到雄壮、刚毅、沉稳、坚强的气味。清晨的黄埔军歌，就寝前的黄埔校歌，行进的唱歌答数，深植脑海。时隔50年仍然会在梦中高唱，把自己唱醒。

入伍后期的一个夜晚，学指部集合15个连的入伍生到大礼堂，播放抗日战争纪录片，看着日寇一步步从华北跨黄河，越长江，蹂躏我锦绣河山，我将士前仆后继奋勇抗敌。待播到南京沦陷，百年金陵古城惨遭屠城，30余万无助百姓被日寇屠戮——刀尖上的婴儿，开膛破肚的孕妇，锋利的匕首活生生地割下头颅。看到这些我心都碎了，身子颤抖，心中嘶吼。那些惊悚的画面，一辈子烙印在心田，随时如走马灯画片般在眼睑上方映过，令我永难忘怀。是可忍孰不可忍？这笔血债终将血还。

民族魂 强武功

70年代初期，台湾社会仍以农业改良发展为主，一般家庭收入有限，多以家庭代工来贴补家用，生活但求温饱。1969年，当局为转型农业，培植轻工业，鼓励华侨投资，选定高雄成立加工出口特区，用代工加工再出口方式增加外汇收入及就业机会，连带推动周边商业活动。出口区就在官校附近，可以很明显感受到小区的活络发展。

海校四年，吸收大量理工科

学，海军基本术科教育课程，是心智和人格的养成定型阶段。生活上每个月从一年级的200元台币到四年级的400元，也就够买些日用品，周日放假外出看场电影、吃个小馆，生活条件不高，心里却甘之如饴。

上一代的大动荡时局，对中国来说是个悲剧，国共的意识形态斗争，我们没有亲身经历，当年“仇匪恨匪，敌我不两立”的教育，在黄埔团结、牺牲、负责的精神和忠诚、领袖、荣誉灌输要求下，坚信不疑，当然这也是黄埔子弟的信条和风范。时至今日，事过境迁，平心而论，骨肉相残，何至于此，枪口根本就应该一致向外。

1974年毕业，以中尉军官授阶，正式开始军旅生涯。从舰艇初级军官，中级部门主管，到岸职的参谋作业计划，踏实稳健地迈出每一步。所有美式装备的操作、教令，让我感觉学而不足，对强国海军有着一份向往和仰慕。因此争取各种机会到美军各基地、院校受训、学习、工作、接舰。归根究底就是想为海军做些事，这身军服穿出去不要被人看轻，我们中国人绝不比任何人差。然而，时间越长，越让我体认到美国官僚系统的现实和自私，他喊的国家利益，仅只关心他自己的利益，他的示好只是想要你看到他的强大，而听从他的摆布。前后留美9年的

感受是反感、是厌恶。

慰忠灵 启中兴

孙中山先生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擅扬的时代。这个预言今天应验了。

2000年9月，我结束了26年的海军生涯，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得以旁观者的立场亲身见证到此消彼长的转变。台湾在经国先生于1974年提出十大建设方案，任用一批吃苦耐劳，廉洁专业的骨干工程师，衔辔奋励，马力加足，全力以赴，朝着正确方向发展，短短10年，创造了台湾奇迹，人均年收从2300美元遽升至7600美元，百业荣景，领袖亚洲四小龙。

可惜好景不常，1988年1月13日，经国先生辞世，政局动摇，所用非人，李登辉施政偏离正轨，黑金政治当道，尤可恨的是，认贼作父的逆子心态明朗化，以省籍情结从根制造对立，瓦解国民党基本盘，公然抛出“两国论”，制造台海危机。12年的执政加上扶持民进党陈水扁上位8年，这20年，台湾跌进黑暗的深渊。


再看看大陆爆炸性的发展，令人目不暇接，经济体量跻身世界第二，在短短4年内让一亿两千万人民脱贫建成小康社会，以“不忘初心”号召全国各级政府、全体百姓团结精进，共同努力。城市建设的成就更是令人不敢相信，宏观规划，高速建设，希望愿景，一目了然。

然。网上支付率先使用，把各国都远抛在后。人民富裕了，国家有钱了，可以做更多的大事。“一带一路”的全球战略，显示中国人的胸襟、能力，堪慰先烈们英灵啊！

拥有坚实的航母战斗群，威力强大的海航部队，配上水下吓阻攻击潜艇，是我魂牵梦萦、朝思暮想的海军梦，如今，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做到了。我虽然没有参与，但是深深地感觉与有荣焉。中华民族引领世界风骚的伟大历史时刻到来了！

回眸望 释我肩

从少不更事到随心所欲的洒脱，仿佛是转瞬之间就过去了。一杯清茶，一缕清香，案前清坐，心中并不平静。浮云不遮望眼，正道总是沧桑。我辈已尽力过，感觉失落的是身为黄埔人，在台湾却被当做多余的啃米虫，本身的价值、尊严荡然无存。撕裂族群的用心原来就是想割断那条脐带，但是割得断吗？反倒是海峡的彼岸，挚切地再找回黄埔人、重温黄埔情、重振黄埔精神，大力宣扬国民革命军在上海保卫战死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实实在在还原历史的真相和公正，这是一份器量，一种情操，振奋人心。

“明月依旧在，何日彩云归。”现在我唯一的心愿是在有生之年，两岸能实现真正的统一。

热血染红五星红旗 (上)

——记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东北抗联创始人杨林、李秋岳夫妇

□ 崔光桦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灿烂的五星红旗上，染有朝鲜革命烈士的鲜血。”在中国艰苦卓绝的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许多流亡中国的朝鲜人民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杨林（原名金勋）、李秋岳（原名金锦珠）夫妇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杨林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曾经担任过叶挺独立团3营营长，还担任过红23军军长、红1军团参谋长（时任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等，是深受毛泽东、周恩来器重的优秀军事干部。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他作为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积极主动协助省委书记罗登贤创建抗日游击队，共同创建了党在东北的抗日武装东北抗日联军，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重大贡献。李秋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朝鲜族女共产党员，是与东北抗日战场上家喻户晓的赵一曼齐名的抗日英雄！

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杨林和妻子李秋岳献身朝鲜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感人故事惊天地、泣鬼神！他们的英雄壮举和光辉形象将永远活在中、朝两国人民的心中！

投身朝鲜独立运动 击毙日军加纳联队长

杨林，原名金勋，曾用名杨州平、杨宁，化名毕士悌等。1898年，出生于朝鲜平安北道的一个爱国人士家庭。1910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朝鲜后的反动统治，在年幼的杨林心里播下了民族仇恨的火种。他考入平壤崇实中学后，学习成绩优异，接



/ 杨林。

受进步思想，积极参加各种反日爱国活动并表现突出，逐步成长为有影响力的学生领袖。在崇实中学还有一名优秀的女学生金锦珠（后来在中国东北化名李秋岳），活泼开朗，擅长写诗，经常用自己的午饭钱给

同学们买学习用品，深得同学们的喜爱。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志趣使杨林和李秋岳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后来结成了革命伴侣。

1919年3月1日，朝鲜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三一独立运动，杨林随父亲参与其中。杨林作为学生领袖动员和组织学生参加在平壤和汉城（今首尔）塔洞公园举行的民众示威游行。不幸的是，他父亲在游行中被捕惨遭杀害。家仇国恨更坚定了杨林继承父志、参加抗日斗争的决心！然而，杨林很快发现自己的反日爱国活动被敌人盯上了，自己成为日本军警的搜捕对象。同年秋天，杨林不得不离开结婚不到一年的妻子，秘密渡过鸭绿江，投奔设在中国东北通化县哈尼河的新兴武官学校。临行前，他对妻子李秋岳说：“假如你站不住脚，就去找我。不过，但能坚持就要尽量坚持下去，一切听从于革命组织，万不可为了私人情感的留恋而放松解放祖

国的责任，祖国多么需要我们啊！”

学生领袖出身的杨林由于起点高，在将校班学习6个月后就担任了教官。1920年2月，北路军政署汪清县西大坡十里坪练兵场和练成所急需军事教官。北路军政署总司令金佐镇将军向西路军政署金东三参谋长请求支援一批军事人才。其中指名道姓要李范奭，推选的还有杨林和成骏用。3月，杨林来到汪清县西大坡北路军政署（亦称独立军北路军），担任第2学徒队第1区队长。

三一运动的爆发推动了中朝边境独立军运动的蓬勃发展。这一时期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的朝鲜独立武装有“韩国独立军”“北路军政署”“光复团”等10多支部队。日本帝国主义对此非常头疼，为此，1920年10月，阴谋策划了“琿春事件”，以数万兵力入侵延边进行庚申讨伐。日本当局先是给奉天张作霖施加压力，要求张作霖与日军共同围剿，力图阻止“韩国独立军”的发展与壮大。迫于无奈，张作霖命奉军孟富德部前往汪清、琿春地区讨伐韩国北路军政署独立军。为了避免与北路军政署的正面作战，孟富德向金佐镇将军透露这一情报，要求韩国独立军主动离开吉林省管辖区域，以避免武装冲突。

无奈，北路军政署只好答应在1个月内撤离汪清西大坡，计划先到长白山，然后寻找机会向朝鲜国内移动。10月5日，北路军政署来到了和龙县青山里，即三道沟。这时，孟富德又提供了重要情报：日军在苏联西伯利亚的两个师团正往南移动，在中国南满的大部分兵力往北移动，暂时集中在长白山中部，准备往南北方向合围。还有南满铁道守备队一个联队的兵力和日本警察联合部队数千人。这些兵力以三道沟为核心，形成包围网。由于事先得到情报有所准备，北路军政署部队先后取得了白云坪战斗和泉水坪战斗的胜利。

泉水坪战斗结束后，杨林的中队在打扫战场时发现重要情报，得知日军14师团的司令部就驻扎



/ 吉林和龙市的青山里战斗纪念碑。



/ 青山里战斗中惨败的日军。

在离泉水坪不到5公里的渔郎村。为争取战机，杨林率领的一个中队埋伏在敌人必经之地南鸡沟北山，北路军政署部队立即往北撤离，攀登了鸭鸡沟内的874高地。不久，日军加纳骑兵联队纠集兵力，动用野炮、骑兵疯狂向874高地扑来。杨林带领的中队向来犯敌人猛烈射击，击毙加纳联队长，士气大振！在阻击敌人成功后，他们向鸭鸡沟撤退。日军多次发起猛攻，但都未能取得成功。12点30分，洪范图部队赶来支援北路军政署部队。战斗持续到下午7点，北路军政署和洪范图联合部队利用夜幕降临之机，迅速整顿队伍，分路撤出战斗，敌

人也只好暂时收兵。874高地战斗（又称渔郎村战斗）是青山里战役中规模最大的战斗。

1920年10月末，独立军各部向北转移之际，杨林和尹琦燮受北路军政署的派遣，秘密前往上海向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报告青山里战役情况。

1921年上半年，杨林在上海与朝鲜早期共产主义者、军事家、教育家李东辉交往过程中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

献身中国革命事业 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1年6月，杨林告别独立运动的大本营，离开上海，经广州、香港、越南来到了昆明，考入云南讲武学校第16期炮兵科，被编入第6队第1区队。讲武学校因有日本教官，校方不准杨林暴露他是朝鲜人的身份。他化名杨州平，并以“华侨”身份学习。

虽然杨林入学前就已经是具有实战经验的军事教官，但是进入讲武堂后，他仍然严格要求自己，废寝忘食地学习军事课程，苦练杀敌本领。据1932年接替杨林担任满洲省委军委书记的周保中（云南讲武堂第17期毕业生）回忆：“云南军校教务长经常背着日本教官举杨林的例子，说高丽学生杨州平每天早晨背十块砖头跑十多里路。他是有志的青年，大家应该学习他的精神。”由于杨林刻苦努力，无论在学科和术科上，成绩都是全校第一名。一天，一个日本教官给学员上刺杀课。讲完课后，他十分傲慢地拍着自己的胸脯对学员们说：“你们当中，有谁敢出来跟我拼一下？”全场一时沉寂。那个日本教官又说：“5分钟也可以。”杨林随即走出队列，和日本教官刺杀起来。十多分钟过后，那个日本教官招架不住了，只好低着头，伸出右手大拇指，连声说：“好，好，好样的！”在场的教职员和学员们均报以热烈的掌声。

杨林在云南讲武学校学习期间非常关心政治，关心中国革命的前途。他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

必须与中国人民共同抗日，才能最终获得本民族解放与独立。因为韩国独立运动的力量弱小，只有借助中国革命的洪流，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当时云南讲武学校规定，军人不许过问政治，更不许谈论国家大事，杨林不顾军纪校规，在背地里经常给要好的学友讲述革命道理。针对当时有学生“上军校为的是讨碗饭吃”的思想，他对大家说：“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现在却受日本、英国、法国等帝国主义的欺负，我们要立志把他们赶出去！”他还对那些讲究吃喝玩乐的学友说：“我们要多想国家大事，要多想革命。”当学友们问他什么叫革命、怎么才算革命时，他回答说：“孙中山先生做的事业就是革命事业，走孙中山先生的路就是干革命。”杨林的这些话使同学们深受启发。

1924年初，杨林以全校第一的优异成绩获得毕业证书。校方舍不得放走这个优秀人才，准备要他留校任教。他婉言谢绝，毅然前往当时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广州。杨林报考了黄埔军校的军官招员考试，并把名字改成了“杨宁”。由于杨林具有较高的文化功底，而且先后3次进军校学习，具有过硬的军事素质，所以他顺利通过严格的考试，并被分配到教练部学生总队工作。不久，被任命为学员队第4队上尉队长。

1925年2月2日，杨林带学生军一个连参加了以黄埔军校学生军为主力的第一次东征。作战中，杨林机动灵活、指挥有方、身先士卒的表现给教官和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6月，他参加了平定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叛乱的战斗。

在黄埔军校，杨林经常聆听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和恽代英、肖楚女等共产党人的演讲报告。特别是在周恩来的影响下，他的思想觉悟有了较大的提高，加入了以共产党人为核心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是年夏天，杨林在黄埔军校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1月，从黄埔军校抽调一部分人员作为骨干，

另招募广东、广西、湖南籍士兵，组建了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独立团（即叶挺独立团）。由于在黄埔军校期间所表现出来的优秀军事素质、文化修养和政治理论水平，杨林被调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独立团第3营营长，成为叶挺独立团主要创建者之一。

1926年4月“中山舰事件”之后，周恩来将杨林从叶挺独立团调回黄埔军校，以加强中共与国民党右派斗争的力量。当时杨林的职务是中校技术主任兼教官。杨林巧妙地支持左派学生，争取朝鲜青年，防止倒向国民党右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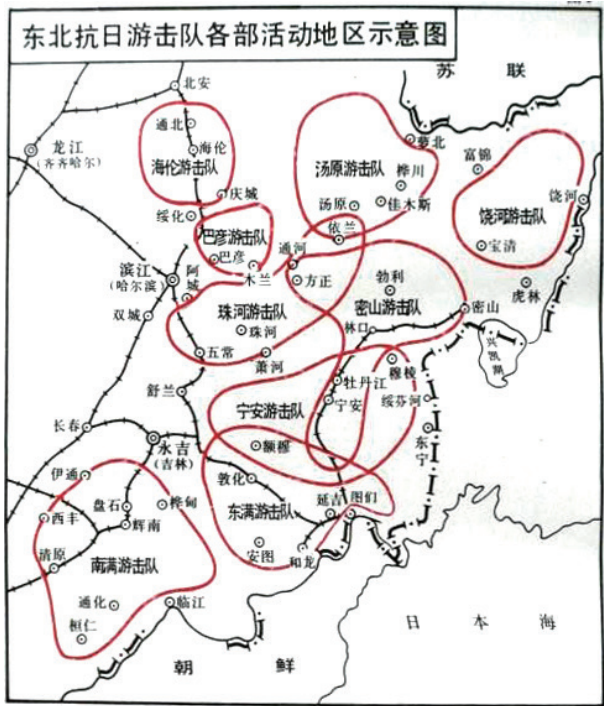
1927年8月，杨林夫妇受中共党组织委派前往苏联学习。来到莫斯科后，杨林进入中山大学学习，改名叫毕士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杨林用一年时间把两年的政治理论课程全部学完，然后转入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

出任满洲省委军委书记 创建党在东北的抗日武装

1930年春，因当时中共满洲省委请求中央派得力的朝鲜族干部来满洲工作，杨林学习结束，携夫人李秋岳一起离开苏联，到东北担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

10月，杨林夫妇与新任东满特委书记廖如愿来到自己10年前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延边。到了延边，第一项工作就是成立中共东满特委，杨林担任东满特委军委书记，将中共延和中心县委改为延和县委，同时决定新建中共汪清县委和中共珲春县委，均归东满特委领导管辖。

杨林很快就找到申春、崔相东、方相范、金铁山、张子宽和曾在苏联学习过军事的朴允瑞、刘志远、金明均等朝鲜族黄埔校友。他们都是当年在黄埔军校志同道合，亲密无间的战友和学生，是参加了广州起义之后幸存下来的革命火种。杨林以他们为骨干组建了东满特委军事委员会，并把他们派到各县担任军事部长。为了更好地指导和推动游



/ 东北抗联各军初创时期游击队活动区域图。

击队的建设工作，杨林结合实践撰写了《东满游击队工作大纲》，指出游击队的任务和意义在于“发动广大群众，扩大政治影响，夺取武器，推倒敌人的统治或歼灭其势力，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在不断的斗争中使红军成长发展”。还详细地阐述了游击队应怎样发动群众、党对游击队的领导、游击队的组织及战略战术、游击队应如何发展等问题。工作中，杨林把游击队建设同土地革命紧密结合起来。1930年12月，杨林在延边地区组织发动了1.5万余群众参加的反日大会和游行示威，镇压了30多名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此后，杨林又指挥东满地区赤卫队和革命群众，在珲春以北地区攻打了一家反动地主，缴获了大批武器，武装了游击队。同时没收了大量财产，烧毁了地契，把粮食和一些财产分给了贫苦的农民。

在此期间，中央军委曾经要求满洲省委将杨林调回中央军委工作。满洲省委因工作迫切需要，请求中央免调。

1931年2月15日，东满特委以军事文件的形式将《东满游击队工作大纲》下发各县，为各地游击队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5月，延和县委重新划分为和龙县委和延吉县委，杨林与延和县委书记金铁山研究决定调中共依兰区委军事部长方相范担任和龙县委首任军事部长。方相范来到和龙县渔浪村平岗区游击队，传达《东满游击队工作大纲》。队长金世深受鼓舞，克服挫折，带领游击队开展夺枪和清算走狗的斗争，队伍迅速发展成30多人。方相范又先后前往开山屯和大砬子、三道沟传达贯彻《东满游击队工作大纲》，并于1931年夏天帮助成立了以高太平为队长的三道沟游击队。在杨林和方相范的直接指导下，和龙县4个区的游击队初具规模，为组建县游击队打下坚实的基础。

杨林在东满工作1年多时间里，东满各县游击队建设迅速发展。据中共满洲省委军委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称：“东满游击队有100多名，枪有80多支。”

正是这个时期杨林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使东满各县全都建立起武装游击队，这些游击队就是日后成立的东北抗日联军第2军的前身。

1931年，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不久，中共满洲省委遭到重大破坏，陷入瘫痪。11月，杨林紧急调回省委，重新担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在处境十分艰险的情况下，协助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开展了抗日工作。其中最为突出的功绩就是帮助罗登贤全面了解东北党组织基本情况，并根据东北发生的巨大形势变化，冲破“左”倾路线的干扰，及时调整了省委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建立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根据地，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抗日，从而为东北抗日联军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1932年1月，杨林同罗登贤等共同起草了文件《抗日救国武装人民群众进行游击战争》。由于此前

他在东满地区开展了一年多创建游击队和建设游击队的工作，深入了解党在农村的基本情况，因此他参与起草的文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指导性和实用性。这个文件在省委会议上通过后下发各地，对于各地抗日游击队的建设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2月，中共安图区委在小沙河成立，归和龙县委领导。杨林的交通员金玉珠被派去协助区委书记安正龙做建党建军工作，不久建立了安图游击队。此外，杨林还组建了50多人的中共东满特委军委直属游击队，以保护特委、军委机关和干部群众的安全。

4月，杨林前往南满的中心磐石地区巡视，传达省委关于武装抗日的指示，协助磐石县委建立抗日游击队。

位于吉林省中南部的磐石县是东北的一个革命老区。1927年，共产主义者就开始在这里传播马列主义。1930年6月就成立了中共磐石临时县委。同年8月，召开了中共磐石第一次代表大会并选举产生了中共磐石县执行委员会（简称县委），组建了两个武装组织：一个是在伊通流沙咀子和磐石西玻璃河套成立的以朝鲜族青年农民为主体的磐石劳动农民赤卫队（简称磐石劳农赤卫队），20多人，队长李红光；一个是为了保卫县委机关安全成立的特务队（群众称打狗队），先期4人，后期7人，队长陈玉振、李松波，副队长朴翰宗。这两个党领导的武装组织是后来创建磐石抗日游击队的基础。1931年8月，组建了中共磐石中心县委。12月，中共磐石中心县委把李红光的劳农赤卫队和县委机关的特务队合并，创建了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磐石赤色游击队。

杨林深入到磐石地区，协助中心县委为游击队的建设发展做了大量工作。首先，通过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反日斗争，为创建反日武装打下深厚的群众基础。他与李红光、李东光等一起组织和领导了磐石地区各族人民的抗日斗争。1932年4月3日，

发动了蛤蟆河子农民反日大暴动，接着又举行了五一、五七等反日示威。其中，声势最大的是五七反日示威游行。5月7日，有4000多名朝鲜族、汉族农民参加了反日示威游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清除汉奸走狗”等口号，当场处决了50多名罪大恶极的日本走狗，并把吉海铁路老岭段的铁轨拆毁达数里之长，迫使敌人十几天不能通车。先后几次大规模反日斗争，不仅发动了群众，同时也锻炼了群众，发现和培养了群众斗争骨干。

其次，举办军事干部培训班，培养大批军事人才，是杨林此行的最大成果。他亲自讲授政治理论和军事知识，培养游击队骨干。受培训的大部分学员后来都成为游击队主要领导和东北抗联第1军的军、师、团级指挥员。此外，他还在党、团员，农民协会，青年协会，工人工会中动员青年人参加游击队，扩大抗日武装队伍，还通过指导袭击汉奸地主武装，发动伪军哗变，打击敌人，获取武器弹药，武装游击队。

6月4日，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在杨林的协助和指导下，在磐东区正式成立了满洲工农反日义勇军第1军第4纵队（亦称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中心县委组织部长张振国担任纵队长，中心县委委员杨君武任政治委员。纵队下设3个分队，第1分队队长杨君武（兼）；第2分队队长孟洁民，政治委员李红光；第3分队队长常凤春，政治委员朴亨燮。这支队伍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领导的第一支抗日武装，也就是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的前身。杨林是这支武装队伍的重要创始人之一。这支队伍成立后，屡战屡捷，士气大振，群众也受到了极大鼓舞，纷纷要求加入队伍。不到两个月队伍就扩大到120人。

杨林在狠抓南满抗日游击队创建、发展壮大的同时，也一直关注和指导东满各县游击队的建设。他通过东满特委和各县军事部长直接或间接指导各县分散的游击队形成合力，组建各县统一的游击队，壮大游击队力量。1932年初，汪清县抗日游



/ 东北抗联密营遗址。



/ 东北抗联第2军第3师指战员合影。

击队率先宣告成立，金哲任队长，金明均兼政委。4月，金日成带领其在安图县小沙河土器店创建的反日游击队转战南满后来东满，同汪清游击队合并，到年底队伍发展到100多人，并创建了小汪清根据地。1932年夏，延吉抗日游击队正式组建，朴吉任队长，开辟了依兰区、瓮区根据地。和龙县的4个游击队也从1932年2月正式改编为和龙县游击队，并创建了渔浪村抗日根据地。珲春县在1932年6月相继成立了岭南、岭北两支游击队，到1933年1月正式合并为珲春县游击总队，队员达180多人。

1933年初，东满各县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东满游击队；1934年3月四县游击队合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军独立师，共900余人；1936年3月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2军，军长王德泰，政委魏拯民。

萍水相逢结良缘 相濡以沫伴一生

——江苏黄埔老兵朱学明的爱情故事

□ 徐跃

朱学明，1923年9月出生，江苏盐城人，黄埔军校第18期生，江苏省黄埔军校同学会会员。徐兰，朱学明夫人，1927年3月出生，江苏常州人。

初识朱学明夫妇是2019年，我和同事赴常州走访慰问朱学明。在其家中，我们围坐桌旁聊天。徐兰阿姨坐在丈夫身旁，静静地听着老伴说话，看着他微笑。虽然都已过鲐背之年，但丝毫掩盖不住他们彼此的恩爱。今年，我们再赴朱老家中看望，得知徐兰阿姨刚去世不久。从他们的女儿朱虹那里，笔者了解到朱学明夫妇相识相知、不离不弃的爱情故事，催人泪下。

萍水相逢

青年时期的朱学明，也曾憧憬爱情，择偶标准是模样顺眼、情投意合和知书达理。然而，生逢乱世，战火纷飞。他随着部队走南闯北，功不成、名不就，哪敢奢望什么爱情，以致婚姻无缘，难成眷属。然而，自古姻缘天定，兵荒马乱之际，朱学明跟随部队驻扎常州城，与当地姑娘徐兰千里来相会。

1949年春节，国民党淮阴团管区司令部撤退到江苏常州，分驻于青果巷、荆溪村和南直街一带。朱学明时任参谋处参谋，上司樊国勋安排他到常州市青果巷的东巷口凌寅女士家里住宿，地址是三近里5号。

这户人家男主人徐奕中在外地谋生，女主人凌寅40多岁，温文尔雅。家中6个儿女，大女儿徐兰当时23岁，见到朱学明总是羞涩地低着头。当时，凌寅家住房并不宽敞，但是她深明大义，为了让朱学明休息好，主动腾出原来徐兰住宿的半间房，而她们母女则挤到一起。凌寅的热情，让漂泊异乡的朱学明感到无比温暖。

刚开始，凌寅对这位国民党军队的下级军官心存戒备。接触一段时间后，凌寅发现朱学明喜欢读书，待人礼貌谦和，出门前和外出归来都会主动与她打招呼。同时，朱学明也逐步了解到，凌寅出身大家闺秀，德才兼备，是位“女中精英”。她早年毕业于女子师范学校，做过老师、女保长、妇女代表和居委会主任，乐于扶危救困，思想进

步，胸怀宽广。

朱学明到青果巷一带踏访古迹时，觉得这一带的古宅民居很有意思，回家便向凌寅询问青果巷的历史文化典故、名人轶事等。经过几次交谈，凌寅得知，万恶的日本鬼子曾一把大火把朱学明家乡盐城整个城区烧得精光；为了抗日，朱学明17岁就报考了黄埔军校；1943年元旦，日本鬼子扫荡苏中时，他英勇杀敌掩护部队突围，身负重伤后，被日本鬼子用铅丝捆绑起来，押到东台监狱关了一个多月，后来，在被伪军押解的路上才得以虎口逃生；他所在的部队一直与陈毅、粟裕领导的新四军，与黄逸峰领导的“联抗”友好相处，共同抗日，从来没有发生“摩擦”。慢慢地，凌寅对这位彬彬有礼的小伙子逐步有了好感。

此后，他们谈话时，常共同流露出对当时黑暗现实的不满。朱学明气愤地告诉凌寅母女：1946年7月，他已经被作为“优秀军官”选调往号称“荣誉2师”的“中国派日占领军”67师，准备去占领日本，但是因为国民党忙于挑起内战，他突然接到命令

又不去日本了。他坚决反对内战！他担任了国民党部队爱国官兵组织的进步团体“群学社”的名誉社长，发出的口号是：“此路不通，就去找毛泽东！”凌寅也向他流露出对“国统区”政治腐败、物价飞涨的不满，还把自己的弟弟、妹妹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弟弟已经在“皖南事变”中英勇牺牲的情况毫无保留地告诉了朱学明。

情定终生

时间长了，朱学明注意到，凌寅与他交谈时，徐兰总是静静地坐在一旁，从不插话。虽然他们从来没有对视过，但是，他感觉到徐兰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总是含情脉脉。

1949年3月的一个夜晚，凌寅得知朱学明准备离开常州，要和军校同学华杰、周文忠前往上海的253师，便跟他作了一席深谈，委婉地表达了她的心意：“你我虽属萍水相逢，但一见如故，这是注定的缘分。我们接触一段时间以来，我看重你作风正派，便想到我家大女儿徐兰性情朴实，你们双方在性格、年龄和文化程度等方面都相当般配，我真心希望你能成为我家的乘龙快婿。”

凌寅不知道的是，朱学明从刚开始接触这个家庭，便产生了羡慕之情。面对徐兰的朴实



/ 朱学明、徐兰结婚照。

端庄，他也早已心生好感。如今，双方缔结姻缘的好事，竟由慈祥开明的徐伯母主动促成，实在令人感动。朱学明17岁就离开家乡参加抗日，父母去世，他都没能回盐城老家见上最后一面，他时刻怀念自己的父母。此时，在异乡常州，他深深地感受到了母爱，眼眶一热，忍不住激动地大叫凌寅一声：“妈妈，我愿意！”从此，他顺理成章称呼凌寅为“妈妈”。徐妈妈也不再称他为“朱先生”，而直呼“学明”。

彼时，国民党丧失民心，朱学明想尽快脱离国民党部队，特别是得知弟弟朱学俊已经参加了“重庆号”军舰起义之后。他主动找到徐妈妈商量前途。他们商定了“进”与“退”两种方案：一是带兵起义为上策。朱

学明先随部队赴闽南，伺机带兵起义，学习弟弟学俊为人民立功。二是如果起义不成，则回到常州另谋出路。为准备后路，徐妈妈让他用“朱敬白”的名字与他们家的亲属关系，在常州当地报户口领取身份证。她还为朱学明量体裁衣，做了身便衣让他随身携带，并约定了双方可靠的通讯地址。准备工作就绪的那天晚上，凌寅母女一起为他送行。临别时，徐妈妈谆谆叮嘱：“谨言慎行，但愿你走上学俊起义之路，顺利归来！”朱学明说：“妈妈，您放心，请日月作证，我会一辈子对徐兰好的。”皎洁的月光下，他身旁的徐兰是那样的美丽、清纯、端庄。

重返常州

1949年4月，朱学明经同学



/ 朱学明夫妇。

华杰介绍，到253师任师部少校参谋。不久，部队由上海开赴福建补充新兵。行军途中，部队临时成立军容风纪纠察队，朱学明任队长，周文忠任副队长。他们随军乘登陆艇从海上航行至厦门港登陆，再徒步行军至闽西龙岩。当时，解放军尚未渡过长江，国军钱塘江防线上驻扎着白崇禧统率的30万兵力。双方进入相持阶段，朱学明在军中服从命令，静观其变。行军沿途，不管是经过城镇的商贸集市，还是农村的瓜田果园，他都带着纠察队对部队官兵的军容风纪进行纠察，基本做到秋毫无犯。

253师驻扎在龙岩的一个多月，并未接到新兵。朱学明却因染上山间瘴气，生了一场恶疾，高烧不退，头痛不堪，吐泻不

止。幸亏得到战友顾克传的照顾，顾克传将他背在身上熬过数个日夜。不久，前方传来消息，解放军成功渡过长江逼近福州，白崇禧的部队退逃到广西。253师从龙岩回调南靖，改编为“国防部第5突击总队”，再开往厦门集结，朱学明调入第9军军官队任区队长。

10月17日凌晨，解放军攻进厦门市。守城的国军首脑机关及其主力部队，大部分早已撤退，一部分留守部队和后勤人员除极少数逃亡金门外，其余都甘为解放军的俘虏。朱学明的军官队并无战斗任务，上级指挥机构撤退时也无暇顾及，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便自行解散。

1949年底，朱学明拒绝跟随国民党去台湾，换上便服，揣

着常州居民证，自行返回常州。他归心似箭，想立即回到岳母家中，回到至爱徐兰身边。途中路过上海，因身无分文，他在上海叔祖朱厚福家中逗留了几天，得知弟弟学俊起义后在安东海校。朱学明在上海找到了同学曾瑞林，他正和母亲、姐姐一起，暂以贩卖蔬菜为生。承蒙他们的帮助，朱学明稍事休整，整理好行装，马不停蹄地返回常州。

朱学明辗转多地，最终顺利到达常州。虽经风云剧变，所幸岳母全家老小平安健康，令他十分欣慰。见面时，他们亲切依旧。这时候的朱学明心情烦躁，徐兰每晚都要约他到青果巷散步，鼓励他追求新生活。长长的青果巷里，留下了他们一串串脚印。在徐兰的精心照料下，他积劳成疾的身心得以迅速恢复。

这段时间，他如饥似渴地读了《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等理论著作，思想认识得到了升华。

喜结连理

1950年初，上海朱厚福叔祖特来常州探望。在岳母和叔祖的主导下，朱学明同徐兰当年4月去了上海，在同学曾瑞林的陪伴下参加了“大上海的集团结婚”仪式，喜结连理。

同年10月，常州工人教师学习班招生，虽只录取13人，却有200多人报名竞争。朱学明担心考不上，徐兰不断地鼓励他，给了他大胆走进考场的勇气。最终，《常州日报》放榜录取名单，朱学明榜上有名。徐兰高兴地举起报纸，翘起大拇指说：“看，我的丈夫就是有水平！”

当了人民教师后，朱学明废寝忘食，努力工作，先后获得了“扫盲积极分子”“模范教师”“优秀教师”“先进工作者”的光荣称号。

女孝婿贤

朱学明和徐兰育有3个女儿，分别是大女儿朱建华，二女儿朱建平，小女儿朱虹。朱学明夫妇晚年一直住在小女儿朱虹家里，朱虹夫妇极尽敬老之道。大女儿、二女儿虽不住在一起，对他们也关怀备至，经常嘘寒问暖。遇上他们生病住院，孩子们轮流日夜守护，不厌其烦。

2014年，常州市委宣传部出品的电视剧《青果巷》正式上映。朱学明夫妇与3个女儿、女婿一起观看这部电视剧。趁此机会，朱学明把他与青果巷的故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她们。他想让子女们懂得：青果巷里，是有真爱的；我们的社会，也是有真爱的。我们都应该怀有一颗感恩的心，感谢青果巷，感谢我们的社会。



江苏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常州市有关工作人员看望朱学明(右三)。

我们更应该把我们的真爱，奉献给青果巷，奉献给我们的社会。

当子女们异口同声夸赞剧中女演员青果美时，朱学明对他们说：“青果肯定是美的。但是，我总觉得你们的妈妈徐兰，无论年轻时还是现在，都要比青果还美！”全家人都被他逗笑了，尤其是徐兰笑得特别灿烂，特别舒心。

幸福晚年

回首过往，朱学明觉得自己对不起徐兰。徐兰嫁给了他，被他连累，一个人拉扯大3个孩子。这辈子，她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累。可徐兰总是淡淡地微笑：“我认定你了，你是个好人。再苦再累，只要想到我们在一起，心里就又甜滋滋的了。”

孩子们经常带他们出门旅

游，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品尝各地美味。另外，江苏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常州市有关领导，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时常前去看望慰问。近些年，朱学明多病，幸亏老伴徐兰呵护有加，3个女儿、女婿懂事孝顺，身体才逐渐恢复。

在全家人的鼓励下，朱学明积极参加当地黄埔军校同学会的活动。他还动手撰写了二十多篇回忆录，创作了几百首诗，把亲眼见到的日本鬼子犯下的滔天罪行，把和战友们一起与日本鬼子英勇战斗的经历写下来，教育青少年一代，毋忘国耻，努力振兴中华。

2020年5月，徐兰因病离世。朱学明非常伤心。他说如果有下辈子，还要娶徐兰，与她再续前缘，好好照顾她。📖

一生黄埔三结缘

——老兵寸品德的故事

□ 胡家兴

寸品德，抗日将领寸性奇长子，字子超，云南腾冲人，生于1908年。中学毕业后在一家玉器商号做小伙计，曾作为马帮“走外帮”的伙计“走夷方”到缅甸、泰国一带，其间自学了英文。后与亲戚朋友创办滇西亚细亚水火油公司、憶泰兴商号和美丽商行等，还入股大理火柴厂。

1930年，寸品德继承家族传统，奔赴驻江西的中央陆军第3军（滇军）入伍，新兵大队训练结束后进入军官队学习，毕业后任第12师第34旅旅部少尉副官。1936年，寸品德赴南京，参加中央军队党政工作干部训练班第4期学习，毕业后任第12师特党部上尉干事，后升任特党部少校训练科主任。其间随部调防河南，驻扎开封、郑州等地。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寸品德奉命护送第3军眷属返回云南，在开封与父亲寸性奇分手。话别之时，寸性奇交待儿子，把部队眷属安全带回云南，好让将士们安心上阵杀敌，等胜利了大伙一定会再团聚。父子二人均不曾想，一别竟成永诀。1941年5月晋南会战期间，寸性奇在山

西中条山壮烈殉国。

9月底，寸品德带队回到昆明，拜见云南省主席龙云。在龙云的安排下，寸品德担任省政府上尉副官兼滇黔绥靖公署政训处上尉处员。寸品德没有料到，这个看似闲散的职务很快肩负了一项重任。1938年，中日军队在徐州外围展开厮杀，史称徐州会战。从云南千里迢迢赶赴第五战区的第60军（滇军）将士浴血搏杀，取得了辉煌战绩，但也付出了巨大代价，伤亡总计高达18844人！徐州会战后，亟待整补的第60军并未返回云南，而是奉命继续参加武汉会战。部队减员严重，补充兵源就成为当务之急。抗战时期地方军队补充兵源一般是在其本省境内，第60军征兵工作也因此主要在云南展开。但由于抗战初期国家在兵员征募方面缺乏系统的法规和监察制度，征兵舞弊案时有发生。第60军在云南的征兵工作就发生了问题。此时，担任滇黔绥靖公署政训处上尉处员的寸品德被指派赴云南景谷、缅甸、镇康一带查案。寸品德在彻查贪腐案件的同时，超额完成了征兵任务，受

到省政府通令嘉奖。这次工作中的突出表现，也使他和黄埔第一次结缘。

1939年，寸品德被龙云保送进入位于昆明的黄埔军校第5分校第16期军官补训队。军官补训队的学期很短暂，但这是正规的军校教育，对他军事素养的提高很有裨益。1940年9月，寸品德担任保山团管区常备队上尉中队长，后升任团管区司令部少校部员。1942年，寸品德调任腾大师管区模范队少校队长，驻大理三塔寺。1944年，升为腾大师管区司令部中校部员。团管区和师管区，都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兵役管理部门，主要负责兵员征募、新兵训练、后备军人管理等。

1942年5月，云南怒江以西沦陷，腾冲、芒市、龙陵等地被日寇侵占。大批难民逃难到保山、大理、昆明等地，或投靠到亲朋家暂住，或租住旅店饭馆，大多生活拮据，赊账欠账之事时有发生。时间一长，逃难人员与当地旅馆饭店老板之间遂产生矛盾，老板难免说出一些不堪入耳的话语讽刺难民。当时正在大理任职的寸品德得知此事后，

认为家园被敌所占不愿当亡国奴而逃出的人应该得到尊重。于是派遣副官到下关附近街道寻得来自滇西沦陷区一带的爱国青年40多人，安排住于师管区三塔寺军营宿舍中，还拨出一些炊具供其使用。

救一时之急易，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寸品德向时任云贵监察使的李根源等提出，能否将更多的沦陷区爱国青年召集起来，组织军政训练，毕业后可用于补充一线部队指挥岗位。这一建议得到李根源与赵德恒的赞许与肯定，二人亲自向龙云汇报。龙云同意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呈报在滇西大理开办军事训练团，这一建议符合云南抗战形势和需要，不久得到批准。这就是在云南抗战史上赫赫有名的军事委员会滇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的由来。1945年前后，国民政府中央各学校毕业生调查处规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学员也享有黄埔军校学生身份。自然，寸品德提议设立的滇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也进入黄埔范畴。这是寸品德和黄埔的第二次结缘。

当时，寸品德的家乡也在沦陷区，亲属都生活在日寇魔爪下，但直到完成滇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的招考任务后，他才短暂请假回家，秘密地将家眷接至大理，接着又投入忙碌的征兵和训练工作中。1942年8、9月



/ 1945年的寸品德。

/ 寸品德 1945 年的档案。

间，滇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正式开学。团长由蒋介石兼任，副团长为龙云、李根源，教育长由宋希濂兼任。寸品德则被任命为教官，负责招考工作。全团共招收培训滇西沦陷区及全国有志爱国青年共计1900多名。紧张的军政训练外，滇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特别注重学员综合素质的培

育。云南地处抗战大后方，很多高校内迁于此，教育资源丰富。西南联大教授潘光旦、费孝通、闻一多等著名学者均曾受邀来团讲学。学员毕业后大多分在滇西远征军作战部队，他们在收复滇西失地中英勇奋战，流血牺牲，可歌可泣。

2019年，《黄埔》杂志第2期刊登的《战斗在滇西——黄埔老兵卢彩文小传》一文的主人公卢彩文老先生，就是滇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的学员，他于1942年8月考取该团第1期，毕业分至国民革命军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二科任少尉参谋，参与滇西地区情报侦察。2015年，卢彩文应邀参加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接受中央领导同志的致敬和检阅。这是他自己，也是滇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全体学员的荣誉。

1944年滇西大反攻前，寸品德调任中国远征军长官司令部少校联络官，专司保山团管区为远征军部队补充兵源和粮食协调。滇西全境收复后，寸品德因各项工作考核优良，于1945年任中校。

1949年12月9日，寸品德随云南省主席卢汉、第93军军长龙泽会等联合签名参加起义，云南和平解放后，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暂编13军任军官队队副。1951年初，因家中老母病重，寸



/ 黄埔军校建校 69 周年，寸品德（前排左二）与腾冲黄埔同学合影。

品德返回腾冲，告别军旅生涯。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寸品德迎来了又一个春天。1981年，他应云南省政府邀请，以辛亥革命后裔身份，前往昆明参加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大会。1986年，寸品德开始参加云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活动。1988年，他应邀参加西南黄埔军校同学会云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分会成立大会，就任腾冲黄埔军校同学联络组负责人。这是他一生中第三次和黄埔结缘。

为了更好地开展腾冲黄埔军校同学联络组的活动，他还



/ 晚年的寸品德。

动员其孙胡家兴参加相关工作。祖孙两人一起寻找本地黄埔同学，组织各类会议和纪念活动等。寸品德在积极联络海内外黄埔同学亲友的同时，还敦请其他同学给海内外的黄埔同学及亲友写信，宣传祖国和家乡腾冲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邀请他们回来亲自感受家乡的崭新面貌。

1990年的一天，寸品德收到一封来自泰国的信。来信人1942年在大理考入滇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1期，毕业后参加滇西对日作战，询问黄埔军校同学会

是否把他这一期列入黄埔军校第19期。如上文所述，1945年，国民政府就已出台规定将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列入黄埔军校序列。但由于历史久远等因素，腾冲黄埔军校同学联络组并不了解有关情况。寸品德迅速上报，不久接到云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通知，正式明确滇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列为黄埔军校第19期。腾冲黄埔军校联络组会员因此也由原来的30多人增加到80多人。寸品德等经过商议，申请成立腾冲黄埔军校同学会，很快得到省黄埔军校同学会批复同意，寸品德任首任会长。

腾冲黄埔军校同学会办公经费紧张，寸品德和同学们不仅拿出自己微薄的收入贴补工作开支，还和同学们一起想尽办法招商引资创办实体经济，以解决同学会的办公经费不足问题。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腾冲黄埔军校同学会的活动办得有声有色。例如，每年清明节组织黄埔老兵和黄埔后代至国殇墓园祭奠英烈；每年组织黄埔校庆纪念活动；多次举办黄埔老兵书画展等。1995年8月15日，腾冲黄埔军校同学会联合腾冲老年诗书画协会等社会团体，在国殇墓园举办“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活动”，引起很大社会反响。

此外，寸品德还担任过腾冲县第四、五、六、七届政协委



/ 寸品德(左)与明瑞智(右)商量撰写县政协委员提案。



/ 1995年清明,作者(右)陪寸品德(前排中)参加腾冲国殇墓园祭扫活动。

员。他关心全县经济、民生问题，积极撰写委员提案反映民情民意。他与其他委员联名撰写的《加大荒山荒坡种植力度建设森林大县》《推广烤烟种植促进农民增收》《依托腾冲文化、地质资源建设旅游大县》等提案，

都被有关部门采纳。寸品德也因此多次被评为腾冲县优秀政协委员。

1999年6月，寸品德与世长辞。✶

（作者胡家兴系寸品德的孙子）

修桥 驾车 建大楼

——一位黄埔老兵的抗美援朝往事

□ 赖德武口述 赖怀恩记录 丁暮整理

赖德武，1928年2月生，广东潮州人，黄埔军校第22期2总队步科学生。1949年11月随部队在成都起义后，进入新都的西南军大川西分校进行思想改造，一年后到西南军区工兵学校学习，结业后进入西南军区工兵政治部文化科。1952年至1955年，随部驰援朝鲜。作为工程兵，他们不仅驾车修桥保障了运输生命线的畅通，还砌砖建房完成了战后重建平壤城的使命。

万里赴戎机

当时，朝鲜战事已进入相持阶段，志愿军前线需要大量的后勤补给和工程支援。赖德武从西南军区工兵政治部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工兵12团汽车连，担任见习排长。从四川简阳出发，日夜兼程，翻越秦岭山脉，驱车近1000公里抵达陕西宝鸡。在那里，全部车辆进行捆绑伪装后，装上火车就往朝鲜方向进发了。

“出发前我将个人的一点东西都寄走了。到中朝边境安东（今丹东）时，把身上仅剩的一点钱买了当地美食，然后就抱必死决心过境朝鲜了。”赖德武说，“火

车一直往前开，头上不时就有飞机盘旋。”为了躲避敌机的炮弹，白天火车经常在山洞里停下来，等轰炸机飞走后继续前行。

下冰河修桥

他们进入朝鲜后的第一个任务是抢修被美军飞机炸毁的大桥。全体人员下火车后开始连夜急行军，不能休息也不能掉队，很多人都走到腿脚抽筋、肿胀。抵达后，看到江的两边有大批粮食、物资要通过这座桥运往前线，同时前线的伤员也通过这里要运往后方，情况非常紧急。战士们顾不上疲劳，立刻开始抢修作业。这座大桥是当时朝鲜战场的主要交通通道，必须要用尽一切办法保证这条运输生命线一直通畅。

“那时天天美机来轰炸，一来就是几十架，一批飞走后又飞来一批。”大桥两边有高射炮部队驻守，美军飞机一来，炮兵就用高射炮交叉打横开火。赖德武也临时去当了机关枪射击手，从正面用机关枪对着美机打，使得飞行员没有机会低飞对准大桥轰炸。这种打法也把自己

置身于敌机轰炸的危险范围内。他清楚地记得，周围炸弹爆炸声、高射炮声、机关枪声震耳欲聋。最惊险的一次，是美机丢下的炸弹落在了身边仅十几米远的地方爆炸，整个人都被埋在了土里。他说，“当时就感觉在地动山摇，还好自己命大没给炸中。”

每次大桥被炸后，工兵就要拿松柏树等材料冲上去，用最快的方法、最简单的材料进行抢修。抢修作业经常要在水里完成，当时正值冬季，到处天寒地冻。赖德武是南方人，会游泳，在黄埔军校读书时还专门接受过游泳技能训练。当时，他是2营4连的副排长，他和几名水性好的战友喝了几口二锅头，穿着短裤带头跳下江里干活。江水冰冷刺骨，在水下待久了腿脚容易抽筋，超过十分钟身体就可能失温，随时有生命危险。他说，“过境时我们都报了必死的决心，而且战事紧迫，根本没空去多想。大家都一起往水里跳。”由于美军的飞机每天都会来轰炸，大桥被炸了又建，建了又被炸。志愿军战士几乎每天都要跳进江里进行抢修，最多时，一天

要下水3次，大桥没修好不歇工。在他看来，“下水多了，也慢慢习惯了。就是上岸时必须先用雪把身体擦热，才能去烤火，不然容易冻伤”。

为了争取时间，他们休息时就直接在草丛或桥下和衣而睡，一刻不离大桥。在这场运输生命线的保卫战中，志愿军战士们日夜坚守，时刻保证大桥的通畅，除了完成任务大家什么都顾不上。“休息时就随时随地躺下睡，雪地也是照样睡下，能睡就不错了。”赖德武说。

清扫战场时，赖德武从废墟里拣了几块被击落的美军飞机残骸碎片，利用休息时间将其打磨成汤匙。回国后，他将其中两把送给友人作纪念，自己留了一把，可惜现在已经找不到了。在朝期间，工兵12团四处辗转，抢修了多座桥梁，有力地保障了运输生命线的通畅。

关车灯夜行

汽车连的主要任务是运输物资，在漫长的运输线上，他们每天都是敌人飞机狂轰滥炸的目标。为了避开轰炸，汽车多数是夜晚开进，沿途的每个山头都安排瞭望哨，美机一来轰炸就会鸣枪警示。听到枪声，车辆就立即关掉车灯，降低车速，在夜色中摸黑前行。美机走后，瞭望哨就会敲钟解除警报，车队又恢



/ 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图片来源:《亲历抗美援朝战争》孟昭瑞)

复正常行驶状态。

除了轰炸，美机还会沿着道路抛洒一种三角形的钢钉，用来扎破志愿军汽车的轮胎。每次美机飞过没有投弹或者遇到轮胎被扎，前车都要停下来检查路况，排除路障。这样不仅拖慢了行军速度，而且一旦敌机飞回来轰炸，车队就成了固定的活靶子。后来上级联系朝方，组织了大批当地老百姓上路扫除，情况才好转，运输顺畅了许多。

随着战线往南的不断推进，志愿军的补给线越来越长，运输任务也越来越重，不得不白天也冒险行进。行车时他们会用树枝把汽车整车伪装起来，尽量分散前行。而此时，美军飞机加大了轰炸力度，企图切断志愿军的补给线。赖德武说，开汽车运输物资，天天会遇到美机轰炸，一批刚去一批又来，后方



/ 赖德武在朝鲜期间戴的志愿军军帽。

补充的物资有三成都在运输途中被炸毁了，司机能捡回条命都算不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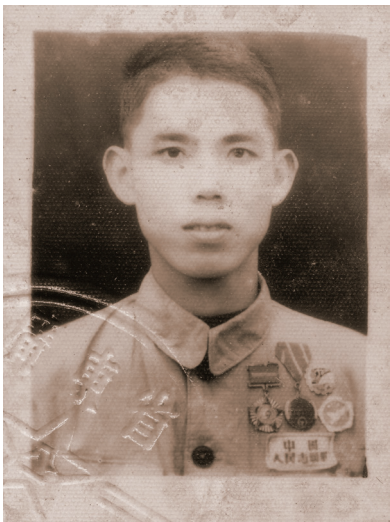
据赖德武回忆，曾有一次运输物资去志愿军司令部。司令部在大山的山洞里，四处都加了伪装。为了给战士们解压，更好地鼓舞士气，上级安排他们在司令部的山洞里观看电影，是

用小放映机放的，电影名不记得了，只记得大家看得很专注。中途有美机来轰炸，外边高炮开炮，炮声轰响，大家都跟没听见似的，很淡定地继续看着电影。他说：“经历了那么多的炮火，心里平静了很多，一点也不害怕。”

重建平壤城

1953年7月27日22时，朝鲜战场实现完全停战。大约两星期后，赖德武随工兵12团开赴平壤参加战后重建工作。当时他任教导连副排长。刚抵达时，全城满目疮痍，到处是残垣断壁，一处完好的建筑都看不到。一开始，部队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他们就将一些残垣断壁稍事休整，割来杂草铺在地上睡。因为刚从战场上下来，志愿军战士早已习惯了在野外风餐露宿倒地就睡的日子，这些对他们来说根本不算什么，能睡个安稳觉已是非常满足。

根据《抗美援朝战争史》的记载，重建平壤是当时所有援建工作中最为艰巨的任务，前后历时两年多。第一年的任务包括架设1座桥梁、新建2座烧成炉，制作850栋民房屋架，修复5栋工人宿舍和政府大楼，并新建部分职工住房，为第二年的大规模建设创造必要条件。工兵12团提出了“以建设祖国首都北



/ 1955年3月，赖德武完成抗美援朝任务后从朝鲜复员。



/ 赖德武获颁抗美援朝70周年纪念章。

京的劲头建设平壤”的口号。当时，施工条件也很差，施工工具、器材缺乏，他们就四处找炸弹残骸，用弹壳作原料，做成烘炉，打制铁钉、角铁和其他工具；工地上需要大量沙石，他们就到大江里去捞，在河滩上建起临时加工厂，以保证工地需要。

1954年起，该团又参加了一大批规模更大、技术要求更高的工程建设任务，包括朝鲜内阁各省综合办公大楼、牡丹峰艺术剧场以及5所院校的校舍、3座工厂厂房和1座仓库库房，修复平壤市综合医院和大同江公路铁桥。

赖德武说，他主要参与的工作是修建房屋，当时也不知道具体是修什么建筑，有的是居民住房，有的像是办公大楼。此外，他们还要站岗、巡逻，负责安保工作。休息时，他和战友们曾去过平壤广场的地下工事里看电影。地下工事挖得很深，从地面的入口下去要走几百个台阶，下面空间很大，挤了很多人，但依旧用的是小放映机。因为不用再打仗了，大家心情都很放松，说说笑笑好不热闹，观影的气氛也很活跃。

在援建平壤的两年多时间里，工兵12团共参与较大工程38项，修建完成建筑面积达20余万平方米，其中包括著名的牡丹峰剧院。其间，朝鲜主要领导人、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总团长多次到团驻地慰问，还参加了竣工剪彩和功臣授勋活动。1955年3月，赖德武完成任务后，从朝鲜复员回到潮州工作。

2020年10月23日，赖德武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

我与文强先生的难忘往事

□ 李石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我的父亲是黄埔军校18期毕业生，承蒙当时的北京黄埔军校同学会丰台区联络组组长安树衫（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特训班）和副组长申毓善（黄埔23期1总队骑兵科）老先生的厚爱，以黄埔二代的身份参加了当时北京黄埔军校同学会的许多活动。

当时，北京黄埔军校同学会负责联络我们这些黄埔二代的是陈军（黄埔军校17期1总队炮科毕业生傅传的女婿），参加活动的还有周秉德（原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侄女）、乔秀琴（黄埔6期毕业生乔家才的女儿）、刘国平（其父黄埔军校毕业，原北京中山公园中山堂的负责人，民革北京市委委员），还有在1991年获全国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开拓奖”的张玉兆等人。

记得第一次开会，主持会议的是北京黄埔军校同学会秘书长赵敏（原湖南洪江机械化学学校7期战车科毕业生），北京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文强给我们讲话。文老虽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但通篇讲话都充满激情，从黄埔军人秉承孙中山爱



/ 文强。

国主义和革命精神的传统到两岸和平统一的前景，讲黄埔军校生的子女如何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献计出力等等，给我们到会的黄埔后代极大的鼓舞。午餐时，原本同学会计划让文老去饭店用餐，但文老坚决拒绝，坚持同我们一起吃盒饭，并说大家要“同甘共苦”，令我们特别感动。

从这次会后，我就与文强老先生认识了，尤其是文老从崇文区的住宅搬到海淀区甘家口以后，我们来往就更多了。当时我在北京煤气用具厂用户服务科当科长，文老是我厂燃气热水器的用户。我把文老年纪大、行动不便等问题向厂长作了汇报，厂长听了对此事十分重视，也因为对

文老特别敬重，一来二去我就成了文老家的厂家“特约维修员”，到文老家的次数就更多了。我每次去检查热水器都与文老聊聊天儿，每次的谈话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和难忘的记忆。

记得有一次，北京黄埔军校同学会在中山公园中山堂组织活动，我也参加了。我父亲看见我正跟文老打招呼，就让我招呼丰台区黄埔军校联络组的安树衫、申毓善和我父亲一起合个影，但可惜我当时用的胶片式照相机里只剩了一张底片，而且由于经济拮据，买的是便宜的胶卷，不一定能照好。后来，文老看傅传、孙玺扬（黄埔18期2总队炮2队毕业生），还有另外两位老先生也跑了过来。就招呼大家一起照，说：“李石不就剩一张（底片）了吗，大家一起照吧！”又对我说：“那就只有委屈你了，你给我们当摄影师吧！”真走运，相片照上了，但可能还是胶卷质量不太好，底片上有一条红色道子，尽管如此，这仍然是一张珍贵的照片。

文老谦逊随和，对后辈也是爱护有加。由于经常去文老家，文老曾送过我多幅书法作

品，至今仍在我这里保存完好。其中有一副写着“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既是文老自身追求的写照，也是文老对我们后辈的期许。我还有幸聆听过不少次文老的讲话和报告，从中受益匪浅。文老自担任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之后，以80多岁的高龄跑遍了国内各省区市的黄埔军校同学会，还出访美国，会见了许多黄埔将领，也有不少人专程从台湾来探望他。他为祖国统一，为继承发扬黄埔精神做了大量的工作。

文老喜欢写诗，有多本诗集。一次我去看望文老，他谈起去广西漓江做的一首诗，我当时还没学写诗，有点似懂非懂。这首诗没有收录在他的诗集里，在这里把它分享给读者，表达我对文老的敬意。诗中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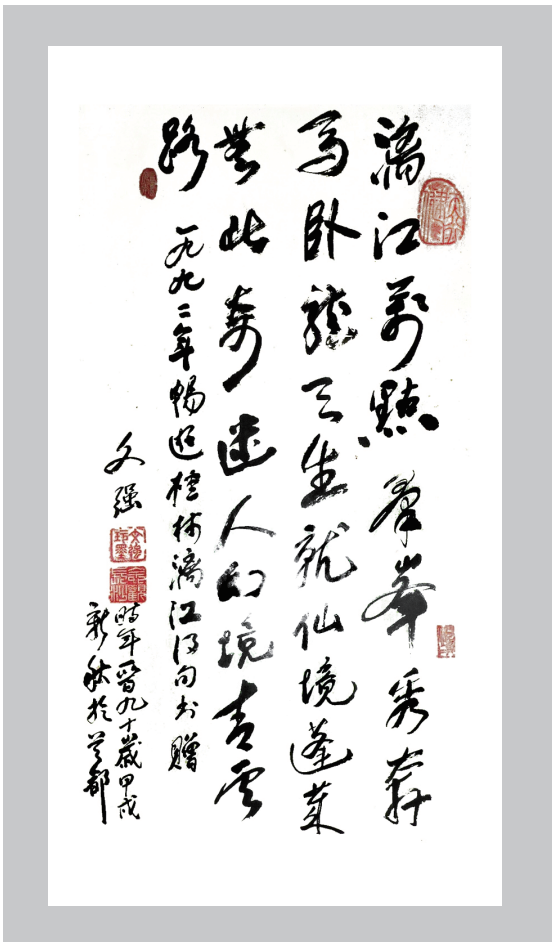
漓江万点群峰秀，
奔马卧龙天生就。
仙境蓬莱无此奇，
迷人幻境青云路。

文老将这首诗写成书法条幅送给我，我把它镶嵌在镜框里时常观赏。

2001年10月22日，文老与世长辞。当时我正在郑州出差没能参加文老的遗体告别仪式，回来听说后，难过了好长时间。我和文老的儿子文定中是好朋友，总与他商量撰文纪念文老的事。



文强(左二)与侯镜如(左三)等几位黄埔军校毕业的将领在交谈。



文强赠送李石的书法作品。

抗日战争期间的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 (下)

□ 杨守礼 黄胜利

在《抗日战争期间的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上)》中,我们已经就毕业生调查处在抗战期间随战局演变办公地点不断内迁的过程、隶属编制和任官的变化、蒋介石对毕业生调查处的指令、毕业生调查处的下属机构、规章制度的建立、及新生活俱乐部等方面作了评介,现再就抗战期间毕业生调查处关于黄埔军校子弟学校——中正学校、收容失业和伤残毕业生、停止同学会性质组织活动、视察慰劳和息亲、及指导教育与宣传出版诸方面作进一步的评介。

黄埔军校子弟学校——中正学校

1934年6月16日,中央军校在南京举行建校10周年纪念大会。鉴于黄埔同学流动性很大,无暇兼顾子女教育,遂由胡宗南、刘咏尧、黄雍等同学代表151人提议,筹办黄埔子弟学校,“以教育同学子女,使能负荷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之使命”,并决定交由中央各军校毕业生调查处负责筹办。毕业生调查处处长为刘咏尧,副处长黄雍。1936年2月10日建成开学,命名新生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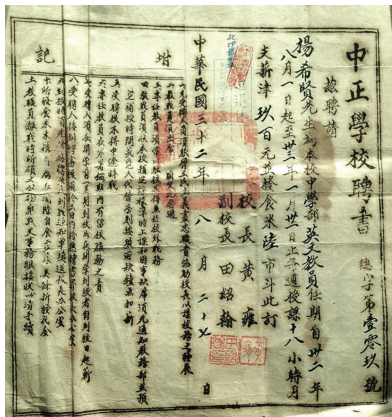
校(当年10月31日正逢蒋介石50寿辰,遂改为中正学校),以刘咏尧为董事长,黄雍为校长,教务部主任王晓春,训导部主任贺澍,总务部主任王友瀛,幼稚园主任胡淑英。抗战爆发后,中正学校内迁重庆。1939年9月29日,中正学校在渝复课,校址在重庆小龙坎覃家岗。12月25日,举行中正学校复校及遗族工厂开幕典礼。此时,中正学校聘何应钦为名誉董事长,胡宗南、黄雍分任正副董事长,刘咏尧、谢远灏分任正副校长。12月3日,第二次校董会决定撤销副校长的设置,增设教务长一职,并由田绍翰常务校董兼任教务长。1942年后,黄雍改任校长,田绍翰任副校长。在重庆复校后的校董会有校董117人。其中黄埔1期61人,占半数以上,集团军司令、军师长级别以上任职者约90余人。

黄埔军校子弟学校,为流动性很大的军人子弟提供一个相对稳定安全,且具有较高教育质量的就读环境,以减轻军人的负担,使其全力以赴尽军人保家卫国的天职。黄埔子弟学校——中正学校过去很少有人提及,甚至

它的师生对自己的这段经历也讳莫如深。今天黄埔军人对中华民族抗击日寇所做的历史性贡献已经得到彰显,我们对黄埔军校、黄埔军人以及抗日战争都有了较全面的认识和理解,所以对中正学校也应该有一个全面正确的了解。这不仅是黄埔军校研究者关心的课题,更是当年中正学校师生群体和他们的亲友及后裔极为关注的话题。

对于中央各军校毕业生调查处而言,中正学校是以培育黄埔将士的后裔成为人才为宗旨的,而这些黄埔将士是在以生命为代价,为国家和民族与敌人做着殊死的战斗。所以为中正学校而工作,是在告慰为民族而牺牲的烈士英灵,也是向在战场上浴血奋战的将士们表达我们对他们的关爱和报答。中正学校的工作不只是单纯的教育工作,中正学校的教职员是在代表全民族和整个国家,向烈士们和在前方与日寇浴血奋战的将士们,践行我们国家和民族对他们的承诺。这是一项庄严神圣的历史责任!

中正学校的师资力量雄厚,精英云集。有早年湖南大学中



1 / 校长黄雍和副校长田绍翰 1943年8月给杨希贤女士颁发的中正学校英文教员聘书。原件由杨希贤的女儿戈定瑜女士提供。

文系主任、书法家孙佺工(任语文教员、代副校长),著名作家骆宾基(解放后全国文联常委)、丰村(解放后上海文联副主席)、柳惠初(柳亚子之侄)、李岳南、丰乃天、宋慕法,著名诗人郭德浩(高兰),著名画家许敦谷(太谷),著名音乐家刘亚琴、王菊英,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同窗好友张超等。这里给出中正学校校长黄雍和副校长田绍翰1943年8月给杨希贤女士颁发的中正学校英文教员聘书。杨希贤曾连任“台湾国立师范大学”三届家政系主任,著述颇丰,2011年病逝于北京太阳城国际老年社区,终年96岁。

在抗战期间,毕业生调查处有关中正学校的记录如下:

1936年2月10日,于南京创立黄埔子弟学校——新生学校开学。7月,改称中正学校。

1936年3月12日,新生学校补行开学典礼。

1936年10月31日,新生学校改称中正学校。

1939年3月1日,成立贵阳中正学校。

1939年8月1日,成立成都中正学校。

1939年9月29日,成立于南京的中正学校在重庆复课。

1939年10月1日,在重庆召开中正学校复校后第一次校董会。

1939年10月15日,在重庆建立阵亡同学遗族工厂。

1939年12月3日,在重庆召开中正学校复校后第二次校董会。

1939年12月25日,在重庆举行中正学校复校及遗族工厂开幕典礼。

1939年期间,在重庆小龙坎覃家岗中正学校附近凿防空洞6处,可容师生两千人。

1940年4月10日,宋庆龄、宋美龄、宋霭龄参观中正学校及遗族工厂。

1940年10月31日,成立章曲中正学校。

1941年1月1日,成立中央军校第八分校中正学校。

1941年6月9日,订定《中正学校对于各军校毕业生遗族免费办法》。

1941年6月13日,奉发胡参政员文虎捐款10万元,分发中正学

校和遗族工厂各5万元。

1941年9月1日,成立宁夏中正学校。

1942年1月26日,成立淮安中正学校。

1942年2月2日,成立西京中正学校。

1942年6月5日,通令各地中正学校不得自由募捐。

1942年6月9日,修正《遗族同学在中正学校免费就学办法》。

1942年8月1日,成立桂林中正学校。

1942年8月12日,奉军政部令批准派该处主任秘书田绍翰兼任遗族工厂厂长。

1942年8月24日,奉蒋委员长令发给遗族工厂内遗族一次救济金11600元。

1942年9月2日,具中正学校学生中之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遗族子女名册,签请蒋委员长赐给教育费。

1943年3月8日,各地中正学校名称一律冠以所在地地名,并划一教育宗旨与原则,及校训、校徽、校旗、校歌等。

1943年9月30日,裁撤淮安中正学校。

其中这些事件凸显了当时的领导人、社会各界、毕业生调查处及中正学校,对于为国捐躯毕业生后代的关切:成立阵亡同学遗族工厂,举行中正学校复校及遗族工厂开幕典礼;宋庆龄、宋



/ 1940年4月10日，宋庆龄、宋美龄、宋霭龄视察重庆中正学校遗族工厂。她们手中所拿是遗族工厂的产品。（照片来源：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

美龄、宋霭龄参观中正学校及遗族工厂；订定《中正学校对于各军校毕业生遗族免费办法》；参政员胡文虎捐款10万元，分发中正学校和遗族工厂各5万元；蒋介石发给遗族工厂内遗族一次救济金11600元；提出中正学校中毕业生遗族子女名册，签请蒋介石给予教育费等一系列措施。

1945年9月6日，国共谈判期间，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的陪同下，专程到覃家岗中正学校，拜访早年湖南大学中文系主任、书法教授孙徕工先生和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同窗好友张超，两位与毛泽东一行欢叙。当时两人都中正学校任教，孙徕工任语文教员，代理副校长，他们都与国民党要人有很深的关系。次日《新华日报》对毛泽东等三位中共领导人的这一活动作了报道。

1942年8月12日，毕业生调查处主任秘书田绍翰兼任遗族工厂厂长。田绍翰是除了刘咏尧和黄雍之外，对遗族工厂倾注心血最多的人，他担任厂长是最恰当的人选。关于中正学校遗族工厂有如下记述：“沿成渝公路由北向南有三个入口进中正学校，北起第三个入口西行，有一个十字路口，由此向北进入中正学校办公区和教学区，向南则进入遗族工厂大门。遗族工厂有四栋厂房，及办公室、物料间、厨房、宿舍、厕所等多栋建筑。开办遗族工厂是刘咏尧、黄雍、田绍翰三位黄埔老校友，在筹备复校过程一直精心打造的重点，他们要为国牺牲将士的妻儿老小提供一个安身立命之所，让烈士的灵魂能够安息。黄雍任荣誉军人生产事务局筹备处处长和军政部荣誉

军人总管理处专任副处长后，还不时派他网罗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来工厂指导生产，协助解决生产中出现的困难，工程师魏兆琦就是其中的一个。重庆中正学校和遗族工厂受到宋氏三姐妹，特别是宋美龄更多的青睐。因为重庆中正学校设有规模颇大的遗族工厂，有人也称该校为‘黄埔遗族学校’，其实早在北伐时期为培养北伐烈士遗孤，就由宋美龄主持开办了‘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中正学校和遗族学校有密切的联系，1947年11月，黄雍校长带领上海中正学校童子军到南京露营时，就到遗族学校访问，受到校方的热烈欢迎和招待，同时在国防部大礼堂和遗族学校受到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分别接见、训话和交谈。重庆中正学校遗族工厂同时也是中正学校女生劳作课的场所。此外另辟有（廖）仲凯农场，是中正学校男生的劳作课场地。”（杨守礼、黄胜利：《中正学校——黄埔子弟学校》，待出版）。

1944年，在日寇为打通南北交通线的“一号作战”中，中国遭到巨大挫折，而此时中国远征军也急需补充有知识的青年军人接收先进的美式装备，于是，蒋介石发出了“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的号召，掀起了知识青年从军运动。1944年秋的一天，在黄雍校长的陪同下，杜聿明将军来到重庆中正学校，

作知识青年参军保家卫国的动员。此时，杜聿明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令，借其回陪都述职之机，黄雍将其请到中正学校与青年学子见面。据黄埔5期罗念前之子、中正学校学生罗大周回忆：杜聿明将军在动员报告中讲述了国际形势，介绍了印缅战场实况。他说：“日军虽然顽凶，但只要中、美、英齐心合力，完全可以打败它！”他还讲述了班超投笔从戎的故事，激励学生参军。晚上，学校文工团演出了郭沫若的《棠棣之花》，讴歌为知己者死的聂政姊弟，激励了同学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当剧中人聂莹高唱：“去吧！兄弟呀！我望你鲜红的血液，化作红花，开遍中华，开遍中华”的时候，同学们感动得流泪。第二天，中学部的同学们踊跃地参军，他们戴上大红花，坐上军车，在军乐和鞭炮的热烈气氛中奔赴抗日战场。黄雍校长的内弟郑本，是上世纪30年代著名演员郑挹梅（露伊）的弟弟，也是中正学校的学生，在此次动员后也毅然地参了军。

中正学校学生向士弘从远征军复原后，1946年即发表了题为“课堂到战地”的感触文字，充分表达了一个热血青年投笔从戎的精神状态：“三十三年（1944年），先之以中原失利，继之以湘桂溃退，好像决了堤的江河，举国人心惶惶，风声鹤唳。热血

青年再也不能安坐教室了，又因蒋主席号召，各地青年纷纷自动请缨，走入战斗的行列。我也瞒了家庭，不顾亲友的劝阻，断然地加入了战斗行列。先期同学暗示我，印缅的原始森林是不见天日的，也不能阻止我，因为“你还没有从军吗？”这句话，对我刺激太大了。你能说你不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吗？你能推辞国家兴亡之责吗？你没有当兵的义务吗？只要不是没有人性的青年，谁都不能承受这几句问话。”

为鼓励学生从军，蒋介石特令蒋经国和蒋纬国参加远征军服役。国民党高官与社会名流也纷纷带头把子女送上前线：如四川省、陕西省、贵州省政府主席张群、祝绍周、杨森之子张继正（留美归来在四川大学任教授）、祝源远、杨汉渝，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之子顾福生，剧作家田汉之子田申，画家徐悲鸿之子徐伯阳等，都在征招运动中争相奔赴战场。学生青年投笔从戎成为当时一大潮流。据统计，中央、重庆两大学报名者竟达在校生的1/3；同济大学1200多名学生中报名者竟有862人，经筛选有386人参加了中国驻印军；西南联大亦有1129人奔赴沙场。至1945年元旦，应征入伍的青年军共12万人，入印缅参战的有1万余人。包括中正学校学生在内的青年军，参加缅北大反攻诸战役，对打通中印

公路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华民族危亡的关头，大批热血知识青年为抗击日寇而英勇献身，他们写下了抗战史上的绚丽篇章，值得我们永远崇敬和铭记。

收容失业和伤残毕业生

收容考核失业毕业生是毕业生调查处最基本的工作之一，考核的结果作为失业同学分派工作的标准。最早对失业军官的考评是以谈话形式进行。1935年考评1637人；1936年考评1652人；1937年9月，为此专门成立了“失业毕业生集中管理处”；1937年，在南京举行社会军训教官考试三次，与试者1546人；1938年初，在长沙对集中管理之失业军官举行甄别考试一次，考取者372人，编为军官大队施行训练；1938年7月，对集中管理之失业毕业生2367人举行甄别考试，并在武昌成立军官总队，随即撤销了“失业毕业生集中管理处”，失业毕业生的收容、训练、考核和管理就由军官总队负责。军官总队所辖两个大队，1939年初扩编为3个大队，1940年11月更扩编为10个大队，1941年12月又开始增设10个大队。1942年5月，军官总队遵令开始缩编，规定本年9月底以前先裁并10个大队，至本年底编至5个大队。1943年2月17日，对于军官总队之处置办法，经蒋介石批准，除合于退役者外，其

余待命移垦西北。

毕业生调查处关于失业毕业生的收容、训练、考核和管理过程如下：

1936年12月28日，收容失业毕业生246人，组成劳动服务干部团。

1937年5月20日，举行国民军训教官初选与考试之失业毕业生1546人。

1937年9月1日，于南京成立“失业毕业生集中管理处”。

1938年1月5日，收容失业毕业生372人，编队施训。

1938年7月10日，对集中管理之失业毕业生2367人举行甄别考试。

1938年7月15日，在武昌成立军官总队，并即撤销“失业毕业生集中管理处”。

1939年2月1日，军官总队所辖之两个大队扩编为3个大队。

1940年8月1日，军官总队遵令增设感化队一队，收训服役之毕业生。

1940年11月1日，军官总队遵令由原辖之3个大队扩编为10个大队。

1941年9月26日，特设东北讲武堂毕业生通讯处，收训之学员228人奉准分发工作。

1941年11月1日，军官总队遵令增设海军大队。

1941年12月1日，军官总队遵令开始增设10个大队。

1941年12月4日，特设东北讲武堂毕业生通讯处，选学员200人，送东北战地工作人员训练班受训。

1942年1月18日，审定《军官总队拟定老弱残废失业毕业生安置办法》草案。

1942年3月13日，特设东北讲武堂毕业生通讯处增设所属军官大队内之第五中队。

1942年3月15日，举行军官总队失业军官集团考核。

1942年4月1日，遵令裁撤军官总队之海军大队。

1942年4月28日，奉令转知军官总队自本年5月份起停止收训行伍出身失业军官。

1942年5月1日，军官总队遵令开始缩编，规定本年9月底以前先裁并10个大队，至本年底编至5个大队。

1942年5月12日，修正《军官总队收训失业军官审查证件办法》。

1942年6月20日，请准暂缓撤销特设东北讲武堂毕业生通讯处及该处所属之军官大队。

1942年7月19日，转报军官总队拟呈，遵令缩编实施办法。

1942年8月9日，特设东北讲武堂毕业生通讯处选送学员编入中央军校第七分校东北总队受训。

1942年12月28日，依据调整中央军事机构原则及办法，核定

军官总队裁撤问题一律由铨叙厅办理。

1943年1月5日，颁发军官总队干部预习队第1、2、3、4各期学员训练期满证明书。

1943年2月17日，军官总队处置办法，经蒋介石批准，除合于退役者外，其余待命移垦西北。

1943年3月2日，军官总队奉部令办理附属机关紧缩。

1943年10月7日，开始办理军官总队失业军官集团考核。

毕业生调查处对失业、重伤、残废、衰老同学尽力设法介绍工作或酌情予以资助，1936年底前，救济人数达3520人。1937年8月起，奉令将失业同学集中管理，听候分发工作，在未分发前由军政部发给每人15元生活费。到1938年7月底，已分发工作者共计7814人。1938年底，已分发11472人。

毕业生调查处对于伤残和捐躯毕业生家属给以特殊关照，我们仅收集到部分事例：

1937年2月1日，收容二等伤毕业生68人，成立重伤同学训练班。

1938年3月12日，开始办理毕业生伤亡调查。

1938年3月16日，订定《筹设阵亡同学遗族工厂计划纲要》，并获军政部发给开办费1万元。

1939年10月15日，成立阵亡同学遗族工厂。

1940年3月11日，开始筹备抗倭阵亡同学追悼会。

1940年7月7日，举行抗倭阵亡同学追悼大会。

这里要指出，毕业生调查处对于伤残同学的收容和对捐躯毕业生遗族的特殊关照，与军政部荣誉军人总管理处和荣誉军人生产事务局的工作彼此协同，共同完成这份艰巨而光荣的历史使命。关于这一点我们今后会有专文记述。

停止同学会性质组织活动

早在1927年3月7日，蒋介石重新发布通令，禁止黄埔军事政治学校学生组织同乡会或其他小团体，1930年11月，他宣布撤销黄埔同学会。12月12日，蒋介石指派田载龙成立中央军校毕业生调查科，直隶校本部。此后，他就禁止军中所有同学会、同乡会等各种组织，直到抗战期间，一直指令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严禁各军校内产生各式各样的同学会一类的组织。毕业生调查处也一直严格贯彻蒋介石的指令。下面的一些记录可见一斑：

1937年4月24日，广东通讯处主任侯志明呈报留粤高教班同学组织之学术研究班已遵令停止活动。

1937年5月28日，浙江通讯处主任宣铁吾与航空学校副校长蒋坚忍联名呈报，航空学校同学

会撤销。

1937年6月12日，据陆军大学学友社报告，该社遵令于本年5月31日结束。

1937年8月3日，军事委员会交航空委员会报告，该会航空机械学校毕业生指导委员会遵令撤销。

1938年7月16日，中央军校广州分校特别班简报，该班师生互助会遵令于本年7月底撤销。

1939年3月26日，四川省通讯处主任史良呈报，成都分校毕业生周熙等，及中央军校特别班川籍毕业生，在蓉各自设立之通讯组织已予制止。

1939年4月6日，令陕西省通讯处查明，成都分校驻陕同学自成通讯组织情形，即予以归并。

1939年4月29日，辋重兵学校毕业生冯志远简报，遵令取消所组设之辋重学术研讨会。

1939年7月17日，驻中央军校通讯处主任邓文仪呈报，本校第10期毕业生田豫生、王重之等私设通讯处组织，已予制止。

1939年8月5日，驻中央军校第四分校通讯处主任吴敬群呈报，遵令转饬该校驻翁源同学通讯处，克日撤销。

1939年8月15日，据浙江省通讯处主任宣铁吾、副主任胡履端呈报，军委会干训团毕业生蔡步青等，在浙组设该团同学通讯处，已勒令取消。

1941年4月8日，令广东省通讯处将毕业生杨志诚所办《新军人月刊》社专办月刊，不得再有类似同学会组织之行为。

1941年9月2日，处理广东省通讯处报告，中央军校第7期同学在粤组织同学会案。

1942年1月21日，据湖南省通讯处呈复，遵令转饬中央军校高教班毕业生在湘所设之同学会，克日撤销。

1942年5月2日，中央军校第17期通信兵科同学通讯处，遵令撤销。

1942年5月15日，广东省通讯处报告，遵令解散《新军人月刊》社。

1942年6月14日，请中央军校取缔高教班所办之《忠勇月刊》社，不得有类似同学会之组织及行为。

1942年10月15日，令苏皖两省通讯处，查报张国南组织黄埔同学会淮北分会情形。

蒋介石为什么这么严格控制军校和部队中产生同乡会、同学会一类组织呢？这要从1927年蒋介石发布通令禁止黄埔军校组织同乡会或其他小团体谈起。同乡会是一个以出身地域为纽带的组织。在旧中国军阀混战的环境下，能在军界出头的人基本都拥有起家部队，清末有曾国藩组建的湘军，近代有段祺瑞的皖军、冯国璋的直系军、张作霖的奉军、

阎锡山的晋军，还有桂军、滇军等等。在外国势力操纵下，军阀之间恶斗不止。而黄埔军校是提倡精诚团结精神和完整国家观念的，这是黄埔军校与旧军队截然不同之处。在当时中国四分五裂、军阀派系林立、民族国家意识缺乏的情况下，强调国家意识，打破地域观念，对树立统一、完整的大中国意识有重要意义。蒋介石指出：“现在所谓的直系系统奉系，就是以同乡为中心，结果我们如果还要学他，那还不是一样的糟么。”与拥有起家部队的杂牌军将领不同，黄埔军校的学生没有起家部队，更没有军政界人脉关系。黄埔系将领的部队都是蒋介石嫡系部队的一部分，对蒋介石没有利益冲突和统治威胁。没有私人起家部队是黄埔系将领受到蒋介石信任和重用的主要原因，因此蒋介石一直禁止黄埔军校组织同乡会或其他小团体。

但是，国民党军也是一批军阀起家部队的联合体。杂牌部队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存在利益冲突，更会威胁蒋介石的统治。黄埔军人为其所爱，但不能有任何人、任何组织干扰他的权威。所以当他1930年11月撤销黄埔同学会，继而成立中央军校毕业生调查科和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全面控制包括黄埔军校在内的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之后，就坚决地查封各军校、各部

队私自成立的毕业生组织，包括各种同学会、同乡会、军人杂志社、通讯处等，以杜绝对他通过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控制毕业生的干扰和挑战。

视察慰劳和恳亲

到各省市和军队通讯处视察工作是毕业生调查处的常规工作，视察的同时就兼顾慰劳各地毕业同学。慰劳和恳亲是毕业生调查处联络毕业生的柔性工作的主要形式之一，在其年度工作纲要中就列明：要与服务于中央各机关同学密切联系，而且强调“以军训部、执法总监部、抚恤委员会和铨叙厅四处为特要”，“随时访问各方来渝同学并订定访问办法”。举行在渝同学春节联谊会；招待来渝出席参谋长会议、兵役会议、保安会议同学，举行茶会；邀集在中训团党政班受训的中央各军校同学举行联谊会；举行中央军校成立周年纪念大会；举行在渝同学冬季聚餐会等。这些联谊会、茶会、聚餐会就是要具体落实工作纲要的要求，对于增强毕业生之间的凝聚力和认同感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我们查到的毕业生调查处视察、慰劳和恳亲的记录如下：

1937年10月15日，本处主任秘书谢远灏赴晋豫前线视察慰劳。

1937年10月23日，本处处长

刘咏尧赴淞沪前线视察慰劳。

1938年5月15日，派孙常钧、张弥川、王家槐三同学分赴平汉路沿线及晋西、陕东、浙西、皖南等战地视察慰劳。

1939年1月31日，举行本处临时会报，研讨筹备在渝同学恳亲事宜。

1939年6月28日，派本处通讯股股长蔡汝慎随同中央慰问团北团出发视察慰劳。

1940年1月20日，举行在渝同学春节联谊会。

1940年3月31日，招待来渝出席参谋长会议、兵役会议、保安会议之同学，举行茶会，并印送本处工作简报。

1940年12月20日，派员视察驻中央各机关通讯处工作。

1941年6月16日，召集在渝同学举行中央军校成立第17周年纪念大会。

1941年9月17日，派本处主任秘书田绍翰出发赴陕川甘青宁豫鄂省视察各地通讯工作及军官总队各大、中队情形，并慰劳各地同学。携带本处特制之慰劳册1500本分送。

1942年1月9日，派员访问驻中央各机关通讯处负责人员。

1942年3月8日，派军官总队总队长杨良出发赴黔桂湘赣浙闽粤等省视察各地通讯工作及军官总队各大队、中队情形，并慰劳各地同学。携带本处特制之慰劳

册1500本分送。

1942年9月20日，邀集在中训团党政班第20期受训之中央各军校同学举行联谊会。

1942年10月13日，成立本处员兵消费合作社。

1943年6月16日，在重庆抗建堂举行中央军校成立第19周年纪念大会，到会同学七百余人。

1943年12月26日，在重庆中正学校举行在渝同学冬季聚餐会，到会者三百余人。

指导教育与宣传出版

毕业生调查处对毕业生指导教育的宗旨是：使毕业生在思想、学术、生活、工作及修养等方面力求进步。具体办法为：举行小组讨论会，学术演讲会，时事、政治、经济、军事、工作方法座谈会，读书会，辩论会，职员眷属敦谊会，聚餐会，政治问答及刊发《会声月报》《黄埔潮音》和《血花丛书》等。

关于《血花丛书》我们查到的有：

黄埔论丛（选辑同学讲稿论著）

黄埔事业集

精忠录（抗倭殉难同学事略）

羔墙集（领袖手谕、信札、

照片及生活论著选辑）

校长训话集

何部长敬之先生训话集

修养与人生（1937年8月15日

出版）

为学的目的与方法（1937年8月15日出版）

各级通讯工作人员应有的认识与修养（1942年12月1日出版）

《会声月报》1937年2月创刊，每月一期，到8月出至第五期后，因战局变化毕业生调查处西迁，驻地屡次更换，印刷困难，直至1940年4月才在重庆继续出版第六期，此后基本保持每月一期。不过到1942年2月15日出版《会声月报》第二卷第十二期后，直到7个月后的1942年9月10日才出版第三卷第一期，第三卷第二期也推迟到1942年11月10日才出版，而第三卷第三、四两期合刊到5个月后的1943年4月14日才面世，第五、六两期分别于1943年8月15日和1943年12月15日出版，都各自间隔了4个月。实际上《会声月报》已经不是月刊了，甚至已经不是季刊了。这可能与1942年中开始缩编有关，4月21日该处由原有的三科九室改为六科三室，12月18日裁减员兵四分之一，1943年2月12日将现编制之六科三室改为五科二室。几个月内连续缩编，影响了业务工作，而且由于人员的减少，相应也会把刊物发行作一些调整。

除《会声月报》《血花丛书》以外书刊具体出版发行记录如下：

1939年2月5日，开始编发《政

治通告》。

1939年6月15日，编成本处《工作计划大纲》，及本处《法规汇编》第一集。

1940年3月8日，开始编发《指导通讯》。

1940年12月13日，该处编发之《指导通讯》改名为《黄埔潮音》。

1943年12月5日，开始编订《通讯工作人员手册》。

1943年12月17日，订定《会声月报各地方版刊行简则草案》。

抗日战争期间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的各种变化和工作情况，我们收集的资料大体上在1937年至1943年年底这段时间，1944年到1945年抗战胜利这段时间的资料比较少，这反映了毕业生调查处工作的重要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有关机构对其资料收集整理关注度也相对减少。但是毕业生调查处的工作直到解放战争期间，也还在继续，我们曾在《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是国共两党斗争的隐秘战场》（《黄埔》2017年第6期）一文中，对黄雍利用其毕业生调查处湖南省通讯处主任的身份，为推动湖南起义所作的重要贡献就是一个例证。尽管1944年以后，关于毕业生调查处的关注度有所下降，不过在浩瀚的资料库里总会有一些相关的记载，有待研究者去进一步挖掘和补充。■

黄埔军校军乐队拾零

□ 单补生

军乐队为军队中由西洋铜管、木管、打击乐器组成的音乐团体，以演奏进行乐曲为主，用于庆典礼仪、阅兵出巡、行军作战；世界各国至今都有这种宣扬军威、鼓舞士气、传递信息的军乐队。

军乐队大约在清末从西方传入中国。1899年，袁世凯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聘来许多德国教习，其中有一个军乐教习叫高斯达，他向袁氏建议：新军集合操练须设军乐以为节奏，应将所用长号筒换成西洋喇叭，编制号谱，同时组织一支军乐队，招收聪慧青年数十人加以奏乐训练。未几，这些计划都实现了，可谓是中国近代军乐之先声、军乐队之开端。到了1903年，袁氏奉慈禧太后懿旨，在天津开办了一个“军乐学校”，一共办了三期，每期训练80人，另有一个旗人队，约有50人。学员毕业以后，被分发到陆军第1至6各镇（师）军乐队服务。每逢新年，这6个镇的军乐队300余人，还要从各省驻地到天津集合，参加考试及演奏比赛。这种考试，接连举行了三次就停止了。至1911年，陆军几



/ 清末新军军乐队。



/ 1912年2月15日，孙中山晋谒明孝陵之军乐队。



/ 黄埔军校军乐队。

经“军乐学校”毕业生辗转教授，发展出军乐队达27支之多。

民国肇始，军乐队被视为新潮时尚的体现，流传“军无乐队不成军”之说，因此，军队及政府机关的军乐队数量骤增，可惜没有设置正式的军乐教育机构，也没有一个规范统一的编制，遇到问题无章可循。例如1924年3月18日，军政部为军乐队中士梁炳全积劳病故，向军需总局申领为数不多的恤金、埋葬费。当时因战事频发，此项支出必多，若无专款，又无规定支付手续，军需总局难资应付。为此事，中央军需总监蒋尊簋（浙江诸暨人，日本士官3期生）只得呈请孙大元帅批示。当日孙中山下令：“即

照军政部来咨，速予支发。究应如何筹拨专款，及规定支付手续之处，候酌定后，另行飭遵可也。”由此可见一斑。

黄埔军校军乐队概况

关于黄埔军校军乐队的情况，据黄埔校史及《黄埔日刊》记载，黄埔军校自建立即有军乐队，凡每期班学员生开学和毕业典礼、节日纪念及欢迎国内外来宾等活动，都有军乐队活跃的身影。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第1期学生举行开学典礼，在孙中山讲话之后，行礼秩序之三为：军乐队奏国歌唱校歌及国民革命歌。当时军乐队中尉队长叫杨维一，广东龙门人，至黄埔第4期

时晋升为少校队长；队员先后有徐伯衡（奉天铁岭人）、侯建兴（奉天沈阳人）、杨锦华（广东人）、郑兆璋（广东合浦人）、陈耀华（广东番禺人）等人。1926年11月15日，本校第5期学生在大礼堂举行开学典礼，军乐队演奏《校歌》等乐曲。11月25日晚，本校特欢迎邓演达主任由前方武汉来校大俱乐部演讲，当邓演达莅会场时，军乐齐奏，官佐职员800余人拍掌表示热烈欢迎。12月19日，本校无线电班在广州长堤行开学礼，军乐队奏乐。1927年1月4日上午，本校在大操场举行新年各界联欢大会，总计各界来宾及本校官生6000余人，军乐队演奏欢快喜庆的乐曲。1月19



/ 南京总统府军乐队。



/ 黄埔5期军乐队成员合影。

日，在本校大俱乐部举行校属各部处党部成立典礼，军乐队演奏新作《黄埔校歌》（林庆培作曲、陈祖康作词）等乐曲。2月10日，本校欢迎广东全省铁路工人300余名代表来校参观，以表示拥护孙总理农工政策之精神，并于新

俱乐部举行欢迎大会，军乐队奏乐助兴。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于1929年4月22日公布施行《国民政府参军处组织条例》：“国民政府设参军长一人”，“承国民政府主席之命指挥监督所属参军掌理

关于国民政府典礼及总务事项”，下设典礼局、总务局。“典礼局掌左列事项：一、关于国庆日其他纪念日之典礼事项；二、关于接见外使接待外宾事项；三、关于大典及其他典礼事项；四、关于阅兵出巡事项；五、关于国际典礼事项。”由此可见，在典礼局职责范围内的活动都需军乐队参加，必不可少。

1929年为总理奉安大典之年，举世瞩目，国人存眷，黄埔师生更以参与为荣，殚心竭虑，不甘后人。据《总理奉安实录》记载：

1929年5月10日，迎榑宣传列车北上，计有中央宣传部、组织部、卫戍司令部、通讯社等135人。其中有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军乐队17人及学生代表叶崇统（浙江宁海人，黄埔4期生，时任政训处少校训育员）等18人。列车途经滁州、蚌埠、徐州、兖州、泰安、济南、德州、沧州、天津等地，均作较长时间的停留，由军乐队演奏献艺，于5月21日下午6时抵达北平。24日晨8时，迎榑宣传列车委员会全体职员及军乐队、卫队分乘汽车赴西山碧云寺谒灵公祭。5月26日总理灵榑奉移之时，沿途共用军乐队12支，计有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军乐队、北平宪兵司令部军乐队、天津卫戍总司令部军乐队、河北省政府军



北伐宣传队之军乐队。

乐队等。除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军乐队随灵车离平南行外，余各军乐队即返原单位。

5月28日上午3时40分，灵车安抵蚌埠。奉安委员会主席委员、黄埔总校长蒋中正偕夫人宋美龄及黄埔生代表由南京来此恭候；车抵站时，即上车谒灵，并慰问孙夫人。5月30日11时30分，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务委员及学生等600余人公祭，主祭者教育长张治中，与祭者汤恩伯、陈良、俞遇期等。12时，为中央军校教导队筹备处及官兵400余人公祭，主祭者处长冯轶裴，与祭者白兆琮、廖士翘、王毅强等。6月1日为总理奉安之日；4时25分，军乐队号兵发启行号，灵车即开始启行；护灵团中央军校学生200余人全副武装，分列两行，随行护卫。至12时正，举国哀悼，备极隆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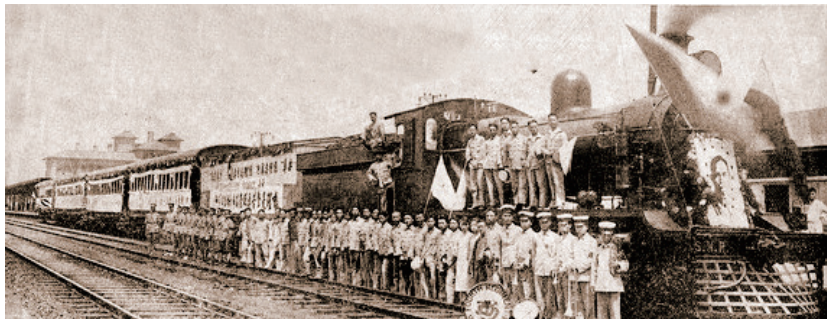
之奉安大典告成。

1930年冬，国民政府电令全国各军政机关和部队，将所属军乐队的编制名额、乐器数量一并呈报军政部汇总统计，参照南京各军政机关现行军乐队编制，起草全军规范统一的军乐队编制，拟定军乐整理及配属办法。

1933年9月14日，军事委员会为“87师各团军乐队”是否裁减一案，校长蒋介石批示：“不必裁减，又军乐重要，急应设校专教，现无经费，可附设于军校，聘请奥国专家教授，其名额请计，将来各师与各处分配之。”1934年南京中央军校附设军乐训练班，后因经费困难，暂从缓办。1935年8月，军政部设立军乐研究会，借鉴德、奥二国军乐队技术优良、配备完善之现

况，拟订了军乐队三种编制方案，整理号谱和典礼乐谱。经整理全国军乐队趋于规范统一，迎来军乐工作的新阶段。此时，南京计有7支军乐队：甲种1支即国民政府军乐队（97人）；乙种3支即军政部（42人）、海军部（115人）、航空委员会（30人）军乐队；丙种4支即首都警察厅（25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70人）、洛阳分校（24人）、炮兵学校（26人）军乐队。其他各校均缓设军乐队。当时德国陆军有军乐队300余支，其编制：（1）柏林希特勒仪仗旗队军乐队，乐长1人，队员70人。是最大的军乐队。（2）空军军乐队，分为三种：一等乐队，乐长1人，队员54人；二等乐队，乐长1人，队员40人；三等乐队，乐长1人，队员30人。（3）陆军（包括各兵种部队）军乐队，分为两种：一等乐队，乐长1人，队员37人；二等乐队，乐长1人，队员27人。每团有1支一等乐队，每营有1支二等乐队。

1936年10月，军政部又开办军乐训练班，设学生、乐官、号官三个队，培植军乐号官干部人材。1937年7月抗战爆发，该班暂告结束。抗战以后，各军乐队转移后方，由于长途行军的缘故，大部分乐器受到损伤。后来乐器禁止进口，因此补充起来极为困难，结果一般军乐队使用的乐器都很破旧。又因为战时生活费用



/ 总理迎榘宣传列车之中央军校军乐队。



/ 中央军校洛阳分校军乐队。

增高，乐兵多有潜逃而改行谋生，以致造成军乐队缺乏人才和纪律松弛的现象。

九分校军乐队

中央军校九分校军乐队前身是新疆陆军军官学校军乐队，其历史可追溯到新疆武备学堂军乐队。清末，维新运动波及新疆，时新疆巡抚饶应祺主政，在伊犁将军长庚的倡导下，大兴实业，设置学府。文有惠远两等学堂，武有伊犁武备学堂；一文一武，教育开道，伊犁地区显得生机勃勃。武备学堂聘有日籍教官原尚志主持教务，此人训练严

格，执纪严明，为整军容军威，特成立一支军乐队。由天津聘来军乐教习任教，又从国外购进整套铜管乐器，在锡伯营中挑选20岁上下的青年任军乐队员。这批勤学上进的锡伯族青年，日夜演练，进步神速。不久即能识谱吹奏，一时号音鼓声响彻武备学堂操练场内外。1909年中俄边境两国部队举行联欢，武备学堂军乐队首次公开在外宾面前演奏。队员身着饰以金丝银线绣成的带穗肩章，红黄相间的绶带，头戴盔形白缨签冠，尤显华丽堂皇，个个精神抖擞。演奏中外队列乐曲及古曲乐章宛转悠扬，令人感心

动耳。俄军将士不时鼓掌，领队军官盛赞新疆这支军乐队能与俄军乐队相伯仲。新疆第一支军乐队首任队长景寿，是锡伯族中极有声望的拔萃人物，具有音乐才华。他不仅在声乐的理论和奏乐技巧上造诣甚深，同时又是名作曲家，他博览中外音乐史籍，汲取祖国优秀的音乐遗产，创作出不少乐曲，但由于当时新疆处在封闭状态，缺乏知音，他的作品未能留存下来，唯有《伊犁河的波涛》一曲，至今仍可隐约回味。1911年武备学堂停办。民国建立以后，这支军乐队在新疆巡按使杨增新、新疆省主席金树仁、新疆督办兼省主席主政时期倍受青睐，先后易名新疆讲武堂、新疆陆军军官学校军乐队。

1943年3月27日，国民政府军委会电令，将新疆陆军军官学校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九分校（主任先后为盛世才、宋希濂），因而军乐队再易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九分校军乐队。此时九分校军乐队乐器齐全，吹奏乐器、打击乐器等应有尽有，特别是锃光瓦亮、大口朝天的“苏萨大号”引人注目，令人惊奇赞叹。总之，乐器种类胜过中央军校本校（成都）及各分校军乐队，而且这支30余人的军乐队娴熟乐理，勤学苦练，素质颇高，在学校多项活动中尽展风采，并在社会上产生了重要

的影响。1944年8月2日，成都本校400余名20期入伍生抵达迪化（乌鲁木齐）北校场，军乐队欢迎同学入校时，吹着大小号，打着多种乐器，奏着《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及苏联《骑兵进行曲》《卡秋莎》等乐曲，音乐十分悦耳动听，给同学们留下了美好印象。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天新疆省迪化市各界及驻军举行庆祝抗战胜利大游行，军乐队员穿着绿色苏联人字呢军装，牛皮马靴，在游行队伍前面开路，并演奏着抗战流行乐曲，九分校全体师生（学生全副武装）雄赳赳气昂昂步后。当数千人游行队伍走到南关时，军乐队又演奏宏亮的《大刀进行曲》《开路先锋》《打回老家去》和《白山黑水》等乐曲。一路上游行队伍的欢呼声、歌声、枪声（九分校规定学生每人5发子弹，向天鸣枪，以示庆祝），此起彼伏，响彻云霄。这是迪化市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游行，盛况空前，军乐队功不可没。1946年7月1日，新疆三区民族军与国民政府代表和平谈判达成协议，并在迪化市三角地召开庆祝和平大会。大会由西北行辕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张治中主持，并作了简短讲话，大意是：“和平得来不易，我们要遵守和平协议，各族人民要团结，在省联合政府领导下，共同建设新新疆！”会上，第九

分校全体师生高呼拥护协议，军乐队则演奏了《游击队之歌》《渔光曲》《满江红》等乐曲，深受与会者赞许。九分校军乐队名扬天山，缘于有个好队长。这位队长的名字叫满富，锡伯族人，聪明好学，会使用多种乐器演奏出美妙动听的乐曲。他思想进步，待人真诚，对部下耐心施教。1947年8月，中央军校第九分校建制撤销，改组为陆军军官学校第五军官训练班。自此他只身前往伊宁，投奔三区民族军，并在军部担任军乐队长。

陆军军乐学校始末

陆军军乐学校前身为军政部军乐训练班。抗战时期，中央训练团于1939年9月在重庆复兴关（浮图关）成立音乐干部训练班，简称“音干班”。主任白兆琼（保定2期，河北大兴人），副主任华文宪（浙江临海人，上海音乐专科毕业），音乐教官有夏之秋、胡然、贺绿汀等。第1期学员有百余人，多数为音乐专科和各大学的学生，余为各战区文工团选拔人员。音干班实行军事化管理，除上声乐和器乐课外，全班教官和学员还必须参加重庆各处所举办的音乐演奏会。1940年10月，军政部委托中央训练团音干班添招了50名军乐学生，年龄自15岁至18岁，他们都是从各处学校考选而来的。经过10个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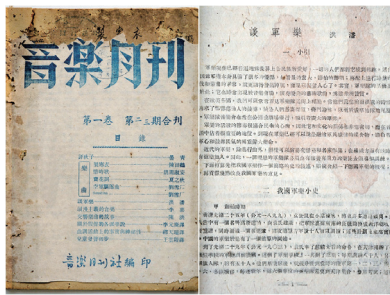
陆军军乐团演奏会广告。

初级训练及严格淘汰，留下来的学生继续训练。1941年6月，军政部6年前公派留学生洪潘（1909—2004，福建南安人）从维也纳音乐学院学成回国，抵达重庆向军政部报到的第三天，蒋介石即在复兴关中央训练团召见他，当时在座的还有中训团教育长王东原、中训团副团长张治中。蒋介石面询洪潘的留学情况，以及德奥军队里军乐的设置等问题。听了洪潘的扼要介绍后，蒋介石很兴奋，随即命他着手整顿军乐、典礼乐，并要求拟出规划。洪

潘还建议筹办一所军乐学校，作为培训军乐人才的基地，并希望能提高军乐演奏者的待遇等。蒋介石当即表示同意，随手书写一笺，让洪潘转交教育部和内政部，成立礼乐馆。同年10月，音干班设军乐组，洪潘任组长。第1期共有新旧学员50名，每期分成3个阶段教授，每阶段10个月。

1942年1月，中央训练团音乐训练班撤销，军乐组移交军政部改为军乐训练班，洪潘任主任。同年10月，训练班奉准改称陆军军乐学校，隶属军政部。此乃我国唯一之军中音乐教育机构，校长蒋中正，教育长洪潘（一等正同上校，后晋升为少将），教官有夏之秋等30余人。内分器乐、声乐两科，均系招考普通高初中学生，施以3年之养成教育，以备充任各军乐队队官或教官，及军事机关学校部队声乐教官。又由于国内各军乐队官佐与部队之司号官多未受正式教育，特设乐官班与号官班加以调训，训练期自3个月至1年，授以补充音乐教育。由此本校为培养军乐人才，提升演奏水平，推动军乐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3年初，遵照军政部命令，洪潘又负责组建了一支120人编制的陆军军乐团，洪潘任团长兼指挥，基本成员由原军乐组管乐人员组成，另从其他军乐队抽调人员充实，待遇同少尉至上校



/ 1942年，《音乐月刊》发表洪潘《谈军乐》。

不等。洪潘指导全团采用德国学派的吹奏方法，音响效果有了显著的提高，经过几个月的严格排练，具备了公演条件。同年5月31日，重庆《中央日报》登载演奏广告云：“陆军军乐团第一次演奏会，指挥洪潘；节目有施特劳斯、贝多芬……等作品；时间：6月2日下午7时半；地点：黄家垭口抗建堂；票价：二百元、一百元、五十元。”此次首演，洪潘指挥乐队演奏了施特劳斯、贝多芬、莫扎特等作曲家的作品。这是一种音乐会形式的军乐演奏，已经不是一般军乐队承担典礼演奏的概念。当何应钦等军政要员及重庆市民，第一次看到军乐从单纯的典礼乐事移植至剧场，成为舞台上一种全新的音乐表演艺术形式时，大为赞赏。美国驻华军事顾问看过演奏后，也为中国有这样一支军乐团而感到吃惊，并经常邀请该团演出。蒋介石招待外国来宾时亦常令军乐团演奏，以彰显国威，且云：“古

时教育节目中乐与舞相合，主旨在整齐节奏，陶冶情操，发舒心意，而尤其是军乐，军队完全藉以振作精神，激扬志趣，于和谐奋发之中，培成尚武一致的勇气和团结进取的朝气。”从首次公演到1947年春，陆军军乐团在重庆举行了数以百计的演奏会，节目有：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施特劳斯的《蓝色的多瑙河》等一系列耳熟能详的曲目，展现了军乐艺术无可替代的独特美感，极大丰富了民众的音乐生活，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陆军军乐学校自中训团音干班招收军乐组学生训练之日起，至1947年已届6年，计毕业器乐科学生4期，声乐科学生2期，及调训乐官号长各1期；毕业学员生200余人，均能各就岗位，尽力服务。此时，军乐团被改编为军乐教导队，并入军乐学校。1948年，该校由重庆迁移上海，1949年又迁往台湾。洪潘则毅然放弃高官厚禄，加入人民的行列，为新中国的军乐事业，鞠躬尽瘁，奉献余生。

洪潘克尽厥职之余，还潜心研究军乐理论，在1942年重庆的《音乐月刊》杂志上发表了《谈军乐》一文。据中外音乐学者研究考证，一致认为《谈军乐》是中国军乐理论研究的起始点，可谓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1926年4月6日， 马伯援到黄埔军校参观

□ 贾晓明

1926年4月6日，马伯援作为冯玉祥的代表到黄埔军校参观，并和蒋介石探讨了北伐、广州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合作等事宜。马伯援是老同盟会会员，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革命，是清末民国时期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者和直接参与者，由于他没有担任过党政军要职，以致其大部分事迹尚鲜为人知。今特选择马伯援从政生涯中的几个重要片段加以整理，呈现给读者。

湖北省的“首席代表”

马伯援(1884—1939)，又名发祥，字吉楷，湖北省枣阳市鹿头镇人。1905年到武昌考入新军左旗学习军事，不久留学日本，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师范科(与居正同宿舍)，并加入同盟会，积极从事反清革命活动。1910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师范科。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马伯援回国参加革命。不久，清政府起用袁世凯对武汉三镇大举进攻。马伯援受同

盟会派遣，护送黄兴赴武汉就任革命军战时总司令。黄兴、马伯援一行于10月25日在上海红十字队队长张竹君女士(上海南市医院院长)的掩护下，化装成医生，躲过清政府的搜查，随120余人的赴鄂医疗队，从上海乘江轮于10月28日到达汉口，受到黎元洪等的热烈欢迎。

马伯援到达武汉后，就任都督府军事参谋、顾问，并立即随黄兴投身到战事中，和张敦民等人率领学生军，在前线与敌血战，为保卫革命胜利做出了贡献。

12月14日，各省代表聚集南京开会，决定根据《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选举总统，马伯援作为湖北省代表也来到南京。这时，代表们“接到沪电，称孙中山将到沪，请派代表欢迎”。马伯援等三人被推举为欢迎使者前往上海迎接孙中山。由于孙中山有较高的威望，受到许多革命团体的支持，成为众望所归的总统人选。12月28日，在南京召开临时大总统选举预备会。29日，各省代表在南京

召开选举临时大总统会。临时大总统根据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第一条“临时大总统，由各省都督代表选举之；以得票满总数三分之二以上者为当选。代表投票权，每省以一票为限”选出。参加选举的有17省代表(直隶省尚未完成独立，但因系国都所在，而特设代表，享有投票权)，当时在南京的湖北代表有马伯援、杨时杰、王正廷、胡瑛、居正。按规定，虽然各省代表团名额不一，但每省一票，因此马伯援作为湖北的首席代表进行了投票。结果，孙中山以16票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上午10时，孙中山乘坐专车前往南京临时大总统府。马伯援也随同前往，参加了总统就职典礼。南京临时政府内阁组成后，马伯援任孙中山大总统秘书、内务部会计主任兼马警总队队长。白天，他精打细算，处理财物收支问题，并帮助内务部查处贪污浪费现象；晚上，他忠于职守，每夜亲自率领马队巡逻街道，

确保南京城内的治安。

争取冯、胡完全转向国民革命阵营

1918年10月，马伯援受当地革命党人委托，前往上海向孙中山报告情况。不久，马伯援得到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余日章聘请，12月16日再赴日本东京，主持“中华留日基督教学生青年会”工作。

1922年初，为联合北方进步势力，发动反直系军阀的斗争，马伯援被孙中山召回国，到西北做冯玉祥、胡景翼的工作。孙中山早在1918年护法军政府时期，就开始了和冯玉祥的交往，并派徐谦等人前往冯部联络。冯玉祥表示：“真正救中国者只（孙中山）先生一人……私衷仰慕，亦非一日，今欲追随。”而胡景翼是老同盟会会员，武昌起义时在陕西举兵响应；民国成立后赴日本，进入孙中山举办的浩然庐学社学习，并向孙中山表示：“来日我一定要打进北京城，请先生主持大计。”深得孙中山的嘉许。因此，孙中山将冯玉祥、胡景翼视为“北方革命”可倚重者。冯玉祥是基督徒，“因宗教因素结识”了马伯援。当年3月，马伯援前往西安，秘密会晤时任陕西督军的冯玉祥，“谈冯、胡合作，实行北方革命计划”，不久即被冯聘

请为名誉顾问。马伯援遂用顾问身份，自由往来于冯玉祥各部间，向方振武、孙连仲等军政要人宣传革命思想。4月，马伯援又赴陕西三原，会见了靖国军总指挥胡景翼，并应邀到富平、耀县等地演说，揭露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介绍孙中山的主张。胡景翼向马伯援表达了对孙中山的忠心，并交给马伯援密电本一册，以备随时联系。

1923年1月，马伯援到上海向孙中山汇报陕西之行的成果。孙中山听后对他说：“胡景翼既是浩然楼的同志，请你报告他，我们彼此心印。”并指示对冯玉祥要“须当更进一步劝其革命”。马伯援离开上海后，即奉命到北京继续做冯玉祥的工作。冯玉祥表示，愿“借此机会，与国民党人往来，以为他日工作之预备”。马伯援遂介绍了十多位国民党上层人士与之见面，双方进一步加深了了解。

10月25日，马伯援返回广州，向孙中山汇报情况，并说：“冯、胡必合作革命，请先生北上。”孙中山听后颇为嘉许，向马伯援表示：“我实在希望你的计划实现。”于是孙中山让马伯援与徐谦进一步加强冯玉祥、胡景翼部和广州革命政权的联络，争取冯、胡等人完全转向国民革命，加速北洋军阀统治

阶级内部的分化瓦解。12月，马伯援再度赴北京访问冯玉祥，“告以孙中山对其的殷切期望以及孙中山北上之决心”，冯玉祥则表示：“政府的兵力，数倍吾人，冒险盲动，终必失败，稍待则济，不必急急。我终要革命的，请转语中山先生及季龙（徐谦字季龙）。”在此期间，马伯援还积极奔走，为苏联驻中国大使加拉罕与冯玉祥的会面进行了预先铺垫。

1924年10月，冯玉祥、胡景翼等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军阀控制的北洋政府。11月4日，马伯援等国民党要人会于天津，与胡景翼就当前形势进行了交谈。当天夜间，马伯援等又赶赴北京会晤冯玉祥，连日商讨。7日，冯玉祥决定以马伯援为代表专程南下赴粤，“请中山先生即日北上，指导一切”。8日，马伯援携带冯玉祥给孙中山的亲笔函离北京南下，前往广州。

孙中山对冯玉祥的邀请电及时回复，并对其进步举措予以赞扬和勉励。不久，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并于11月13日离粤北上。不幸的是，孙中山12月4日抵津后，随即身体不适。12月31日，孙中山扶病到京，已是病势沉重，终于3月12日与世长辞。

和蒋介石讨论北伐

1925年至1926年间，北方的军阀混战越演越烈，其军政局面变化之快让人眼花缭乱。1925年底，直系军阀吴佩孚和奉系军阀张作霖“重归于好”，共组“反赤联盟”，意图在打败冯玉祥的国民军后，再南下进攻广州，扑灭革命力量。冯玉祥宣布下野赴苏联考察，沿途广州国民政府和苏联有关人士陆续赶来会晤，商讨国民军和广州国民政府合作事宜。随后，冯玉祥派马伯援前往广州，商谈合作的具体办法。马伯援于1926年3月30日到达广州，与广州国民政府军政要员多方洽谈，表示国民军愿与国民党合作，希望集中革命力量，向长江发展。此事鼓舞了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将领的士气。

当时正值中山舰事件之后，国民政府在蒋介石的全力推动下正在筹备北伐。而蒋介石已经认识到冯玉祥的国民军在北方的斗争对于广州国民政府和北伐的重大意义。经讨论，以国民政府委员会的名义复函冯玉祥，期许会师中原，共定国难，完成国民革命。马伯援在广州期间，于4月6日前往黄埔军校，拜会蒋介石。在会面中，马伯援向蒋介石介绍了冯玉祥及其军队，并谈及“军队的组织信仰和教育问题”，这是蒋介石第

一次和冯玉祥方面的代表正式接触。蒋介石认同马伯援的观点，指出：“如能在3个月内北伐准备完毕，则北方之国民军不至消灭。而吴佩孚之势力，亦不十分充足之际，一举而占武汉，则革命前途尚有可为也。”

5月3日的广州政治委员会，陈友仁报告北京政治状况及国民军失败原因，顾孟余报告在库伦会晤冯玉祥的结果及双方军事合作问题。委员会决定由胡汉民、蒋介石、顾孟余、陈友仁和鲍罗廷拟定具体合作办法。4月16日，政治委员会与军事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由蒋介石、朱培德、李济深三人筹拟北伐准备计划，由宋子文筹办军饷。同月20日，赴湘联络唐生智的陈铭枢、白崇禧回粤，向军事委员会报告，联络成功：“将来实行协同出师北伐，当受事半功倍之效。”这使原来对北伐持谨慎态度的将领也乐观起来。在李济深、陈铭枢、李宗仁等人的一再催请下，军事委员会于5月29日会议决定，命第7军立即出发援湘，北伐大计遂决。蒋介石于6月3日致电冯玉祥，邀他赴广州共商北伐大计。

一心为家乡兴实业、办教育

1912年2月15日，南京参议院正式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

统。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积极宣传民生主义，号召实行平均地权，提倡兴办实业，还亲自担任了全国铁路督办。马伯援也去职。1912年9月28日，孙中山视察山东时，专列车行至高密，与当地同盟会代表、高密县农会会长侯芝庭谈话之间，侯芝庭恳请孙中山作些指示。孙中山颇有感触地讲了句：“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此后，这句名言广为流传，成了许多有志之士的座右铭。

马伯援也把孙中山的这句话牢记在心，立志为国为民做一些实事。1913年2月，孙中山动身赴日本考察工厂、铁路、学校等建设运营情况，马伯援随孙中山前往。

1913年8月，马伯援赴美国继续深造。1915年返回家乡后，马伯援牢记孙中山“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的教导，决心以“兴实业、办教育”改变家乡的贫穷面貌。10月，他在家乡开始筹办求实小学和蚕桑公司，植桑养蚕。他拿出家中积蓄，同时向亲朋好友以及当地热心教育者募捐，购买土地，添置教室及教学物品，并购置桑树苗6000株，用作蚕桑公司基地和学生实习场所。1916年2月26日，求实小学于鹿头镇山西馆开学，马伯援任学校董事长兼校长。开学后，他为学校

提出“使人人能谋自立生活”的办学宗旨，不仅亲自教授学生日语、英语和经济等科，还动员夫人当义务教员，又聘请专业人士担任蚕桑专业教员兼管蚕桑公司业务。由于袁世凯复辟帝制，一时间封建守旧势力甚嚣尘上，学校和公司被迫停办，马伯援的实业救国之路暂时受到挫折。

1932年9月，马伯援再次回乡，任枣阳县县长。其间，他“大力改革弊政，凡群众检举告发盗、匪、淫烟、赌、霸绅等案件，及时查办，概不容情”。“兴实业，办教育”仍是施政的重中之重。他在鹿头镇办起合作社，经营生活、生产必需品，抵制奸商垄断市场。将鹿头小学改名为“实业小学”，还倡议枣阳各界捐资兴办初级中学一所，并动员家人捐资兴建15间砖木结构房屋作为校舍。中学招收两个班，实行中、小学合校，聘用外籍教师，讲授理化、农艺、卫生等实用课程，并在学校附近办了织布厂、肥皂厂、农场，以供学生实习。不久，马伯援因严格执法，遭地方旧势力排挤，被迫离职，中学随之停办。

1937年，马伯援第三次从国外返乡，“兴实业、办教育”。他筹集资金办起一所“实用初级农科职业中学”，还购置200

亩土地，修建中学的合作农场，由于抗战全面爆发，马伯援只得放弃。


马伯援三次回乡“兴事业，办教育”，但由于世事动荡及旧势力的阻挠，其造福一方的理想没能实现。

抗战期间，两次出马化解敌人的诱和

抗战爆发后，他于1938年携眷到成都，后旅居香港。随着南京沦陷，日本在军事上暂时取得主动，武汉会战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随着中国军队正面战场的抵抗和敌后战场的开辟，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彻底破产，日本统治集团苦于兵力、资源捉襟见肘，采取对国民政府实行以政治诱降、诱和为主的方针，企图“兵不血刃”地炮制傀儡政权，实现其吞并中国的妄想。汪精卫等少数民族败类，响应日本的政治诱降，叛国投敌，而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广大政要一面坚持抗战，一面将“谈判”作为一种策略，安排妥切的人员与日方接触，在坚守原则的情况下，“虚与委蛇，以懈敌心，而探其计谋及欲望深浅，藉便做从容大举反攻之布置”。

自抗战全面爆发后，日本即对蒋介石集团多次图谋诱降、诱和，但都以失败告终。1938

年7月，萱野长知到香港活动，希望通过孔祥熙谋求“和平”。国民政府派出民间人士贾存德和马伯援在香港东京饭店会谈，谈了两个多月，结果只决定“由孔祥熙和板垣约定地点与日期正式会谈”，此后日方只得放弃了这条谈判“途径”。

1939年3月24日，曾任田中内阁铁道大臣的小川平吉到香港，通过关系致信蒋介石，要他表明“对和平之态度”。4月10日，小川再次致函蒋介石，说自己“为东亚前途以及中日两国百年大计而来”。当时，正值戴笠来香港指挥刺杀汪精卫期间，他随即向军统局在港人员指示，说当前的任务是“必须以热衷和平姿态为饵，以遂行吾人之谋略，首要之图，为阻滞汪伪组织，不使于短期内成立”。戴笠还向蒋介石建议说，对于这次“谈判”，还是应该派一名绝对可靠、与小川认识且“在现政治上不甚重要”的人前往，借机刺探日本的真实意图。蒋介石表示同意，于是告诉小川：已经指派“日本通”“在港友人马伯援”代替自己谈判，还委托马伯援转达他对小川的“致意”。于是马伯援再次欣然接受任务，与小川“谈判”。遗憾的是，“谈判”开始后，马伯援在4月14日因突发脑出血而逝世。

你不知道的台湾： 两岸应知道的台湾历史故事（一）

□ 熊子杰

熊子杰，出生于台湾，成长于台湾，父亲来自湖南岳阳。台湾大学管理学院商学研究所硕士毕业，在台湾科技业服务多年。1990年即到福建考察及投资，见证了大陆经济崛起、壮大的整个进程，多年来致力于推动两岸民间交流。

2010年8月8日，在台湾成立第一个两岸商会——台湾湖南商会，为创始会长；2015年6月4日，成为第一个受邀到湖南省省委党校授课的台湾人，讲述两岸血脉相连的历史；2016年5月，在台湾主办两岸纪念台湾抗法战争胜利活动暨第一届湘军保卫台湾研讨会，受到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肯定并作为全球湘商代表得到亲自接见。

前言

因2008年参加湖南湘潭湘商大会的机缘，2010年得以在台成立台湾湖南商会，笔者有幸接触到许多湘贤及老乡，因此获得许多珍贵的湘军保卫台湾的史料，才惊讶地了解到在台湾的每

一寸土地都可能流着湘军先贤的血与泪；台湾每一宫一庙、一草一木都蕴藏湘军的英勇事迹，当然也有许许多多为台牺牲的淮军、粤军、台勇……感人故事，而“湘军”不仅属于湖南，她更属于全中华民族。

陈水扁执政的八年，两岸看似渐行渐远。然而，峰回路转，马英九执政后八年却是海峡两岸关系最辉煌的一页；2016年，在蔡英文执政后，两岸关系波涛汹涌，如坠崖似地陷入寒冬，两岸同胞莫不忧心未来两岸关系将进入更严峻的“冰河期”。两岸看似背道而驰，但从历史长河的轨迹来看，其实不然，两岸必将殊途同归，就如同一架驶向和平乐土的飞机，无论航程中如何颠簸，机长终将带领乘客安全抵达和平的目的地，而任何罔顾民意、扭曲历史的行径终将被两岸人民所唾弃，也无法改变自古两岸就是一家人的历史事实。

事实上，台湾人本来就是中国人，因为台湾人自幼学的是中华文化，读的、说的、听的、写的、想的、用的、吃的、住的通通都是中华文化，生活里也全是

中华文化，我们信仰的儒道思想的妈祖、关公……过的年、元宵节、清明、端午、中秋……哪一个不是中华文化！从古至今，台湾人从来没离开过中华文化；台湾人也深深地生活在中华文化里，只是有些台湾人被误导下自己不知道而已。

笔者希望透过这本书让大陆人知道不用担心台湾，要对台湾人有信心，不要怕少数政客倒行逆施的“去中国化”行径，那只是螳臂当车的痴人妄想，其实台湾“很中国”的，只是你要去多欣赏、多理解、多看看、多走走；同样的，台湾政客也不用妄想搞什么“去中国化”，因为我们台湾人身上流着的就是中华民族的血液，我们遗传着的也是中华民族的基因！

两岸人民在文化上没有分歧，分歧的是生活环境及制度；会分歧是因为我们以前不重视文化交流，不去了解彼此的文化及生活背景，也不给对方时间及机会去了解。以前隔绝两岸人民的是台湾海峡，如今在直航下早已不再是障碍，但两岸人民的心却未融合，因为在两岸人民心中还

有一道墙，一道无形的墙，是我们自己筑起的一道心墙。因此只要我们两岸人民能用信心、耐心去了解这块土地——台湾；用亲情、感情去对待彼此，相信我们必能推倒这道无形的墙。

第一章

台湾少数民族六千多年前来自中国大陆

台湾少数民族9200年前居住在中国沿海地区，6000多年前辗转顺洋流航行到台湾北部后，再分成10支扩散到全台湾岛，4000多年前再以优越的航海技术渡海到东南亚、中南半岛、大洋洲、太平洋等岛屿地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陈仲玉教授，“亮岛1号”记者会，2012）。根据台湾“中央研究院”凌纯声院士及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陈仲玉教授的研究，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缅甸等国的原住民都是源自中国大陆东南地区，连澳大利亚的毛利人也是。

何谓台湾人？台湾少数民族？南岛语族人？

根据陈仲玉教授的发现，南岛语族人就是台湾少数民族的祖先，是从大陆东南沿海迁移到福建马祖附近，再从马祖附近顺洋而下渡海到台湾，再转往东南亚、澳洲、大洋洲、太平洋等地



凌纯声院士（前排左一）到台湾少数民族部落进行田野调查。

区，南岛语族的迁徙路线，证实台湾少数民族源自中国大陆。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科学的证据不容许有任何的扭曲，从人类学、遗传学、生物学、考古学等学术研究来分析，国际上都客观地支持台湾少数民族来自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地区，已是毋庸置疑的。2011至2012年，陈仲玉及台湾清华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助理教授丘鸿霖共同在马祖亮岛发现石器、陶片、骨器、贝冢群、动物骨骸及人类遗骸群，其中“亮岛人1号”及“亮岛人2号”（或统称“亮岛人”）两具人类骨骸，经国际最权威的基因（DNA）研究中心的鉴定及解序确认，与台湾少数民族、大陆东南地区一些少数民族有血缘关系，简而言之就是同属一族群。

其实陈、丘两位的考古发现



“亮岛人1号”出土图。（资料来源：陈仲玉教授）



右为“亮岛人1号”，左为“亮岛人2号”。（资料来源：陈仲玉教授）

除证明台湾少数民族与马祖“亮岛人”的血缘关系，以及台湾少数民族是从大陆东南地区迁移来台湾的事实外，还对台湾族群的起源及全球南岛语族的发源及历史有重大意义；更重要的是对

两岸而言，可以消除一些各说各话的台湾起源争论，否定了“台湾少数民族是源自东南亚”的论点，也证实及呼应了凌纯声院士在1950年的论点（参见凌纯声《东南亚古文化研究发现》，《新生报民族学研究专刊》第四期，1950）——从语言、风俗习惯、生活形态等多重文化角度来看，台湾与大陆东南地区的人民自古以来就是同源同种——也间接确认凌博士所论述的台湾文化渊源可追溯到三国时期《临海水土志》一书（《临海水土志》，约公元264年，吴人沈莹所著）中所记载当时夷州人的风俗文化特质，它们应是承袭于这些马祖“亮岛人”的血统及文化。所以，从远古时期的“亮岛人”，到《临海水土志》的夷州人（台湾少数民族）、中国大陆少数民族等都是源自中国大陆南岛语族的血统及文化，两岸民族一脉相承，同源同种。此发现具有科学的根据，非任何人可以任意删除或否定的。

由于“亮岛人”的发现在台湾属于极度敏感的议题，为避免不必要的争端，更确保“亮岛人”

基因解密工作及成果不遭到误解或扭曲，并得到国际语言学、考古学等学术界的重视，台湾“中国医药大学”副校长葛应钦教授的妻子将葛教授荣获的徐有庠科技讲座奖的奖金20000美元全数捐出来赞助陈仲玉教授，将“亮岛人”的检体送到国际最权威单位——德国莱比锡“马克斯·布朗克人类演化研究所”（简称“马布研究所”）进行基因的排序比对分析。陈仲玉教授表示，经基因解序后发现，“亮岛人1号”（又称“海亮哥”）为男性，距今约9280年，基因上接近部分台湾少数民族及东南亚的南岛语族人，也就是说“亮岛人1号”是台湾少数民族及某些东南亚岛屿族群的祖先，彼此间都存有共同的遗传血缘关系；“亮岛人2号”（又称“亮岛妹”），距今有7500多年，被认为是部分中南半岛原住民的祖先。（附录1）

陈仲玉认为，“亮岛人”的发现确实推翻了“南岛语民族从东南亚岛屿起源说”的论点，因为台湾少数民族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此点与台湾人类学专家陈叔倬博士所述一致，台湾不可能是

南岛语族人所谓的“原乡”。而基因分析结果也证实“亮岛人”是比较接近中国西南方一带的壮族及越南的原住民（陈仲玉证实“亮岛人”是南岛语族祖先，推论“亮岛人1号”可能来自中国大陆东南沿海一带，“亮岛人2号”比较接近中国西南方一带壮族以及中南半岛、越南的原住民）。

陈仲玉教授更指出“亮岛人1号”来自中国大陆东南地区，而“亮岛人2号”来自中国大陆西南地区。

试想中国远古时期，一群从中国大陆东南往南的人，在福建临海区域碰到一群从大陆西南往东的人，两群人遭遇，看不对眼就歼灭对方，看对眼就结合，生活在一起。无论当时是否有激战，“亮岛人”的古文明证明，两个不同地方的族群已经融合并生活在一起了，可能是被打败俘虏的或友善结合成为亲家的，这都已不重要。陈仲玉教授认为，当这两群人相遇及开始共同生活时，他们文化及语言都不同，但他们需要沟通，于是就创造了自己的语言，即如今“南岛语”的前身；生活在一起就产生了新的文化，

附录 1. 为探究马祖亮岛遗址出土的“亮岛人”人种学，荣获徐有庠科技讲座奖的葛应钦教授由妻子捐出该奖金两万美金，偕“中研院”亮岛考古学者陈仲玉教授亲自携带骨骼前往德国国家马普研究院萃取DNA分析，萃取完整线粒体成功，经解序归

为E单倍群，E之根谱系，经新突变率计算，距今9280年（8152—11137）。E单倍群主要分布在台湾少数民族、菲律宾、印尼、关岛、马达加斯加及近大洋洲等南岛民族地区，目前在中国大陆皆未见，也未见于傣、苗或南亚等民族。

就是所谓的“南岛语族文化”，这与汉族的文化、生活方式是不一样的。当中原人来时，有些选择留在中国大陆的南岛语族人，大多可能被其同化；而不愿被同化者，选择迁移到外地或海外，“南岛语族文化”因此向外扩散传播。有些南岛语族人乘舟渡海到台湾及周边岛屿，成了今日台湾地区的少数民族；再转到东南亚岛屿，变成今日马来人及菲律宾人；有些则到了中南半岛；之后他们再向东转往大洋洲、太平洋岛屿；有些向西到了非洲，最远的到达今日的复活节岛（陈仲玉，“亮岛1号”记者会，2012）。

陈仲玉教授研究团队为更巩固其学术发现及研究的可信度，在台湾马祖进行血液抽样筛检，在50名马祖居民的血液中，就发现有6人与“亮岛人”的基因符合，这又一次从医学上证实部分马祖居民实为“亮岛人”的后代，也再次证实当时“亮岛人”后来确实又迁徙到马祖群岛（《发现亮岛人，南岛语族起源前推》，“中央社”，马祖，2014年9月29日）。

2014年，葛应钦教授将台湾这项重大人类学、遗传学的研究成果以研究论文方式发表，荣登2014年3月的国际知名学术期刊《美国人类遗传学杂志》（The 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此篇论文名为《早期的南岛民族：进入和移出台湾》

（Early Austronesians：Into and Out Of Taiwan）受到国际考古学、人类语言学及人类遗传学等领域学者的高度重视，论文中提出的重要观点归纳如下：

1. 南岛语民族约于8150—11137年前（最有可能是9280年前左右）起源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包括今日的马祖群岛。

2. 推翻了认为南岛语族发源地是台湾或东南亚岛屿的观点，认为其实都是来自中国大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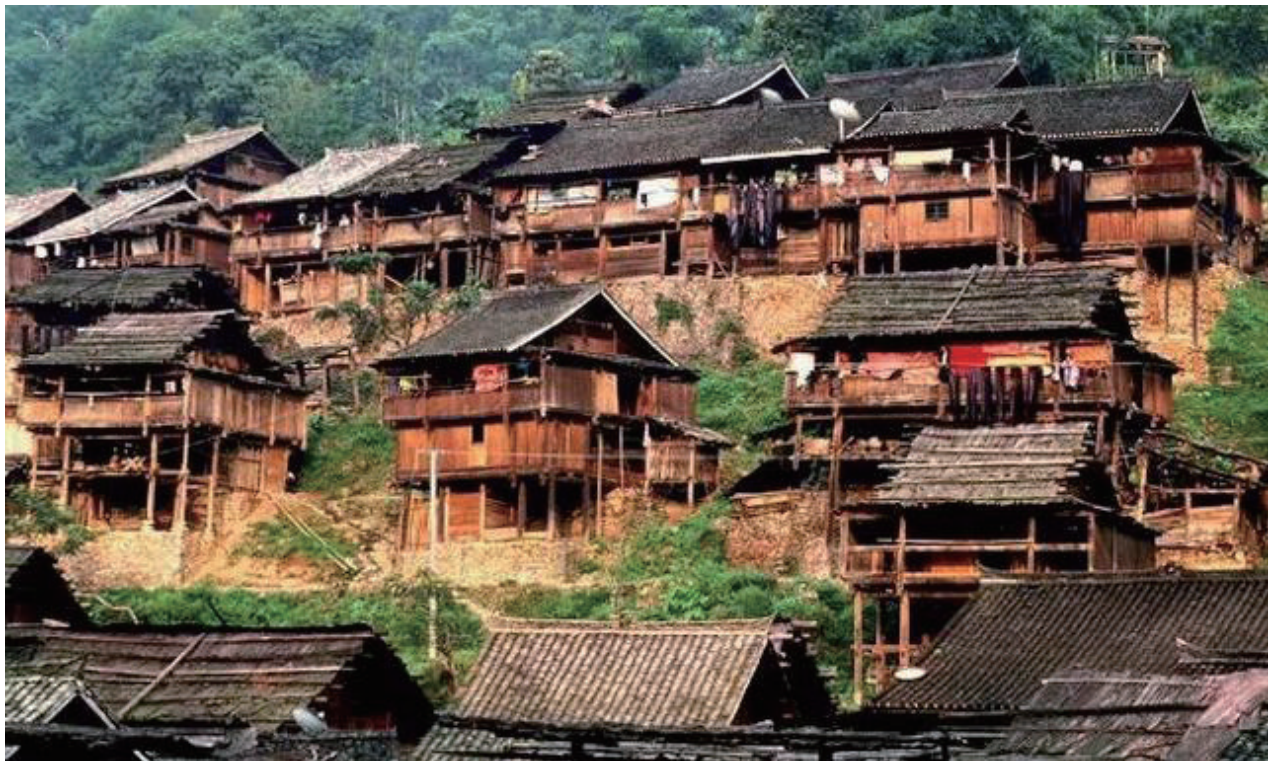
3. 证实了台湾南岛语族人源自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地区，大约在6000年前渡海迁移到台湾的北部，再从台湾北部分十支向台湾南部迁徙。

4. 约在4000年前左右，台湾南岛语族人在从台湾迁移到今日菲律宾地区后，再从菲律宾扩散至东南亚岛屿、太平洋及大西洋等岛屿。

葛应钦教授的研究发现与台湾“中研院”臧振华院士有关东南亚区域的论述不谋而合且相互呼应。早在2003年臧振华院士就指出，中国大陆东南地区南岛语族人能如此容易迁移至中南半岛、南洋群岛等区域，是因为其实当时台湾和南洋群岛在更新世结束以前，都是属于东亚大陆之一部分，后因冰河期结束，海平面上升，才逐渐成为岛屿。所以，从史前史的角度来看，包含中国华南和台湾、中南半岛、南

洋群岛在内的地区，都包含在今日所谓的“东南亚”这一范畴之内（“新世纪的考古学——文化、区位、生态的多元互动”学术研讨会，2003年10月22—24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华南、台湾与东南亚的史前文化关系：生态区位、文化互动与历史过程》，作者：臧振华，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中研院”凌纯声院士对东南亚古文明的研究发现及论述，也与陈仲玉教授“亮岛人”的研究发现相互印证，都认定台湾少数民族曾从台湾迁移至中南半岛、南洋群岛等区域。凌纯声院士更进一步提出：“台湾土著……是在古代与原来广义的苗族为同一民族，居于中国大陆长江之南，属于同系的越濮民族……越濮民族在大陆东南沿海者，古称百越；散处西南山地者称百濮。台湾土著系属百越，很早即离大陆，迁入台湾孤岛，后来与外隔绝，故能保存其固有的语言文化；其留在大陆之越濮，则与南下汉藏系文化的汉、傣、苗、瑶、藏、缅诸族混合，有的完全汉化，有的虽习用其语言，然仍保有許多古文化的特质，如文身、缺齿、拔毛、口琴、贯头衣、腰机纺织、父子连名、猎首、室内葬、崖葬等等，在西南诸族，多能找到。我们根据上面所述……至少可



/ 湖南省侗族干栏式建筑。



/ 台东少数民族干栏式建筑。

说多数的台湾土著在远古来自中国大陆……”（《东南亚古文化研究发现》，《新生报民族学研究专刊》，第四期，凌纯声，1950；另收入《主义与国策》，44期，1955）

这是凌纯声院士的研究发现，当时没有统“独”问题及争议，当然他不需要也不可能为特定政治主张服务，所以他的论述及研究发现应是非常客观及专业的。

一些西方学者专家也纷纷证实凌纯声院士的论点。1997年，澳洲考古学家贝尔伍德（Peter Bellwood）教授的研究结果也认为，中国长江下游可能是远古南岛语族的原乡，他们在五六千年前来到台湾，再从台湾辗转迁徙到东南亚地区，再朝东向太平洋、西向大西洋，扩散成今日的面貌。

台湾人类学专家陈叔倬博士表示，从生物学角度来看，岛屿应该不可能成为人类族群所谓的“原乡”，即使南岛语族是从台湾扩散出去的，但人不可能在岛屿单独出现，必是从中国大陆迁移过来的。

显然，“亮岛人”的出现，

也证实了陈叔倬博士的说法，台湾非南岛语族的原乡，南岛语族源自中国大陆，因此美国语言学家白乐斯（Blust）教授所提出的“南岛民族台湾原乡论”只对了一半。

中国大陆许多少数民族与台湾少数民族的风俗文化非常相似，也都属于南岛语文化，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研究员刘少君的研究文章《大陆少数民族与台湾原住民文化元素的类比》指出，中国大陆南部的少数民族与台湾少数民族在相貌及语言、信仰、社会形态、生活方式、传统工艺等文化特质上，都存在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如衣饰、文身、缺齿和墨齿、腰机纺织、方衣与筒裙、干栏式建筑、泛灵信仰（祭坛、祖先崇拜、多灵魂）、连名制、木鼓、腌鱼、腌肉等等，这些文化及风俗特质不仅古代就存在于两岸，今日大陆、台湾、东南亚岛屿某些民族中还都遗留相同或相似的文化及习俗。例如，今日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芋头侗寨，还可看到干栏式建筑，台湾至今也保留一些干栏式建筑，只是并不多；在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侗族中，你还会发现他们的腌肉与台湾少数民族的类似，你到台湾时也可试试台湾少数民族的腌肉滋味。刘少君现任职于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南科分馆，笔者特致电他，我们共同认为现

在湖南流传的腌肉腌鱼习俗也可能承袭了湖南少数民族的腌物文化。现今，两岸少数民族的腌物文化系出同源，皆承袭中国古代南岛语族的生活习俗。

刘少君认为中国大陆少数民族与台湾少数民族都属于南岛语族文化，习俗文化上自然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

泛灵信仰：一般而言，台湾少数民族与大陆少数民族都有“泛灵信仰”。所谓的“泛灵”是指天地万物皆有灵。泛灵信仰者拜天地万物、祖灵等。两岸少数民族最常见的即为龙蛇崇拜，并且相信祖灵是宇宙的主宰，能够影响一切祸福。

文身：文面或文身是传统台湾泰雅人、赛夏人、排湾人等重要文化表征，有着族群识别、确认成年、表彰个人勇气和才能等意义。在海南岛黎族，文身是女性结束少女生活、步入成年所必经的神圣仪式。

连名制：连名制是用以表示血缘关系的系谱形式。它是南岛语族文化的特质之一，台湾部分少数民族至今仍保有连名制的传统。

木鼓：木鼓是用来召众的信号乐器，台湾阿美人、泰雅人、布农人，大陆的侗族、苗族、基诺族、佤族等都保有木鼓文化。

腌鱼腌肉：台湾阿美人称腌物为 siraw，泰雅人称其为



/ 台湾阿美人腌肉“希落”。



/ 湖南省侗族腌肉。(资料来源：刘少君研究员文章)

tmami，大陆侗族称腌鱼为 bal wedl、腌肉为 kuk wedl。两岸少数民族都有类似保存食物的方法。

干栏式建筑：干栏式建筑就是将房屋架在桩上，在大陆，侗族、黎族、壮族等民族的家庭都还在使用此种干栏式建筑，而台湾少数民族仅在会所及谷仓等公共建筑上还保存着干栏式建筑文化。这种建筑文化从中国东南沿海扩散到中南半岛、南洋群岛乃至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大西洋、南美西岸诸岛，也就是整个南岛语族分布区域。由此也可佐证南岛语族是从中国东南区域迁移至现今整个南岛语族的分布地，相关的习俗文化也随之传布到各地。（《大陆少数民族与台湾原住民文化元素的类比》，史前

馆电子报，187期，作者刘少君，2010)

“中研院”凌纯声院士也认为，大陆许多少数民族与台湾少数民族同属一个南岛语文化的民族；他研究发现，除了居住在大陆东南地区的高山族少数民族外，还有壮侗语系、南亚语系等居住在中国南部的少数民族与台湾少数民族在文化风俗上极为相似。(附录 2)

早在1950年，凌纯声院士在《东南亚古文化研究发现》一文中就提出：“台湾少数民族属于古代的百越，原居于中国大陆长江之南。百越所居之地甚广，在中国东南及南方，如今之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或至安徽、湖南诸省都是南岛语族群。”

1952年，凌纯声院士进一步提出，台湾少数民族系属中国古代百越族，很早即从大陆迁移台湾，后来与外隔绝，故能保存其固有的习俗文化。让人惊讶的是，此点与半世纪后（2012年）陈仲

玉教授的“亮岛人”研究发现几乎是完全一致的。2014年，葛应钦教授及陈仲玉教授的研究发现显然印证凌纯声院士62年前的论点，从语言、衣服、社会形态、生活方式、信仰、工艺等多重文化元素来分析，台湾少数民族、东南亚原住民是源自中国大陆；台湾少数民族的迁移，文史记载可追溯到三国时期《临海水土志》中夷州人的文化习俗。而陈仲玉教授“亮岛人”的发现，与凌纯声院士对《临海水土志》夷州人的文化研究成果，将南岛语族的迁移，从时间排序上做了一个桥梁、连结，也就是大陆的南岛语族人在公元230年（三国时期）已落地生根台湾。

凌纯声院士相关研究是在50年代发表，他的研究主要是靠实地探访、田野调查，在1950年之前不像今日有电脑、网络，还有无人摄影机，当时道路交通极不发达，交通工具也不多，做一个实地探访、田野调查的

研究是非常旷日费时的，而且凌纯声院士须探访这么多深山中的少数民族，包括台湾和大陆东南区域、东南亚岛屿、中南半岛等地的民族部落，这是一项有如编辑《四库全书》的工程。凌纯声院士愚公移山之研究精神更令后人敬佩；他的研究成果，与半世纪后陈仲玉、葛应钦两位学者的“亮岛人”研究发现前后呼应，几乎完全一致。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凌纯声院士就能做出如此前瞻性、专业性的研究成果，更证明凌纯声院士在全球民族学、语言学的学术权威及地位，让后学景仰。

谁才是真正的台湾人？

“亮岛人”的出现除了学术上的价值，也让台湾人觉悟一个事实，如凌纯声、葛应钦、陈仲玉等权威学者的研究发现，所有台湾的汉人、少数民族都源自中国大陆；所以没有人有资格自己定义谁是台湾人，甚至自认为是正统台湾人而排斥其他人。■

附录 2. 凌纯声院士的中国学说摘要：

早在1950年，凌纯声先生在《东南亚古文化研究发现》一文中就提出一个新颖而大胆的假设：

“我们现在提出所谓印度尼西安文化古代分布的区域，不仅在东南亚的半岛和岛屿，且在大陆方面，自半岛而至中国南部，北达长江，甚至逾江而北，远至淮河秦岭以南。东起于海，横过中国中部和南部，西经滇缅，而至印度的阿萨姆。

根据古史所载，代表东南亚古文化的民族，古代在中国东南者为百越，在西南者古有百濮，后称炎僚，越与濮在古均以百称，言其族类之多，如在春秋时有于越，战国有杨越，汉有瓠越、闽越、南越、骆越，三国时尚有山越，杂居于九郡之山地。百越所居之地甚广，占中国东南及南方，如今之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越南或至安徽、湖南诸省。”